

无锡文博

冯其庸题

主办单位：无锡博物院
无锡市文物交流中心

封面题字：冯其庸

《无锡文博》编辑委员会

主任：黄浩然

副主任：蔡卫东 杨建民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军 王莹 王刚毅 刘宝山
邹忆军 杨启明 陈建忠 陈建强
陆建新 陈宇 陈蓉 贡振亚
周小东 周小萍 金石声 林琰
荣骏炎 赵建高 徐玮 郭会文
黄兴南 盛诗澜 梁溪清 阎智海
韩锋

主编：盛诗澜

执行主编：阎智海

编审：蔡卫东

编辑：薛鸣法 何桦

装帧设计：杨琪蕙

目录 contents

● 专题

清宫档案与宫廷紫砂	赵聪月	03
时大彬与明代紫砂	叶倩	16
认知中国“宜均”	周小东 瞿华娣	26
宜兴紫砂陶“泥片围筑法”浅识	吉维明 咸子情	35

● 历史

《大参戎南塘戚公表功碑》的评释	陈学文	39
三公祠碑记考述	徐志钧	43
倪瓒年谱（二十）	谈福兴	50
迎接新春天的“第一燕” ——无锡地区早年进步刊物《协进》月刊综述	谈菁	57

● 遗产

无锡庆丰早期的地位和运行特征 ——兼析无锡丽新的“殊途同归”（上篇）	顾纪瑞 顾征	60
---	--------	----

● 博物馆

深化“红色文化”品牌教育活动的思考

——浅议无锡市革命烈士陵园“红色记忆之旅”品牌 … 焦懿芳 70

● 品鉴

停云馆帖考（十五）…………… 周道振 76

● 随笔

东林精神与无锡近现代名人 …… 徐 榴 83

● 资讯

《衣冠明道——泰州明墓出土服饰展》在江阴展出 …… 25

宜兴市陶瓷博物馆获批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 38

无锡博物院举办《钟鸣鼎食——周代王公贵族的礼乐生活》、《云水襟怀——陆俨少作品回顾展》…………… 75

乐趣——宜兴举办“中秋赏月猜谜游园晚会”…………… 82

无锡博物院理事会顺利换届 …… 84

《无锡文博》编辑部

地 址：江苏省无锡市太湖广场南侧
钟书路100号无锡博物院503室

邮 编：214023

电 话：(0510)85727606

电子邮箱：wuxiwenbo@163.com

印 刷：无锡市锡沪胶印厂

准印证号：锡新编(K)字第208号

出版日期：2014年9月

封面：战国 菱形勾连云纹敦
(湖北随州博物馆藏)

封底：清雍正 釉里红三鱼纹瓷盘
(无锡博物院藏)

清宫档案与宫廷紫砂

赵聪月

紫砂陶器自明代中叶兴起至明万历年间,因其深邃的文化品味及良好的物理特性走进宫廷,成为“宫廷紫砂”。现北京故宫博物院库存瓷器36万余件,紫砂器约有400余件,其中清宫旧藏168件。晚清时它们被放置于茶库、养心殿、宁寿宫、造办处等处,它们是怎样进入宫廷?烧制于何年?是怎样烧制而成?是否均属宫廷紫砂?针对于此,笔者认真查阅了清宫遗留档案,与库房现存器物相比对,以期解决以上问题。

一. 宫廷紫砂之说

“宫廷紫砂”一说,源于上世纪80年代。所谓“宫廷紫砂”是指专供宫廷使用,泥质细腻,工艺精湛,制作精良,造型充满宫廷气息,其烧制是按照皇帝旨意,交由宜兴烧制,后期装饰由清宫造办处加工的紫砂制品^①。它明显的有别于社会文人品茗之物,且与市井茶肆使用之器有天壤之别,其壶身并未留下制作工匠名款。清宫旧藏的168件紫砂器(不包括紫砂胎挂釉器),是否均属宫廷紫砂之范畴呢?

二. 清宫旧藏紫砂之器

清宫旧藏的紫砂器虽然数量不多,但

品类丰富,既有日常用器也有宫廷陈设用器。主要有碗、碟、高足盘、茶壶、茶叶罐、茶器、笔筒、笔洗、砚滴、香插、水丞、钵缸、盒、匱、瓶、背壶、花盆、炉、器物座、动物塑像、对联等,下面分类予以介绍。

碗作为日常用品,用途广泛,见于多种材质。在清宫主要使用的是金、银及瓷碗。故宫旧藏紫砂陶碗2件,一为圆形莲瓣碗,其砂泥呈纯正紫红色,器形较小,口径仅12.8厘米,敞口,弧壁,圈足,足内阳刻“惠逸公制”四字篆款,口沿外壁凸饰莲瓣纹一周,晚清时此碗存于造办处内。另一碗体呈六方,红泥略黄,口径达18厘米,敞口,斜壁,圈足,无款识,碗内壁及圈足内均施以仿哥釉,外壁一侧刻“竹炉汤沸火初红”,表明其功用应与茶有关。

碟因其口径较小而区别于盘,清时一般用于盛放小菜。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盘、碟并无明确的界定,但在清宫档案的记载中,一般是将5寸及其以上称作盘,3寸及其以下称为碟,4寸者有时称盘,有时称碟。清宫旧藏紫砂胎碟1件,此碟高2.5厘米,口径10厘米,足径6.2厘米,敞口,弧壁,圈足,其砂色及作工均同于莲瓣碗,内心

^①王健华:《宜兴紫砂》,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阳刻“逸公”二字篆款,晚清时置于茶库^①,此碟与上述陶碗应出于同一人之手。惠逸公为清雍正、乾隆时期宜兴制陶名匠。

高足盘。高足作为常用瓷器造型之一,是由古代祭祀用品中的“豆”演变而来,根据尺寸大小可分高足盘、碗、碟、杯四种。其功用初为祭器,后发展成实用器,高足碗、盘常被用作佛前供奉。清代宫廷对高足器皿的使用有所不同,对于清代以前的制品或作为古器入等次收藏,或作为陈设品放置于宁寿宫、景祺阁、颐和轩、景阳宫等宫殿内。清代本朝烧制的器皿则作为祭器置于皇极殿、奉先殿、斋宫等祭祀地点,或放置于慈宁宫、重华宫等设有佛堂之地。清宫旧藏的紫砂胎高足盘2件,其造型、口径基本相同,均体呈椭圆,口为海棠式,高足外撇,盘外壁及圈足内施仿哥釉,开片细小,口沿外壁凸饰回纹一周。此对盘晚清时放置于慈宁宫的一木盘内,与其同放的还有一些烧制于清晚期的彩瓷高足盘,即表明了其功用,也间接证实了其烧制时间。

茶壶在清宫旧藏的紫砂器中数量较多,共48件。其造型多样,以圆、扁圆为主,还有四方、六方、方斗、竹节、瓜棱、僧帽、百果、提梁式等等。泥色多数呈紫、红,有9件呈姜黄色,1件呈鼠皮灰,2件呈浅粉色,泥砂有粗有细。装饰手法丰富,2件外髹黑漆,漆上以金彩描绘山水图案,十分精美

(见封二);1件器外通体施绿彩,上以金、红两色描绘莲托蝙蝠,花托“万带”,寓意万福万代(见封二);2件外壁以珐琅彩点缀花卉、山石装饰;15件外腹部以诗、画装饰,运用堆绘、刻工艺手法,集诗、书、画、印为一体,色彩艳丽,制作精良,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字为阴刻,诗为乾隆御题。其中,13件钤刻的是乾隆七年(1742)所作《雨中烹茶泛卧游书室有作》,诗文为:“溪烟山雨相空濛,生衣独坐杨柳风。竹炉茗碗泛清瀨,米家书画将无同。松风泻出生鱼眼,中冷三峡何需辨。清秀仙露心诗脾,座间不觉芳堤转。”1件钤刻的是乾隆十六年(1751)所作《惠山听松庵用竹炉煎茶因和明人韵即书王绂画卷中》,诗文为:“才酌中冷第一泉,惠山聊复事烹煎。品题顿置休渐昔,歌咏臙蓂亦赖前。开士幽居如虎跑,舍人文笔拟龙眼。装池更喜商邱莘,法宝僧庵慎弃全。”此为全诗的上部。另1件钤刻的是作于乾隆七年(1742)的《烹雪叠旧作韵》:“通红兽炭室酿春,积素龙墀云遗屑。石铛聊复煮蒙山,清兴未与当年别。圆瓮贮满镜光明,玉壶一片冰心裂。须臾鱼眼沸宜磁(宜兴磁壶煮雪水茶尤妙),生花犀液脣(繁)于纈。软饱何妨滥越瓯,大烹讵称公驾列。挑灯即景试吟评,檐间冰柱□阶坼。我亦因之悟色空,赵州公案犹饶舌。忽忆江南灾馑馀,抚字心劳荒政拙。九重岂宜耽晏安,大君原为斯民设。安

①《故宫物品点查报告》,清室善后委员会刊行(1925年3月1日)。

能比户免饥寒,三代高风真邈绝。”诗文表达了乾隆帝对宜兴紫砂壶的喜爱,此壶流、柄均已残缺。句末均钤圆形篆文“乾”及方形篆文“隆”字。画面以本泥堆绘“烹茶图”为主,但场面不同,只有4件堆绘松树图。48件紫砂壶中有11件在其足底钤刻款识,分别为“邵亮生制”、“邵元祥制”、“徐恒茗制”、“陈殷尚制”、“阳羨茗壶”、“香茗自娱”、“清风徐来沁我心脾大彬制”及“乙酉桂月,臣僧实诚进,邵邦祐制”,1件足内金彩书“大清乾隆年制”,2件书“嘉庆年制”,其它均无款。晚清时分别置于养心殿、造办处、茶库及御茶膳房内。

茶叶罐19件,泥砂呈红、紫、黄、粉、鼠皮五色,造型有圆、四方、六方三种,大部分成对放置。在19件藏品中,只有1件器身光素,泥砂较粗,带有明显的早期特征。另外2件造型基本相同,均为四方形,方肩、方足。虽然泥质略粗,但器身均有装饰。紫色罐腹部四面凸印回纹,中部为夔龙衔“寿”字,而呈灰鼠皮色罐则在腹部四面分别堆绘梅花、兰草、竹石、菊花四君子图,画面清新淡雅。此罐晚清时被放置于造办处的一木柜内。剩余的16件器物,做工极为精细,泥砂淘洗细腻,显示出奢华的宫廷气息,其造型或圆或六方,而六方罐又分高、矮两种,玲珑秀巧,泥色红如朱砂,其装饰图案有芦雁、花鸟及梅树三种。其堆绘的芦雁纹饰,描绘了飞、鸣、食、宿之四种生活状态的大雁在碧波之上或茂密的芦苇之中,一片静逸,隐喻了品茗人闲

适的生活情趣。画面宽广,用笔娴熟。花鸟纹均装饰于六方茶叶罐的腹部,六面分别堆绘花卉或飞鸟立于枝头。其中有4件罐盖为双层,外层盖顶分刻“六安”“珠兰”“雨前”及“莲心”等宫廷贡茶的名称。另有8件器物,造型相同,胎色不同,均为圆口,短颈,长圆腹,圈足,圆形盖,宝珠钮。呈浅黄色、肉粉色及朱红色三种,腹部一侧长方形委角开光内阴刻乾隆七年(1742)所作御题诗《雨中烹茶泛卧游书室有作》(见彩二)。其中朱红色陶衣罐则以金彩描摹,另一侧则细泥堆绘梅树纹。与此相配的均有泥色相同的茶壶。

茶器1件,此器在故宫文物账上被称作“温器”。其敞口,弧壁,圈足,一侧有流,器内心分两层,上层表面留有梅花形细孔,可向下层流水。圈足内阳刻“荆溪董氏”款识。笔者认为此器还应与品茶相关。

笔筒,由早期的笔套、笔床发展而来,用于插放毛笔。紫砂胎笔筒于明代晚期出现。现清宫旧藏6件,其中5件由黄色泥砂烧制而成。有3件造型、尺寸、呈色及装饰手法均相同,只是装饰图案不同。2件图案意境相同,均为宽阔的江面,远山近景,山间小路,文人雅士等等,但1件所有线条均以金彩描摹,显得更加奢侈讲究,1件图案为爷孙二人玩耍于枣树之下的生活场景。其它2件为四方形,1件通体光素无装饰,配有仿木座,座下钤“友义”篆款,在其器身贴有黄条,上书“咸丰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范交宜兴笔筒一件”,宣统时置于懋勤

殿内^①。另1件四方委角,外壁四面彩绘花鸟纹,此笔筒晚清时被放置于南三所西所后院的一皮箱内。还有1件形、色均似枯树根,敞口,平底。

笔洗1件,为半剖核桃状,口径较大,最长处达20厘米。外壁呈深红色,内壁施窑变釉。

砚滴属文房用具,最早出现为铜质,两晋时期出现瓷质器。清宫旧藏紫砂器3件,1件色呈深栗色,外壁装饰繁复,凸雕两条扭曲的螭龙,回首龙为流,爬行龙作柄,盖顶置灵芝为钮。另外2件均以黄泥烧制,1件以鲜桃为造型,桃树枝干作流,梅花为钮;1件以倒置的石榴为身,蘑菇为盖,藕节为流,灵芝为柄,柿子、桃子及核桃为足,腹部阴刻“仙家瓜果四时同”,晚清时置于毓庆宫后殿东配房的一雕花木盘上。

香插属文玩清供,清宫旧藏品中瓷质花插较多,紫砂器仅此1件(见彩一)。花插造型小巧,做工精致。高15.5厘米,口径5.5厘米,足径10.5厘米。插体为一宝瓶,瓶底部承一天鸡,天鸡腹部中空与宝瓶底部相通,鸡首口部设有出气孔,以散香味。通体以白、绿、黄三色泥砂烧制,以红、金彩装饰,天鸡展翅,宝瓶外壁满绘祥云及“寿”字。

水丞属文房用具,共8件,4种造型。其中4件形似鲜桃,十分逼真,均以树干盘于

桃身,水丞内心置桃核。3件装饰完全相同,以绿泥做树叶,紫泥做树干,姜黄色泥做桃身,以红彩点缀桃尖,以示桃子的成熟,此3件水丞晚清时置于古董房内。另1件桃形水丞虽然装饰较之简单,并无绿叶等,但其小巧的造型,显得更加精细,丞口还饰有小盖,盖与丞体凸雕装饰相联,浑然天成,盖顶置盛开的梅花为钮,既美观又实用。另一对水丞体呈南瓜,上附瓜蒂形盖,由紫泥烧制。其它2件为圆形,均以凸雕螭龙为饰,分别以栗色和姜黄色泥烧成。栗色者,腹部两侧分别阴刻“如我文房,著我文章,为龙为光,用行合藏”及“岁在癸未,暮春之初,制于梅溪书室”,署“圣思”篆款,此丞晚清时同样置于古董房。姜黄色水丞,器身堆绘绿泥“寿”字,红泥飞蝠纹。

钵因其状似僧人食器而得名,基本造型为敛口,鼓腹,平底。清宫旧藏共3件,由紫泥烧制而成,有2件造型、尺寸及泥色均相同,外壁以浮雕莲瓣纹装饰,晚清时置于茶库。另一件尺寸较大、颜色较深,底为圆底,口上附拱形盖,盖面上阴刻“五蝠捧寿”纹,器身通体刻《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此钵晚清时置于景仁宫,与其同放的均为五恭、佛台等供奉用具。

盒作为容器,功能较多,因存放的东西不同,而有多种名称。尺寸较小的一般存放化妆品,被称做粉盒、油盒、胭脂盒,

①《懋勤殿现存陈设库存》,清宫陈设档宣统二年九月立。

稍大些用于盛放印油,称为印色盒,还有药盒、笔盒等等。清宫旧藏的盒共8件,口径均在5-10厘米,泥色呈黄、粉色,2件为核桃式,2件以鸳鸯为造型,3件六瓣葵花式,只有1件为扁圆形,通体浮雕双层莲瓣纹且施黄彩,盖面中心为红、黄相间小十字格纹。以上诸盒晚清时均置于古董房内。

匱一般被称作盥洗用具,陶制匱自新石器时代就开始烧制,瓷匱以唐代越窑、宋代钧窑及元代龙泉窑、景德镇窑制品为多,紫砂胎匱较为少见,故宫仅藏1件。其匱呈紫色,体似碗,口沿一侧留有较宽的流,圈足内阳刻“种花读书处”款识。晚清时置于茶库的一木架上,与其同放的是一些茶叶、茶膏等物。

瓶作为陈设用器,流行于清代晚期。清宫旧藏的4件紫砂瓶,器形较大,瓶高均在50厘米以上,造型也均为仿古代青铜器。一对为彩画花鸟山水活环瓶,一对为刻字博古方瓶。其彩画花鸟山水活环瓶,方口,鼓腹,方圈足,颈两侧饰狮头活环耳。以姜黄色砂泥制成,泥质略粗,颈部彩绘花卉,腹部四面分绘动物纹样,画面寓意吉祥,既有“三阳开泰”,又有“鸳鸯戏水”等等。在瓶内壁还贴有清宫旧有黄签“春字八百七十号”,外壁挂有“珠一〇八二”,显示出其在清宫陈设位置的变化,春为乐寿堂,珠为皇极殿。另一对刻字博古方瓶,体呈四方,敞口,直颈,直壁,方圈足。两瓶虽然造型相同,装饰风格相同,但装饰图

案不同,分别刻画了汉代瓦当、玉钩,记录了一些历史典故。其字尾留有款识为“东溪生氏”,此人名赵松亭,号“东溪”,或署“东溪生”,是晚清至民国时期杰出的砂刻陶家,其刻制的紫砂器集“诗、书、画、印”为一体。此对瓶晚清时陈设于遂初堂内。

背壶又称穿带、背水壶,因壶的两侧有穿带的系或沟槽而得名,因其方便携带,适应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因此辽、西夏时较为流行,又被称做马褂瓶,有扁、圆等多种形制。故宫旧藏紫砂胎背壶2件1对,小口,口上附圆形盖,短颈,扁圆腹,两侧上下各置一穿带系,椭圆形小圈足。背壶体呈栗色,泥砂细腻,一侧腹部刻写“齐醉中山酒,同倾北海杯”十字。此对壶晚清时同样置于茶库。

花盆用于盆栽植物。清代宫廷一般年节时都会摆放盆景,盆景栽种的花盆种类丰富,宜兴紫砂花盆因其特殊的天然色泽及良好的透气性能,随盆景大量地进入宫廷。清宫旧藏52件,造型丰富多样,有圆、腰圆、长圆、椭圆、筒形、长方、四方、六方、八方、方斗、三角、三折斜方、花口、树根式等等,泥色以紫色为主,少量的呈枣红色,极少量的由黄泥烧制,底开一孔、两孔,水仙盆底无孔。基本上成对陈设,尺寸大小不等,均有使用痕迹。晚清时这些花盆分别存放在寿康宫、南三所及英华殿内。

炉一般用作焚香,三足炉的流行始于五代,其造型多摹仿青铜器,也可用作陈设。紫砂炉较为少见,故宫旧藏仅1件,以红

色泥砂烧制,但呈色略显发黄,体呈枯树根状,敞口,下承三足,口部两侧置桥形耳。

器物座仅1件,造型为三联体核桃,每只核桃顶部均有沾合痕迹,由此判断此为三足器皿的底座。

动物塑像3件,2件为梅花鹿,1件异兽。三件器物均以姜黄色泥砂制成,形态逼真,做工精细,鹿、兽身上之皮毛、筋骨均有细致表现。鹿站立状,竖耳侧目,两眼圆睁,腹、背部布满白色梅花斑。两鹿一左一右正好1对,而在其鹿身上均贴有黄色标签,上写“赏”,极有可能是皇妃过生日,皇帝给予的赏赐之物。此对鹿晚清时被放置于永寿宫内。异兽作卧状,面部似狮非狮,张口露齿,双目黑亮。此物被称做异兽,在清宫档案中常见有制作各种材质异兽之记载。此兽还保留其原配紫檀木座,座底部金彩书“丙”字,从清宫档案上看,“甲”“乙”“丙”为乾隆帝区分古玩等次的编号。

对联1件14片,联句“一榻春生江上月,百花香集案琴书”。

三. 清宫档案之记载

清宫遗留的档案品类繁多,而研究清宫御用品的工艺制作,则主要依靠造办处的《活计档》。汉文《活计档》记自雍正元年至宣统时期,它如实记录了各类宫廷制品的名称、来源、时间、规格、用料、开销、工序、去向以及皇帝的旨意,是清宫日常活动中自然形成的原始记录。造办处是清宫制造皇家御用品的专门机构,由皇帝特派的内务府大臣管理,各类专业作坊有60余个,包括了珐琅作、油木座、匣裱作、如意馆等等。其职能除御用品的制造、修缮、收藏外,还参与装修陈设、贡品收发、罚没处置等事宜,一些特种工艺则由造办处设计画样,交由杭州、苏州、江宁织造或九江关、粤海关制作。清宫档案中有关紫砂器的记载,大概分四类。

雍正五年盘查磁器库内存宜兴器皿:

1. 收藏、陈设、使用^①

时 间	名 称	用 途	数量
雍正元年十二月	宜兴壶	放置茶具中	3
雍正四年六月	花觚	配座子	1
雍正六年九月	葫芦、花插、圆盒、桃式水丞	装漆箱	各 1
雍正六年十月	马褂瓶、圆盒、桃式水丞		各 1
雍正七年闰七月	双喜水丞、仙桃		各 1
乾隆三年二月	宜兴器皿	寿皇殿供奉	2
乾隆三年九月	画珐琅包袱式茶壶、画珐琅四季花茶壶、画珐琅海棠式茶壶	配楠木匣盛装,将各色年号刻在匣盖上。	各 1

①《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时 间	名 称	用 途	数量
乾隆三年九月	烧珐琅盖碗、烧珐琅茶元、烧珐琅茶吊	配匣装盛	15
乾隆三年三月	树根笔架	配座	1
乾隆四年十一月	宜兴花盆	送往圆明园交园内种花	10
乾隆五年三月	茶吊	配黄络子	1
乾隆七年三月	四方飞脊文王鼎	昭仁殿桌子上摆	1
乾隆八年九月	核桃笔洗	配匣入乾清宫等次古玩	1
乾隆十二年七月	瓜式盃	配做檀香座	1
乾隆十四年	方花插	入百什件	1
乾隆十八年三月	小罐	入百什件	1
乾隆十八年三月	桃式水壶	入百什件	1
乾隆三十七年十月	笙式壶	配座子	1
乾隆四十八年正月	宜兴异兽	配座子	1
乾隆五十七年二月	宜兴瓶、宜兴盘	瓶配座入百什件宜兴盘变价	各 1

宜兴香炉一个,宜兴东摩茶桶三个(俱惊璽),宜兴壶四十三把(内惊璽二十八把),宜兴碗四十一个,宜兴茶钟二十六个,宜兴酒杯四十八个,宜兴碟二十五个,宜兴台盘三十个,宜兴渣斗二个,宜兴铤子六个,宜兴羹匙八张,宜兴盖碗八个,宜兴火锅二个,宜兴罐二个^①。

2. 清宫御用品的相互影响

雍正四年十月二十日,郎中海望持出宜兴壶大小六把。奉旨:此款式甚好,照此款式打造银壶几把、珐琅壶几把,其柿形壶的把子做圆些、嘴子做长些^②。于五年十

二月二十日,照宜兴壶款式做得大螺蛳式银壶二对,重十六两六钱六分,小螺蛳式银壶一对,重九两九钱六分,柿子式银壶一对,重十八两四钱四分,高椿银壶一对,重十五两一钱,平楞银壶一对,重十四两四钱,瓶式银壶一对,重十八两六钱,并交宜兴壶六把,郎中海望呈进讫^③。

雍正六年二月十八日,太监王太平传旨,照外边圆宜兴壶式样做银壶二把,嘴子不可做小了,尔等酌量着做。于本月二十八日做得圆式银壶二把^④。

雍正六年八月初七日,据圆明园来

①《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卷一,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4 页。

②同上卷二,第 66 页。

③同上卷二,第 302 页。

④同上卷三,第 34 页。

帖,内称闰七月三十日郎中海望持出菊花瓣式宜兴壶一件。奉旨:做木样交年希尧,照此款式做钧窑、霁红、霁青釉烧造。同日持出素宜兴壶一件,奉旨此壶靶子大些,嘴子亦小,着做木样改准交年希尧烧造^①。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一日司库常保、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沧洲交宜兴壶四件,外绘洋金花纹。传旨:此壶的款式略蠢些,收小些,做好样呈览。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做得木样四件并宜兴壶四件,司库常保首领萨木哈、李久明呈览,奉旨改做好样,准烧造磁器,宜兴壶着留下^②。

雍正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司库常保、首领太监萨木哈持来宜兴钵一件,奉旨:着照此样式,将黄地珐琅钵做一件。钵身周围中间写梵字,画吉祥草,盖顶中间亦写梵字,凑圆周围亦画吉祥草。其梵字着问喇嘛写,再照样将呆青、呆黄、呆金黄玻璃钵做几件,再另寻宜兴钵一件交与烧造瓷器处,将钧窑、官窑、霁青、霁红钵多烧造些,其钧窑的要紧。于二月初七日做得画珐琅烫胎合牌钵样一件,司库常保,首领太监李久明、萨木哈呈览。奉旨,花纹、梵字准做,其式样俱照宜兴钵做,钵底不要平了^③。

乾隆元年八月三十日,司库刘山火、七品首领萨木哈将收拾得豆瓣楠百什件内屉一件,交太监毛团呈览,奉旨:着将屉内有一宜兴壶挪出,着照样烧造一珐琅壶盛装^④。

乾隆十六年九月初二日,员外郎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青玉有盖壶一件(有透柳)、洋彩诗字磁壶一件,铜胎珐琅菊瓣壶一件(珐琅有磕),传旨:着图拉照样各做宜兴壶一对,再变别花样、款式做样呈览,准时亦交图拉成做。于本月十一日员外郎白世秀,变别得宜兴壶木样二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将木样二件,俱落堂,一面贴字,一面贴画,准交图拉,将茶具内宜兴壶与他看着照宜兴壶身分照木样、款式各做四件,分八样颜色,俱要一般高。再将茶具内银茶叶罐亦做木样交图拉,照样做宜兴茶叶罐,亦要与宜兴壶一般高^⑤。

3. 紫砂器的制作

乾隆十六年(1751)至二十三年(1758)为紫砂茶具的制作高峰期。

乾隆十六年六月初十日,员外郎白世秀、催总德魁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黑漆茶具两分(内一分画竹子随钵孟缸,内一分

①《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卷三,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34页。

②同上卷五,第336页。

③同上卷五,第618页。

④同上卷七,第19页。

⑤《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卷四,中国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画金花随屈缸),夔龙式银屈冰盆一件,水漏子二件,宜兴壶三把,银方圆六方茶罐三件,茶碇三件,青花白地茶钟二件(随双圆茶盘一件),磁缸一件(随藤盖一件、西洋盖布一件),木靶银钩子一件,木靶铜菠蓂一件,竹快子一双,纱杓子一件,四夔龙式银屈冰盆一件,宜兴壶三把,银圆方六方茶叶罐三件,青龙白地宣窑茶钟一对(随腰圆茶盘一件),磁缸一件(随藤盖布、银杓子一件、水漏子二件、竹快子一双)铜方火盆,木靶铜菠蓂一件,铜掇子一把,解锥一把,传旨将水盆上面高处去了银里补平,茶具底下空榻挪中。于八月二十五日,员外郎达子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将交出文(茶)具送进呈览。于本日,员外郎达子将交出文(茶)具二分,内随家伙,全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将文(茶)具内家伙留下一分,照双圆茶盘一样再做一件,茶钟上各配紫檀木盖,讨汉玉顶嵌用,其腰圆茶盘做材料,再照文(茶)具一样成做紫檀木文(茶)具二件,其文(茶)具背后二堵头并抽屉正面,各落堂贴字画,先做样呈览。于本月二十七日,交出汉玉扇器二件札开做钟盖上顶用,青花白地嘉窑茶钟二件,竹炉四件,磁缸二件,随座。于本月三十日,员外郎白世秀将黑漆文(茶)具上贴得背板纸样一张,两堵头牙子纸样一张并贴得抽屉上纸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照样准做紫檀木文(茶)具两件。于九月十一日,员外郎白世秀将做得茶钟木盖样上嵌得玉顶持进,交太监胡世

杰呈览,奉旨照样准做紫檀木盖,镶银里要包过盖边一二分,其盖面照茶盘,如何商丝样即照样商丝。于九月二十一日,员外郎白世秀、达子将双圆茶盘一件,钟盖二件,上画螭虎一样,西番莲一样持进交胡世杰呈览,奉旨:照样准做两分,将脐子挪正再画二分花样呈览,准时再做。于九月二十二日,员外郎将做得木茶吊(壶)样二件,锡圆茶叶罐一件,海棠式一件,四方八角一件,六方一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茶吊(壶)每样准做宜兴的八件,一面御制诗,一面画画,着丁观鹏、张镐起稿呈览,准时再做。茶叶罐亦每样烧做宜兴的八件并茶吊俱要四样颜色,每分随香几一件,样款照同乐园明殿现安香几一样成做,每件香几底下随地壶一件。于十月初二日,七品首领萨木哈将画的地壶样三张,双圆茶盘,钟盖上画得夔龙、夔蝠纸样一张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照样准做,其诗字即着南边写。于十月十一日,员外郎郎正培将茶吊、茶叶罐上丁观鹏、张镐画稿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照样准做,其诗字即着南边写。于十一月十一日,员外郎海福,催总舒善将拨蜡样,夔龙式万字兽面花纹地壶样一件,夔龙式蕉叶西番莲花纹地壶样一件,迴纹如意纹蕉叶纹地壶一件,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茶盘、钟盖样准做,共要八分。其地壶亦准做四件,将从前做过地壶上诗查出一并呈览,准时再做。此三样酌量成做八件。于十一月二十九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来

说,太监胡世杰交青花白地茶钟六件(内两件嘉窑,四件无款),成窑茶钟二件,万窑茶钟二件。传旨:着配盖、双圆茶盘,其玉顶讨用^①。

乾隆十七年十月初四日,员外郎白世秀、太监胡世杰,传旨:着催南边做得茶具并宜兴茶叶罐、茶吊、漆匾对等俱急速赶做送来^②。

乾隆十七年十一月初五日,员外郎白世秀将苏州织造安宁,送到宜兴茶吊十六件,宜兴茶叶罐三十二件,俱随原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③。

乾隆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员外郎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新做花梨木茶具内,亦着南边照现有茶具内宜兴茶吊、茶叶罐,一样收小烧造茶吊两件,茶罐四件^④。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初七日,员外郎白世秀、太监胡世杰传旨:所有茶具内安设茶叶罐,罐盖上俱刻茶叶名色填青,现写样呈览。于本月十二日员外郎白世秀,将茶叶罐四件贴得茶叶名色签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照样准刻。于本月十八日,员外郎白世秀将茶叶罐四个,盖上写得茶叶名,俱持进交太监胡

世杰,奉旨:交懋勤殿俱着御书处刻做。于本月二十四日员外郎白世秀、太监胡世杰传旨:宜兴茶叶罐盖上的茶名字,仍着造办处刻做。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初九日,员外郎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宜兴元茶吊大小二件,宜兴菱花茶吊一件,宜兴半元茶吊一件,传旨:将元茶吊二件俱一面刻字,一面刻画,菱花茶吊花瓣内刻字,半元茶吊将字磨去另刻字。于本月十三日,员外郎白世秀将宜兴茶吊大小四件,各画得粉道样随诗、画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准着造办处刻字画,其小茶吊二件在花梨木茶具内用。于本月十八日,员外郎白世秀将半元茶吊上贴得诗、花纹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交懋勤殿俱着御书处刻做。于本月二十五日,员外郎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宜兴茶吊上的诗并花纹,仍着造办处刻做。于乾隆二十年四月初二日,员外郎白世秀将刻得诗二把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交如意馆李世金刻花纹。于本日将壶两把交如意馆刻花^⑤。

乾隆十八年三月初四日,员外郎白

①《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卷十八,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页。

②同上,第396页。

③同上,第265页。

④《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卷四,中国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

⑤《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卷十八,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54页。

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照从前传做茶具内宜兴壶、茶叶罐,着南边照样做一分,青花白地果洗,着江西照先前传做茶具内果洗烧造一分^①。

乾隆十九年十月十九日,员外郎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双鹤斋着苏州安宁做茶具一分,香几、茶具竹炉、水盆、茶盘、钟盖等俱用文竹包镶,俟钟子到再做盖,宜兴茶壶、茶叶罐照先一样成做^②。

乾隆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员外郎金辉、郎中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着苏州织造安宁照先做过茶具再做二分,随水盆、银勺、银漏子、银靶圈二件、宜兴壶、茶叶罐、不灰木炉、铁钳子、铁筷子、铜炉、镊子、铲子、竹筷子等全分。于十月十五日,员外郎金辉郎中白世秀,将苏州织造安宁送到茶具内水盆二件、宜兴壶四件、茶叶罐八件呈览。奉旨:嗣后再传做茶具时,其水盆、宜兴壶、茶叶罐不必做,仍竹炉^③。

4. 其它

乾隆二十四年二月初八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宜兴壶九把,宜兴盘四件,传旨:着交崇文门变价^④。

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两江总督尹继善贡单:宜兴茶壶伍对^⑤。

四. 余论

清宫遗留档案为我们提供了诸多信息,笔者查阅了大量档案再与库存实物相比对,得出以下结论。

1. 档案中有关紫砂器物的陈设、使用等信息,证明了某些能和档案记载相吻合、清宫旧藏器物最晚的烧制时间,从中可以得出这些器物烧制时期紫砂器的时代特征,为研究者提供了实物依据。如雍正六年档所记载的“桃式水丞”“宜兴马褂瓶”,乾隆八年记载的“核桃笔洗”,乾隆四十八年记载的“宜兴异兽”等,现均在库。

2. 档案中有关收藏及对其它类别御用品相互影响信息,体现了帝王的审美及紫砂器在清宮的地位。百什件作为皇帝收藏其最心爱之物的物件,在宮中重要的乾清宮、养心殿等宮殿内放置,从档案记载中可以看到有诸多紫砂器也被收入其中,表明了其在宮中占据了较高的地位。紫砂器不仅被收藏,造办处还根据皇帝谕旨,以其为模本,烧造了瓷器、银器及珐琅器等,同样还根据宮中

①《清宮内務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卷十九,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17 页。

②《清宮瓷器档案全集》卷四,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07 页。

③《清宮内務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卷二十三,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604 页。

④《清宮瓷器档案全集》卷六,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34 页。

⑤《清宮瓷器档案全集》卷七,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3 页。



图一 乾隆款青玉茶壶

玉器、瓷器的造型烧造了紫砂器。如现藏于故宫库房内的一件署有“雍正年制”的仿钧窑菊瓣壶，就应是雍正七年档案中所记载的“菊花瓣式宜兴壶”烧造的。而同样署有“雍正年制”款的霁青钵，则是以雍正十一年档记载的宜兴刻心经盖钵为母本烧造的。而清宫旧藏的4件御题诗松树图壶（见封二）及1件鼠皮灰色御题诗烹茶图壶，对照库存的青玉壶及洋彩诗字壶，其中1件刻有乾隆年款的青玉壶（图一），其造型完全同于松树图壶；1件粉彩御题诗烹茶图壶（图二），与鼠皮灰色御题诗烹茶图壶不仅造型相同，连御题诗句及装饰图案均相同，这与乾隆十六年档案所记载完全吻合，从而证实了此5件壶的烧造时间及造型来源。由于此两种壶式是在皇帝亲自过问下、按照宫中御用器皿造型烧制的，其典范、严谨、雅致的造型，完美精细的

做工，带有典型的宫廷风格。

3. 档案记载证实了官员进贡是清宫旧藏物品的来源之一。“任土作贡，自古有之”，也就是说地方大员定期或年节要向皇帝进贡特产。清承旧制，每岁凡逢年节帝、后万寿时，各省总抚督大臣地方官员及边远少数民族王公大臣，均要进献方物给皇帝，向有年贡、例贡及岁贡之物^①。乾隆时期进贡的名目繁多，从清宫档案贡单中看，地方官员进贡了



图二-1 乾隆款粉彩开光人物煮茶图壶



图二-2 乾隆款粉彩开光人物煮茶图壶

①《故宫博物院院刊·清代皇室与年例岁贡》1990年第4期,第72页。

大量古玩进宫，瓷质器皿大多为宋代名窑之器，而紫砂壶作为贡品也名列其中，说明紫砂制品在乾隆时期就具有相当的影响，进贡则成为其进入皇宫的途径之一，笔者认为旧藏品中署有名款的器物，均属此类。

4. 档案中有关烧制信息，揭示了宫廷紫砂器的烧制过程、烧制地点。乾隆十六年至二十三年档，详细记载了乾隆皇帝所用茶具中宜兴壶、宜兴茶叶罐烧造的过程、地点及数量。其制作过程一般由皇帝根据自己的审美，挑选合适的器物为其母本，命宫廷造办处做好木样并指定专人起稿画样，交由苏州织造到宜兴定烧，其诗文的刻写及画样的堆绘，或由宜兴加工或由造办处刻字、如意馆刻花纹。档案记载的紫檀木茶具、茶碗、双圆茶盘及其附件

现均在库。而清宫旧藏的15件茶壶、16件茶叶罐，其中2对茶壶与2对茶叶罐，其壶身呈色、诗句均相同，只是堆绘的图案不同，但壶身高度基本相同，与乾隆十六年档案记载完全吻合；乾隆十七年所记，盖上写得茶叶名的4个茶叶罐也在其中。笔者认为这些器物应是乾隆十六年至乾隆二十三年在宜兴烧造的，当属宫廷紫砂的标准器。

宫廷紫砂因其端庄的造型、古典厚重的艺术风格及其所开创的多种全新的装饰手法，使紫砂呈现出了一派富丽堂皇、精致高贵的宫廷气质，对清代后期宜兴紫砂器的造型产生了不容置疑的影响。同时，宫廷紫砂也深刻影响了宜兴紫砂的深入发展。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

(编辑：阎智海)

(上接第 59 页) 爱憎分明，切中时弊，笔锋泼辣，战斗力强，其中一篇《援弱覆黄燕书》曾说：“我承认，我坚决的承认，我们革命的生力军，是在民间。我相信，我十分相信，我们的工作，应当是到民间去。我以为民众一天不觉，革命一天不能成功，不能

彻底。”道出了革命的真谛是要团结民众一起斗争。这是宣言，也是呐喊，以此来唤醒沉睡中的民众，奋起抗争，为了自由和平等，为了解放和胜利，也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创造条件。

(作者单位：无锡博物院)

(编辑：阎智海、何桦)

时大彬与明代紫砂

叶 倩

时大彬是宜兴紫砂成熟的标志人物。自大彬始,以砂壶为代表的紫砂茶具渐渐成为重金竞逐的宝玩。已有不少学者就其生卒年代、陶艺成就、作品真伪等问题进行过卓有成效的探讨,笔者在学习过程中也参阅了相关文献和实物资料,对时大彬和以大彬壶为代表的明代紫砂器有一些体会,呈文于此。

一. 明人眼中的时大彬和大彬壶

时大彬的相关记载见诸明人专著、笔记和小说,如周高起的《阳羨茗壶系》、许次纾的《茶疏》、陈贞慧的《秋园杂佩》、文震亨的《长物志》、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冯梦龙的《古今谭概》等,从中可知时大彬出生于紫砂世家,技艺高超,弟子众多,其壶泥夹砂、风格古朴,壶上有款识等信息,不少内容亦为清代文献所转载,代表着两代人对时大彬壶艺的高度评价。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文献中还存在着对时大彬和大彬壶的某些负面的看法,这种负面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对时大彬外表、性格、生活方式的不欣赏;第二是对大彬

壶高价的不理解。

(一) 时大彬其人

徐应雷的《书时大彬事》是学者们普遍提及和引用的一条重要材料,他笔下的时大彬是个蓬头垢面、嗜酒好饮、好吃懒做的村夫:“一日遇诸杨纯父斋中,其人朴野,黧面垢衣。……性嗜酒,所得钱辄付酒家,与所善村夫野老剧饮,费尽乃已。又懒甚,必空乏久,又无从称贷,始闭门,竟日埴埴,始成一器,所得钱辄复沽酒,尽当其柴米贍。”^①徐氏认为时大彬高超的制壶技艺得益于家传,并有一定偶然因素。大彬制壶的动力源于其对酒的狂热,钻研壶艺也是为了换取更多的酒资,显然是一种非常颓废的生活方式。这则史料以往被作为孤例,可信度受到质疑,因为多数明代文献对时大彬的评价都是肯定和赞誉的。江盈科《雪涛谐史》记载:“宜兴县人时大彬,居恒巾服游士大夫间”^②;《阳羨名陶录》引元末明初蔡司霭《先进录》:“宜兴时大彬,砂壶名手也,尝挟其术以游公卿之门。”^③两人更言时大彬凭借着砂壶为儿子换取

①《明文海》卷三百五十二纪二十六,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②《中华传世奇书·雪涛谐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版。

③《中国陶瓷名著汇编·阳羨名陶录》,中国书店1991年版。

功名。这样一个深谙事故、善于交际的时大彬显然与徐文矛盾。

近日,笔者在明人葛应秋《石丈斋集》收入的《瓦壶记》中发现这样一段文字:

予家蓄一壶,执似耳,流似兔,甬腹,甕颈,盖平而少封,下镌时大彬名。……大彬抟埴之工,专治壶。家贫,性嗜酒,挑达迂疏,负气自亢。士大夫索其壶,庀仪状。通简牒,乃为许可。不者,虽甚贵倨,弗知也。壶既名四方,索者众,或三五月弗染指,或闭门便六七旬弗出,则解衣磅礴、科头攘臂而为壶,专气一神,得心应手。品式不主故常,奇奇怪怪,相逼而来。出之火中,纯完乃可,否则勿论苦窳,稍歉点,辄引铁椎碎之,虽从旁请乞,弗与。时令邑追遣彬壶数十,三月弗应。令怒逮下狱,竟坐狱月余,醉歌自如,壶弗得也。士大夫为令言,令始礼延之署中,仅得数壶而已。予得此壶郡市中,款识无奇,不审为大彬真贋与否。第砂坚质厚,规矩雅称,巧在弗纤而已。……^①

葛文的出现佐证了徐文的部分内容,肯定了时大彬家贫、嗜酒的事实。可能有人会质疑葛文和徐文会不会存在传抄的关系。通过对比,这个疑问是可以排除的。两文叙事的角度、内容和表达的思想都不相同。徐应雷感叹晚明兴起的收藏之风竟然波及到当世工艺品,而制作这些高价工艺品的工匠却是粗野颓废、胸无点墨的村

夫。不可否认,徐应雷是带有浓重的个人情感的,他在见大彬之前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反感,后文的评述难免掺杂了苛刻和偏见,但他也不至于颠倒黑白,凭空捏造。况且徐应雷并未直接否定大彬壶的质量,也承认了时大彬闭门抟埴、费心尽力的精神,只是再精美的作品也是微不足道的小艺,难登大雅之堂,不值得也不应该索取高价。葛应秋则意在表达对自己收藏的大彬款紫砂壶的爱惜,虽然破裂,却不忍舍弃。他所记录的时大彬是个性情中人,不畏权势,不趋炎附势;制壶全凭个人喜好,随性发挥;制作时全神贯注,对作品的质量严格把关,追求完美,对瑕疵品宁可砸碎也不外流。从文字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时大彬对知书达理之士的敬重。相比较而言,《瓦壶记》的描述更加有血有肉。

面对文献记录的差异,要筛选出相对真实的信息,但不可避免会带着些见仁见智的色彩,以下所谈也仅为个人拙见。

第一,时大彬家贫、朴野、嗜酒的记载应该是真实的。在我国传统的士民社会里,工匠的地位较低,早期没有独立的身份和人身自由,甚至被视为一种财富。明清两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匠的独立性和价值得以提升,但由于所从事的工作无关社稷民生,仍被视为以供消遣的微艺小技,对他们的重视程度往往低于他们所创造的工艺品。宜兴紫砂艺人的作品受到

^①葛应秋:《石丈斋集·瓦壶记》,《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六辑,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材质和器用的局限,若无特定的社会因素,是无法实现财富积累的。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时大彬,生活习惯与一般的乡野村夫无异,加上整天与砂泥为伴,枯燥乏味,无所寄托,饮酒取乐可能是唯一的消遣方式,养成了懒散懈怠的习气。

第二,时大彬对砂壶有着相当的热情和严格的要求。先不论时大彬制作砂壶的动力是什么,也不管创作频率的多少和投入时间精力的多寡,一旦开始创作必定是全神贯注,心无旁骛的,正如徐文中的“始闭门,竟日埴埴”和葛文中的“解衣磅礴、科头攘臂而为壶,专气一神,得心应手”。大彬对作品的审核相当严格,这也是每一把大彬壶都那么精美的关键。尽管未必如葛文所说的“稍歉点,辄引铁椎碎之”这般苛求,但大彬壶出品率低也是事实,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记》中引黄商隐言:“时氏之埴,出火得八九焉,今不能二三,盖壶去之矣”^①,亦可为证。

第三,时大彬有着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主观意志。陶艺家成就的高低与其对艺术的理解有很大关系,制器时需有成器于胸中,对所要达到的效果有着清晰的认识。宜兴紫砂名家前有供春、万历四家,后有仲芳、友泉诸辈,独大彬

“标大雅之遗,擅空群之目”,这与大彬本身对陶艺的理解和坚持密不可分。《瓦壶记》说他“挑达迂疏,负气自亢”、“或三五月弗染指,或闭门便六七旬弗出”、“品式不主故常,奇奇怪怪,相逼而来”,说明了他自视颇高,艺术创作全凭个人意愿,不受外界因素影响,乐于尝试,不拘泥陈式。

第四,时大彬重文儒。徐、葛两人眼中的时大彬是胸无大志的乡野村夫,江盈科等人则称其热衷于结交名流,两种形象相去甚远,冒然断其是非未免不妥。记录者的立场、态度、情绪、和对对象的亲疏以及接触的时间节点都有可能导致看法的出入。时大彬的两种形象或许出现于一生中的不同时段^②,成名前或许是无人问迹的无名小卒,成名后受到达官名流竞相追捧,加上砂壶供不应求所带来的财富,心境、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待人接物的方式难保不发生变化,但时大彬对于有学识知礼仪的士人的敬慕是一以贯之的。

(二) 大彬壶的价值

明代中晚期,江南的官僚豪绅、文人士大夫对大彬壶的渴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除了重金求购外还不惜动用官府的力量。以砂壶之微而与商周鼎彝同列实

①《梅花草堂笔记·时大彬》,《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十二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

②陆明华在《明清紫砂三大名家陶艺考略》一文中已提出了《书时大彬事》描写的也许是成名后不久某一时期的形象。

非寻常,无怪时人感叹世风浮华^①。大彬壶的高价有多方面的因素。首先,要有权威的推崇。晚明的宦宦、儒士皆好饮茶,喜用砂壶,大彬以壶混迹于宦儒集团中,并迎合其喜好制作小壶,赞美之声愈盛,身价愈高,形成良性循环。其次,要有无可匹敌的技艺。大彬既有家传世技,又能仿供春,采诸家之长,更有创新,在众多陶匠中卓然超群,余家皆不能企及。再次,物以稀为贵。大彬用粗砂制壶,对窑火的控制要求很高。火力不足会有土气,火力稍过又容易破碎^②。大彬追求完美,对作品把控很严,稍有瑕疵即销毁。以上两点使得大彬壶出品率极低。

明人对时壶的价值和风靡程度有着不一致的看法,如谢肇淛就表示“不知其解”,徐应雷则直白地声称“必击碎之为快”,这种不解和厌恶有着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

1. 紫砂壶在明代早中期尚未成风。

我国饮茶方式观其起承主要有唐、宋、明三个阶段,即唐代的煎茶,宋代的点

茶和明代的散茶。明洪武二十四年下诏罢龙凤团,茶风之变由之始。然而,长期形成的旧的饮茶习惯却不会立刻消失。明人的饮茶方式,以明世宗嘉靖为分水岭,嘉靖前多沿袭宋代的点茶法,嘉靖后则以瀹泡为主^③。在明代早中期的著录中我们可以发现品茶论茶之士仍在使用和推崇宋人的茶具,如朱权《茶谱·器具》中仅提到建盏、饶瓷和瓷茶瓶。直到天启时,冯可宾才明确指出“茶壶窑器为上”^④。按周高起“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推算砂壶兴起的时间早不过嘉靖,初兴之时的影响力也仅限于江浙一带,直到明末清初才逐渐成为茶具的主流。

2. 仿品泛滥。

晚明仿制大彬壶成风,以大彬的弟子李仲芳、邵文金、陈信卿等人为代表。《阳羨茗壶系》称:“今世所传大彬壶,亦有仲芳作之,大彬见赏而自署款识者,时人语曰:‘李大瓶,时大名’”;“仲芳亦时代大彬刻款,手法自逊”;“邵文金仿时大彬汉方,独绝”;“陈信卿仿时、李诸传

①张岱《陶庵梦忆》有言:“夫砂罐,砂也。锡注,锡也。器方脱手,而一罐一注,价五六金,则是砂与锡之价其轻重正相等焉,岂非怪事?”李渔《杂说》感叹:“然宝之过情,使与金玉比值,毋乃仲尼不为已甚乎?”《阳羨茗壶系》也说:“名手所做一壶,重不数两,价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世亦趋华,抑足感矣。”

②参见《茶疏》:“顾烧时必须为力极足,方可出窑。然火候少过,壶又多碎坏者,以是益加贵重。火力不到者,如以生砂注水,土气满鼻,不中用也,较之锡器,尚减三分。”

③参见廖建智《明代茶文化艺术》,秀威资讯科技,2007年2月。

④冯可宾:《芥茶笺》,《昭代丛书·辛集》,世楷堂刻印本。

器”^①。留名的仿制者为数不少,不留名者应当更多,而相对前者的精仿,后者粗制的可能性更大,造成大彬壶良莠不齐的面貌。陈维崧《湖海楼诗集》言:“时壶市纵有人卖,往往赝物非其真”^②,可见当时市场上的大彬壶大多为仿品,连葛应秋也对购自郡市的时大彬款砂壶表示不审真贋。相信除了那些有机会亲密接触作者和作品的壶痴、茶痴外,大多数人无从区分真贋,面对鱼目混珠、高价哄抬的现象也就有了“不知其解”之叹^③。尽管无法确切了解真品和仿品间的差异,从张岱所谓“细泥精巧,皆是后人所濶”来看^④,那些胎质细腻、精致小巧的大彬壶极有可能是仿品。

(三)大彬陶艺生涯考

关于时大彬的生卒年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详细考证,这里仅从文献出发谈谈时大彬紫砂生涯的起迄和风格转折点。大彬父时朋为万历年间人,不妨以之为基点。假设万历时期时朋已进入晚年,大彬出生时间可能早到隆庆(1567-1572),甚至嘉靖(1522-1566)晚期,那么其创作期最可能出现在万历早期,即1573年后的四五十年。

1. 王世贞和陈继儒

《阳羨茗壶系》载大彬游娄东时,“闻眉公与琅琊太原诸公品茶施茶之论,乃作小壶”,眉公即陈继儒,而琅琊太原诸公则指王世贞,或者还包括其家族成员。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太仓州人,嘉靖丁未年进士,活跃于嘉靖、隆庆两朝。隆庆四年(1570)其母病逝后辞官服丧,渐渐淡出仕途。万历时虽得多次启用,终究无心恋政。王世贞曾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游吴中、宜兴等地,万历四年(1576)隐居弇山园,与吴地名士相交甚厚^⑤。弟世懋(1536-1588)字敬美,号麟州;子士骥字罔伯,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曾与陈继儒观画于弇山园。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华亭人。少有才,与同郡董其昌齐名。年二十八结隐于小昆山,亲亡后移居东佘山,与三吴名士往来甚密,为王锡爵、王世贞等所雅重。年八十二卒^⑥。时大彬游娄东最可能发生在陈继儒隐居后、王世贞辞世前或辞世后不久的一段时间内,即1590前后几年。

2. 文献和作者

文献的成书时间和作者的活动年代也可作为探究大彬从艺生涯的旁证。

①周高起:《阳羨茗壶系》,《檀几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②《陈维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③见谢肇淛《五杂俎》,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④张岱:《夜航船》,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⑤参见钱大昕《弇州山人年谱》,《嘉定钱大昕全集》(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⑥参见《明史·隐逸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

姓 名	生卒年	著 作	成书时间
许次纾	1549-1604	《茶疏》	万历二十五年(1597)
张大复	1554-1630	《梅花草堂笔谈》	1594 年以后 ^①
江盈科	1555-1605	《雪涛谐史》	1605 年前 ^②
谢肇淛	1567-1624	《五杂俎》	最早为万历四十四年(1616)刻本
罗 廌	1573-1620	《茶解》	1612 年 ^③
冯梦龙	1574-1646	《古今谭概》	初刻于 1620 年 ^④
凌濛初	1580-1644	《初刻拍案惊奇》	1627 年
文震亨	1585-1645	《长物志》	崇祯七年(1621)
周高起	1596-1645	《阳羨茗壶系》	崇祯十三年(1640)前后
张 岱	1597-1679	《夜航船》	1665-1679 年间 ^⑤
陈贞慧	1604-1656	《秋园杂佩》	1648 年 ^⑥

可以发现,著录者们生活于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上半叶,多集中于1550-1650这一百年的时间里。从《茶疏》的成书时间来看,1597年前时大彬已经开始制作砂壶。《古今谭概》记录了时大彬被昆山令囚禁致死,则大彬应卒于1620年前。

1595年前后的《茶录》称煮茶宜用银、锡瓢,瓷器不能持久;1597年的《茶疏》中亦言茶注以银、锡为上,次则瓷壶,砂壶更在其后,则1590-1600尚处于新旧饮茶方

式的更替期内。文中的“往时龚春”、“近日时彬”说明了记录时供春已死、大彬正当年,而“茶注宜小,不宜甚大”之语又与眉公等人茶论一致,推测当时小壶已经开始流行。江盈科曾于1592-1598年间任长洲知县^⑦,笔下的时大彬与士大夫交往甚密,制作的磁罐极其精工,已经完成了陶艺风格的转变。1604年成书的《茶录·末集·茶具十二执事名说》中提到“今仪兴时氏多雅制”也印证了此点^⑧。1620年的《长物志》

①作者在《梅花草堂笔谈》自序中有言:“行年四十,弃去举子业”,该书当作于其隐逸之时。

②袁宏道(1568-1610)曾为《雪涛阁集》作序,依袁氏卒年推定。

③据《茶解·序》推定。

④书中自序落款“庚申春朝书于墨憨斋”。

⑤张岱1665年撰写的《自为墓志铭》中罗列的著作中并无此书,其孙刻印的《西湖梦寻·凡例》中提及此书,并言其父所著多为刊印。

⑥据原书自序推定。

⑦参见《苏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⑧朱自振、沈冬梅:《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

明确表示供春壶“第形不雅”、“时大彬所制又太小”,说明当时离大彬初创期已远,时人只知小壶,不知大壶。

综上,时大彬制作砂壶主要在1570-1620这五十年内,壶风的转变很可能发生在1590-1600年间。正是随着小壶的流行,紫砂茶具的主导地位真正得以确立。

二. 明人与紫砂

明代是宜兴紫砂从日用缸瓦器变为品玩雅器的关键时期。《茗壶系》等书记载砂壶之创始者为金沙寺僧尽管不可考,其直接传承者供春为正德、嘉靖间人。时大彬的崛起和大彬壶的风靡标志着茶风变革的完成和紫砂工艺的成熟。明代晚期,随着隐士、茶人、赏玩文人的团体活动,宜兴紫砂器还被赋予其他的功能。

(一) 品茗

明代中晚期,随着散茶的普及,用茶壶注茶成为主要形式,简便有趣又能“尽茶之真味”^①。紫砂茶壶“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②,成为首选之上品。当时不少在朝为官或尚未入仕的文人纷纷隐逸山林,吟诗题画,品茗对弈,以独善修身来躲避现实。以茶会友是文人居士间纯粹而清雅的

交流方式,长此以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茶泉、茶叶、茶汤的优劣、茶具的选择和保养,延伸至环境的布置和人员的配备。《遵生八笺》中有一段描述茶寮的文字可为一观:“侧室一斗,相傍书斋,内设茶笼一,茶盏六,茶注二,余一以注熟水,茶臼一拂,刷净布各一,炭箱一,火钳一,火筋一,火扇一,火斗一,可烧香饼,茶盘一,茶橐二。当教童子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煎法另具。”^③再如陈继儒《小窗幽记》中的“净几明窗,一轴画,一囊琴,一只鹤,一瓯茶,一炉香,一部法帖”^④,道出了茶士闲适清雅之真性情。

砂壶和瓷瓯的组合开始成为晚明茶事的必备。茶瓯从黑盏为上转变为白瓯为佳,如《茶疏·瓯注》所言:“古取建窑兔毛花者,亦斗碾茶用之宜耳。其在今日,纯白为佳,兼贵于小。”^⑤定窑白瓷最为贵重,但毕竟久远难得。景德镇窑和德化窑白瓷则恰到好处地填补了需求的空缺。除了白瓷外,景德镇窑青花碗也是常见的饮茶器具,“盏以雪白者为上,蓝白者不损茶色,次之”^⑥,“次用真正回青,必拣圆整,勿用

①《长物志·茶品》,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

②《长物志·茶壶茶盏》,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

③高濂:《遵生八笺·高子书斋说》,中华书局2013年版。

④陈继儒:《小窗幽记》,中华书局2008年版。

⑤《茶疏·瓯注》,《丛书集成初编·茶录及其他五种》,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⑥《茶录·茶盏》,《中国茶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窑窰”。^①砂壶与瓷瓿的组合关系从明代晚期开始固定,清代更为普及。出土砂壶的地点常伴出青花或白瓷碗,亦或两者兼有之,如吴经墓伴出有白釉瓷盅,华师伊墓同出多件青花碗,延安杨如桂墓同出了4件青花杯和1件乳白釉碗,三台窖藏中也发现青花和白釉碗、杯(图一)。

(二)赏玩

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在《袁中郎全集》中有一段关于“时尚”的描写:“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然皆吴人。瓦瓶如龚春、时大彬,价至二、三千钱,龚春尤称难得,黄质而膩,光华若玉。铜炉称胡四,苏松人,有效铸者,皆不能及。扇面称何得之。锡器称赵良璧,一瓶可值千钱,敲之作金石声,一时好事家争购之,如恐不及。其事皆始于吴中猥子,转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子,动得重货,浸淫至士大夫间,遂以成风。”^②晚明江南地区的文士豪绅兴起一股玩物之风,除了古董字画外,砂壶、铜炉、扇面、锡器这些当世工艺品也成为高价竞逐的宝货。安徽、浙江的商人集团成为助推此风的重要媒介,他们活跃于士大夫之间,投其所好,以高价谋取暴利的同时也拉进了与文



图一 四川三台晚明窖藏出土器物

儒之间的距离,使得士商关系更为密切。

文人士大夫对茶事和收藏的热衷促使了茶具与赏器的合二为一,名家制壶价至数金。以名壶待客是彰显主人财富与品位的一种方式,《梅花草堂集》就提到“吴会之散人佛士家置一炉,客至必爇香煮茗,贮之时大彬壶,以手拭而进之,谓之近人矣”。^③为备不时之需而配置的砂壶逐渐成为装点居室的元素之一,这在明代小说中亦有体现,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二描述汪锡家宅居室陈设时有“壁间纸画周之冕,桌上砂壶时大彬”之句^④。

(三)随葬

上世纪60年代以来,江苏、福建、山西、陕西、湖北各省明墓出土了数件紫砂

①《茶疏·瓿注》,《丛书集成初编·茶录及其他五种》,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②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十六《杂录》,《明代论著丛刊》第二辑,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

③张大复:《梅花草堂集·泗上戏书》(影印刻本),《笔记小说大观》第32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版。

④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二,中华书局2009年版。

明代墓葬出土紫砂器^①

器 型	出 土 信 息
柿蒂纹提梁壶	江苏南京市马家山明嘉靖十二年(1533)吴经墓
大彬款六方壶	江苏江都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曹氏墓
大彬款柿蒂纹三足壶	江苏锡山明崇祯二年(1629)华师伊墓
四系扁壶	江苏无锡县东湖塘乡明墓
六边形紫砂罐	江苏常州市潞城镇邓家村明墓(图二)
时大彬制款鼎足盖圆壶	福建漳浦县盘陀乡通坑村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卢维祯墓
丁未夏日时大彬制款圆壶	山西晋城明崇祯五年(1632)张光奎墓
大彬款腰圆式提梁壶	陕西延安明崇祯十五年(1642)杨桂如墓
紫砂罐	湖北武汉江夏四股山明墓(图三)

器,除了熟知的几把紫砂壶外,还有两个紫砂罐,其中四股山明墓砂罐的底部刻有“壬午中秋时大彬制”款。查明代晚期壬午年有1582年和1642年,墓葬同出的“玉堂佳器”款青花人物碗应为崇祯年间产品,则此壬午年应为1642年。以往大彬款只见于紫砂壶上,此为墓葬出土大彬款砂罐的第一例。且不论真伪,是否可以认为晚明紫砂器上的大彬款识已然具有了类似品牌的功能。

出土紫砂器的墓葬多数分布于江苏省内,即习称的“吴地”,正是阳羨茶和宜兴壶的流行区。隐居山水之间的名流雅士



图二 常州邓家村明墓出土紫砂罐

①参考书目:梁白泉《宜兴紫砂》,两木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南京博物院、成阳艺术文化基金会《砂壶汇赏》,香港王朝艺术文化出版社 2004 年版;蒋华《江都明墓出土时大彬六方紫砂壶》,《文物》1982 年第 6 期;冯普仁、吕兴元《江苏无锡县明华师伊夫妇墓》,《文物》1989 年第 7 期;常州市博物馆《常州市区明墓群的发掘》,《东南文化》2003 年第 11 期;王文径《明户·工二部侍郎卢维祯墓》,《东南文化》1989 年第 3 期;姬乃军《延安杨桂如墓》,《文物》1993 年第 2 期;何志国、许蓉、胥泽蓉《绵阳市红星街出土明代窖藏》,《四川文物》1990 年第 2 期;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江夏区博物馆《武汉江夏流芳四股山明墓发掘简报》,《武汉文博》2010 年第 4 期。



图三 江夏四股山明墓出土紫砂罐

们品茶论道,以茶会友,茶具既是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具,也是欣赏把玩的艺术品。同时,江南地区发达的商品经济和浮华的

世风使得名家砂壶也成为宝贵的财富。用紫砂器随葬呈现出一定的地域性,是吴地瀹茶之习和收藏之风综合作用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墓主与吴地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如吴经在正德年间曾任南京织造,华师伊乃无锡望族华察之孙,他们都有机会获得当时较为珍贵的紫砂茶具。

随葬茶具的现象还随着人们的活动突破了地域限制。福建卢维祯墓和山西张光奎墓紫砂壶发现时皆装满茶叶,是墓主的生活习惯和个人喜好在死后的继续。四川绵阳和三台两处明代窖藏出土的大彬款紫砂壶虽然并非墓葬材料,却预示了晚明以后宜兴紫砂必将随着散茶和瀹泡法的普及而大行天下。

(作者单位:上海博物馆)

(编辑:阎智海)

《衣冠明道——泰州明墓出土服饰展》在江阴展出

2014年9月1日,《衣冠明道——泰州明墓出土服饰展》在江阴市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系“2014年全省馆藏文物巡回展”评选出的十大展览之一,展览选取了泰州地区历年出土的各类服饰文物,如乌纱帽、头巾、风帽、直裰、襦、袄、袍、背

心、裙、裳、裤、膝袜、凤头鞋、革带以及少量的首饰与佩饰等,生动再现了四百年前明代服饰的灿烂文化。通过此次市博物馆举办的泰州明墓出土服饰展,可以比较全面直观地了解明代服饰,特别是明代泰州地区的服饰习俗。

认知中国“宜均”

周小东 瞿华娣

宜兴均釉陶器以其温润醇厚、朦胧静雅的釉色以及神奇独到、妙手生花的拇指堆贴工艺而蜚声中外,它们和宜兴紫砂并称“陶都三宝”。

宜兴均釉陶器简称“宜均”。由于历史资料缺乏,有关它的起源发展以及称谓一直是业内讨论的问题。作为权威的中国硅酸盐学会编著的《中国陶瓷史》,仅仅在“明代景德镇以外的民营陶瓷业”一节中,有几段简要的文字说明;查阅有关历史著述,也只有零星的一些记载。明代谷应泰《博物要览》、王穉登《荆溪疏》,清代朱琰《陶说》、陈浏《匋雅》以及民国许之衡《饮流斋说瓷》等历史书籍中,讲到了“均窑”、“欧窑”和“宜均”、“广均”、“炉均”,也讲到“宜均”与河南“禹钧”以及“广均”与“禹钧”的关系。古书中对“宜均”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似钧”说,二是“仿钧”说。由于这些载述大都只是片言短语,再加上著书中重外观描述而缺少器物的胎釉及工艺分析,从而给后人留下一些疑问和误解。近年来发表和出版的一些文章和书籍,在讲述“宜均”起源时经常引用《博物要览》以及《匋雅》中的记载。但我们发现其存在引用不完整以及理解有误等问题。例如有人这样引用《博物要览》:“均窑,近年新

烧,皆宜兴砂土为骨,釉水微似,制有佳者。”这里引用者试图把“均窑”与“宜兴砂土”相关联,以此证明书中讲到的“均窑”是宜兴的。但是,谷应泰的《博物要览》(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一书中并没有这样的文字,翻开《博物要览》“论均窑器皿”:“均州窑有硃砂红、葱翠(俗名鹦哥绿)、茄皮紫,红若胭脂、青若葱绿、紫若墨黑,三者色纯无可变露者为上品。底有一二三四数目字号为记……故器质粗厚为不佳。”书中记述到此为止。而朱琰《陶说》一书则在“均州窑——今河南禹州”一节中,在引用《博物要览》上述文字外,还加上“近年新烧,皆宜兴砂土为骨,釉水微似,制有佳者,但不耐用”这段文字。这里,我们清楚看到,“古籍”中讲到的“均窑”明确是指河南钧州窑,而非宜兴“均窑”。关于“近年新烧”之解,通过查阅《文物参考》1951年第2期,陈万里先生《禹州之行》一文指出:“汝窑只有宋,而没有元;钧窑有宋,而没有明。因为至明宣德年间,当地已不能烧钧瓷了。”由于禹州钧窑停烧,而此时“宜均”、“广均”的出现,所以才有“近年新烧”的说法。再有人是如下引用《匋雅》一书的:“均窑压手大杯,细腰丰趺、亭亭玉立,并有蚯蚓走泥印,内青而外紫,鲜妍罕匹,

真宋物也。……有一种均窑笔洗,极为别致,釉质青葱倩紫,若蜡泪堆成,糊以芝麻酱,真宋物也。”引用人随后加上如下评述:“意思就是宜均陶器造型优美,釉面流动情况很好,色彩也很鲜艳,是真正的宋代物品。”这里我们不禁要问:陈浏《匋雅》一书所述的“均窑”以及“压手杯”、“笔洗”真的是宋代宜均陶器吗?翻开古籍《匋雅》,其实在这本书中不止一处讲到“均窑”,也讲到“宜均”和“欧窑”,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上述引用中将一些关键文字漏掉了。《匋雅》记载:“均窑压手大杯,细腰丰趺、亭亭玉立,并有蚯蚓走泥印,内青而外紫,鲜妍罕匹,真宋物也。有一种均窑笔洗,长方六角……底有阴文数目之号码,糊以芝麻酱,真宋物也。古物之美者以釉质、手工、时代三者为最重要,三者毕精约而弥珍……”上述《匋雅》记述中讲到二个关键知识点:一是“蚯蚓走泥印”;二是“底有阴文数目之号码”。对于研究陶瓷的人来讲,其实大家都明白:这二大特征非宜兴陶器所有,而是河南禹州钧瓷之特点也。宋代五大名窑“汝、定、官、哥、钧”中,河南“钧瓷”的主要特点是器表内外局部会有一种短促而不规则裂纹细线,它们被釉层覆盖,俗称“蚯蚓走泥纹”。特别是器物底部印有一到十的单个数目印记,更是宋代“钧瓷”一大特色,不同数目代表了器型的大小,往往数字小的代表大件瓷器。

综上所述,明代《博物要览》、清代《陶

说》、《匋雅》等书中讲的“均窑”以及描述的“宋物”其实是指河南“钧窑”和“钧瓷”。为何写“均”而非“钧”,我们分析可能是避当时皇帝名号也。针对宜兴均釉陶器,这些“典籍”十分明确称其为“宜均”或“欧窑”。例如《匋雅》中记载:“宜兴砂器上罩釉汁,多甜白淡青二色。乃欧氏所仿,曰宜均也。”“广窑谓之泥均,其蓝色甚似灰也……此种胎骨以乌泥抻成。”近年来,随着各地不断开展考古研究,愈来愈多的事实证明:“宜均”以及“禹钧”、“广均”都有其鲜明的地域特质,它们都有各自的发展历史,并形成独特的工艺体系。

上世纪70年代,丁蜀镇羊角山(黄龙山东部)因厂家基建工程发现一古窑址。当时有关人员进行了小规模抢救性挖掘,出土了一批古陶器,多为残件。其中以紫砂为主,也有一些均釉陶器,这批东西后来大多收藏于宜兴陶瓷博物馆(当时还叫陈列馆)。羊角山紫砂器的出土理所当然成为宜兴紫砂历史起源的主要依据,同时也成为业界研讨和争论的焦点。但长期以来人们关注的主要是紫砂,而当年在同一区域出土的均釉陶器则少有人去研究。当年,南京大学蒋赞初教授在《关于宜兴陶瓷发展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记载:“在羊角山另一侧的废品堆积中,还发现有大量带‘欧窑’风格的‘宜均’器残片,根据与明代欧窑器的对比及同时出土的青花瓷器的年代,均可定为明清之际的产品。且也为研究宜兴的明代名窑——‘欧窑’的历



图一

史提供了主要的线索。”近年来我们通过清理,发现这些均釉陶器从器型到釉色的确具有明代“欧窑”风格和特征,它们是不可多得的考古实物。

2005年,南京博物院考古所组织对宜兴古窑址考古工作,重点是“蜀山窑”古龙窑群挖掘工程。宜兴陶瓷博物馆作为成员之一,参与了该次活动。蜀山窑考古挖掘前后近三年时间,出土实物非常丰富,除大量紫砂器外,还有一批均釉陶器。考古报告表明,这些古龙窑的烧制纵贯明代中晚期到清代、民国时期,许多出土器物印证、补充、丰富了羊角山的发现。可以说这些出土物对研究宜兴紫砂发展以及研究宜兴均陶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次考古挖掘的出土物中一批精华部分留存宜兴陶瓷博物馆。

宜兴陶瓷博物馆从上世纪50年代的

“陶瓷陈列室”起,就不断征集各类藏品,包括各历史时期的均陶作品。其中有明代“龙头荷花缸”、清中期“葛窑”经典遗存以及清末民初时期大匠名师制品,更有当今工艺大师的名品佳作。它们是宜兴均釉陶器的代表和艺术珍宝,较好地反映了“宜均”的历史传承和发展(图一、图二、图三)。



图二



图三

我们认为,要研究“宜均”的起源、称谓及发展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以下几个关系,这很重要。

一. “宜均”与“均山”

有人这样解释“宜均”的称谓:宜兴均山一带生产的上釉陶器,所以叫“均陶”。这种说法是否合理正确呢?我们的观点是:首先在历史典籍中从未有过如此记载;另外重要的是它缺乏考古实物的支持。

“均山”地处丁蜀镇西南山区,古代曾经有过生产陶瓷的历史,人称“均山窑”。历史上这里没有进行过大规模考古挖掘,在几次小规模挖掘中,出土了许多青瓷、印纹陶以及釉陶等残片,同时还发现几座晋唐时期青瓷古窑址。“均山窑”虽有釉陶出土,但其胎质、釉水与传统的均釉陶器仍有较大区别。宜兴陶瓷史上以窑址命名产品的可能性不大,可真如此,那就不止有“均陶”,还应有“涧陶”(涧沔窑)、“筱陶”(筱王窑)、“羊陶”和“蜀陶”了。

我们也应该看到,历史上名人对一个地方的影响也确实存在。例如宋代苏东坡改“独山”为“蜀山”、韩世忠驻军而成“韩瓶”、明代的“欧窑”以及清代的“葛窑”等。

《饮流斋说瓷》记载:“欧窑——名宜均,乃明代宜兴人欧子明所制。形式大半仿钧,故曰宜均也。”“欧窑”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宜兴著名陶工欧子明所创,他善制均釉陶器,制品形制妍整、釉色奇美清雅,也称“欧窑”。由于存世品极少,并大多

藏于博物馆,堪称稀世珍品。“欧窑”的出现,证明了“宜均”生产工艺在明代晚期进入了成熟期,它在宜兴均釉陶器制作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葛窑”——清代乾嘉年间宜兴陶工葛明祥、葛源祥兄弟俩所创。“葛窑”均釉制品造型多样、釉彩多变,产品畅销日本、东南亚一带,有的还通过南亚转销到世界各地。“葛窑”在“欧窑”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壮大,将“宜均”推向了一个历史高峰。由于“葛窑”制品较为丰富,国内许多博物馆都有馆藏。宜兴陶瓷博物馆就有多件,其中一件“灰蓝釉抽线罐”(图四),造型简约大气,釉色醇厚润泽,釉质中的点点晕斑弥漫器身,尤如浩瀚星空中的繁星,充满了神秘之美。“灰中有蓝晕,艳若蝴蝶花”就是对这种釉色的赞誉。目前,民间有不少“葛窑”专门收藏家,有的品位还相当高,真正体现藏宝于民。

通过考古挖掘,历史上“欧窑”、“葛窑”的生产场地都不在“均山”一带。我们认为“宜均”称谓主要是受其历史著书影



图四

响,“均”由“钧”来,明万历年为避皇帝朱翊钧之名号,“钧”改“均”也。本来宜兴均陶是陶土而非瓷土,“宜均”也就名正言顺了。应该说“宜均”是“均山”釉陶的传承和发展,但其称谓与“均山”没有直接关系。“宜均”在明代因“欧窑”而成名,在清代继“葛窑”而发展,于当代传承而宏扬。

二. “宜均”与“禹钧”

江苏宜兴与河南禹县,相距千里。一个是当代中国著名的“陶都”,另一个是宋代五大名窑中“钧窑”的生产地。因为明清几本古籍,将两者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前面讲述过的“似钧”与“仿钧”说。

“钧窑”在河南禹县(古称禹州),系北方青瓷窑系。宋代钧窑创用铜的氧化物作为发色剂,在还原气氛下烧制成功铜红釉,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为我国陶瓷工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

其实宜兴“均陶”与禹县“钧瓷”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首先一个是陶器(陶胎),一个是瓷器(瓷胎);第二是成型工艺不同:“宜均”是泥片镶接拍打成型,“钧瓷”是拉坯成型;三是制釉以及上釉方式不同;四是烧成温度以及烧成气氛不同:“宜均”是1200℃氧化焰烧成,“钧瓷”是1300℃还原焰烧成。

我们应该认识到,在明代以前河南“钧窑”比宜兴名气大得多。《中国陶瓷史》在“钧窑及钧窑系诸窑”一节中记载:“六十年代初期,故宫博物院两次派人去禹县

与临汝县窑址进行调查,采集了大量的标本……盆、托及尊等宫廷使用器物的底部均刻一个由一到十的数目;同时出土的还有瓷土制作的‘宣和元宝’方形钱范,表明了宫廷用瓷为宋代物,它提示人们北宋晚期是钧窑的鼎盛时期。”书中同时指出:“蚯蚓走泥纹也是均釉的特征之一,这种纹的形成原因是由于釉层在干燥时或烧成初期发生干裂,后来在高温阶段又被粘度较低的部分流入空隙填补裂罅所形成的。钧釉的釉层特别厚,瓷胎在上釉前先经素烧,因而促使裂纹和缩釉等现象出现。”另还记载:“宋钧窑器带铭文的很少,仅见‘奉华’及‘省符’两种。‘奉华’系宋宫殿名,汝窑、定窑及钧窑均有此铭文,而‘省符’字也不解何义。有人认为‘省’字可能为‘祥’字之误……”从上所述,我们清楚看到,河南“禹钧”在北宋晚期已非常有名,“钧窑”已是为皇家生产的“官窑”。这样我们也容易理解《博物要览》、《匋雅》等著者的观点,他们注重的是“官窑”、“官器”,而对民间窑场的工艺、生产了解不多。在著书中存在“主观性、片面性”在所难免,但作为难得的历史资料,还是有许多参考价值的。

近年来,随着宜兴紫砂名声日盛,宜兴均釉陶器同时在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社会各界研究紫砂、研究均陶的人也多起来,经常看到有关紫砂和均陶的文章和书籍。宣传宜兴陶文化是一件好事,但从中我们也看到一些问题。2007年紫禁



图五

城出版社出版《宜兴紫砂》一书,书中记载一件“宜均天青釉七孔花插”(图五)。图片下方标注:“明、清宫旧藏,高25.1厘米、口径8.1厘米、足径14.9厘米”。文字说明:“底部涩胎上刷铁褐色护胎汁,中心书篆体‘宜兴内用’四字双行款。”2003年,《收藏》杂志第11期有《清宫旧藏“宜兴挂釉”与广钧器》一文。文中列举了若干器物图片,其中一件明宜兴窑“天蓝釉七孔花插”,高25.1厘米、口径8.1厘米、足径14.9厘米。文字说明:“底部施铁褐色护胎釉,并竖刻篆书‘宣和内府’四字款”。从图片以及尺寸看这是同一件器物无疑,问题是同时出于北京故宫学者的描述却大相径庭,让人不可理解。

“宜兴内用”显然不可能有这样的印

款,“宣和内府”则是北宋宫廷印款。包括以上二本书中记载的另一件刻“祥符”标识的葫芦瓶,虽然书中标注是明代“宜均”器,但我们认为以上器物从产地到年代都值得进一步探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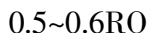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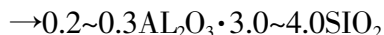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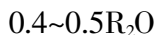
三. “宜均”与“广均”

宜兴古代称为“阳羨”,而广东石湾旧时叫“阳江”。世间存在许多巧合,当年“宜均”烧造的同一时期,在广东石湾一带也在生产一种上釉陶器。石湾釉陶用当地乌泥和白土作胎,某些产品胎质及其外观与“禹钧”、“宜均”很相似,明清一些典籍上称其为“广窑”或“泥均”。《匋雅》中记载:“‘广窑’谓之‘泥均’,其蓝色甚似灰也……此种胎骨系以乌泥抻成,而仿用宋均青色之釉汁,故曰泥均。或谓系阳羨砂所制。泥、宜音本相近,乃宜兴所仿之钧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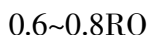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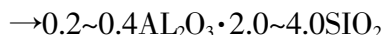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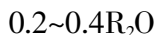
“宜均”和“广均”器同为陶器,同样以“铁”、“铜”作发色元素,在氧化气氛烧成中生成一些外观相近的器皿。特别是白胎乳白釉细纹釉陶更难区分,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湾故宫博物院均有此类作品典藏,但人们往往也将它们搞混。

我们认真研究两地产品,会发现它们的一些差别:一是陶胎区别,“宜均”紫胎比“广均”稍粗,但其白胎则比“广均”要细腻;二是制釉原料不同,它们都是就地取材。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和江苏省陶瓷研究所对宜兴均釉和广东石湾釉做过实验对比。“宜均”釉所含成

分基本实验式为:



“广均”釉实验式为:



可见两者釉料成分区别较大;三是“宜均”釉色多温润淡雅,“广均”釉色则更浓烈、艳丽;四是“宜均”器之底露胎较少,“广均”之底露胎较多;五是“宜均”器底一般不上护胎釉,而“广均”底足大多上护胎釉;第六是“宜均”生坯上釉一次烧成,而“广均”先素烧再上釉系二次烧成。

应该说宜兴“均陶”与石湾“广均”在历史上是平行独立发展的,它们之间不存在谁仿谁的问题,并且目前两地的生产状况都比较好。

四. “宜均”与“炉钧”

“炉钧”上釉陶瓷是清早期江西景德镇仿“宜均”、“广均”制品,它创烧于清雍正早年。历史上有唐英督造的记载,《陶雅》中述:“阳羨(宜兴)、阳江(佛山)彼此互仿,唐英又在景德镇兼仿阳江、阳羨两窑之器,参伍错综、益复不易辨析……”当年清宫造办处还专门以宜兴紫砂为胎,制作了一批“炉钧”制品,以壶类为主,其釉色有“灰蓝釉”、“草绿釉”等。

由于“炉钧”器的胎质和釉色与“宜均”有一些相似,因而不少人将它们看作

一类(如图六所示,将炉钧紫砂壶写成宜均炉钧釉壶)。



图六

其实这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其主要区别:一是起源不同,“宜均”在明代就很有名,而“炉钧”则晚得多;二是制釉原料不同,“宜均”釉水主要以当地白泥、土骨、石脂以及石灰窑内壁凝结物(俗称窑汗)等原料制作而成,而“炉钧”釉水则是以铅、玻璃以及硝、砷等原料制成;三是上釉、烧成温度以及气氛不同,“宜均”是生坯上釉,高温氧化焰一次烧成,而“炉钧”则是生坯素烧,上釉低温还原焰二次烧成(俗称红炉);四是“宜均”釉色经久不变,而“炉钧”面釉用久色变。

“炉钧”紫砂器虽然外观华丽,但它掩盖了紫砂天然素色之美,更破坏了原本是其优点的透气性能。明代漆雕紫砂器、清康熙珐琅彩紫砂器、乾隆粉彩紫砂器以及后来的包锡、镶玉紫砂器等,它们都存在装饰过度的问题,因而后人较少效仿。

五. “宜均”与“故宫挂釉器”

“宜均”虽然是民间窑场,但“宜均器”在明中晚期因“欧窑”而名声渐起,同时也受到皇家的喜爱。就像“宫中艳说大彬壶”一样,这一时期宜兴均釉器也进入皇家殿堂。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几十件明清时期宫廷御用“宜均”陈设器。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宫廷原始档案中,没有发现标注有“宜均”文字的记载,但却有“宜兴挂釉器”或“欧窑”的称谓,其实“宜兴挂釉器”就是指“宜均”也。近年来,从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有关图书中,我们欣赏和认识了这批宫中旧藏。

统观这些物件,品种有瓶、盆、洗、孟等,釉色有天青、天蓝、茶末、灰蓝、月白(乳白)等。其端庄、优雅的造型,华贵、匀净的釉色,真不愧为宜兴均釉陶器中的精品。

六. “宜均”与“紫砂”

“宜均”器与“紫砂”器应该说是同根、同源的两朵姐妹花,其原料、烧成以及成型工艺都有着许多相关和相似之处。我们在考古挖掘中,经常在同一窑址中发现“宜均”和“紫砂”残片,这证明在古代它们是同窑烧制。

我们知道,“宜均”中紫胎原料取自丁蜀镇黄龙山甲泥矿,而“紫砂”则是甲泥矿中的一层特殊矿体;“宜均”中的白胎原料取自丁蜀镇南山白泥矿,而在清代就有将白泥用来制作茶壶的记载,民国时期白泥壶更多些。历史上从清康熙朝起,宜兴紫

砂多了上釉的装饰手法。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人会将两者搞混,2007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故宫博物院藏宜兴紫砂》一书就具有代表性。本书前言部分“宜均”一节是这样写的:“宜均是明中叶宜兴窑生产的一种挂釉紫砂。其釉色特点与宋河南钧窑窑变釉有某些相似之处,明人称之为‘宜均’。宜均制品胎体轻薄,烧成素砂胎后需上釉二次烧成,制作成本高而易碎。”很显然此书所述前段是把“宜均”误作“紫砂”一种,后段更是将“宜均”制作工艺搞错了。我们知道上釉是紫砂装饰工艺中的一种,但它不包含均釉陶器一类。就其本质,宜兴紫砂原料与“宜均”胎质还是有较大区别的。

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都藏有一批上釉紫砂器。它们是康熙“珐琅彩紫砂器”、雍正“炉钧釉紫砂器”、乾嘉“粉彩紫砂器”以及“点彩紫砂器”等,大多为紫砂茶具。这些上釉紫砂器与前面提到的“故宫挂釉器”即“宜均”是两回事。它们的胎质、釉水成分、上釉方式、烧成方式都是不同的。必须注意:珐琅彩、炉钧釉、粉彩以及点彩并不是宜兴当地原料和制作工艺,只有“宜均”釉才是当地“土釉”。

应该说经过几百年的传承和发展,“宜均”、“紫砂”都有各自特色流派和发展脉络。纵观明代以来宜兴陶瓷发展历史,“宜均”制品主要以陈设、园林以及建筑等较大型器皿为主;“紫砂”则以茶具、花盆

以及文玩等中小型器皿为主。两者在历史上均誉为“名陶无类”，宜均釉、拇指堆贴和紫砂并称“宜陶三宝”、“陶都三宝”！

综上所述，这里我们可以给“宜均”下一个综合定义：宜兴均釉陶器——简称宜兴均陶（也称“宜均”），它是宋代以后宜兴丁蜀地区生产的一种上釉陶器。其工艺特点是泥条盘筑或泥片镶接拍打成型、生坯上釉、高温氧化焰一次烧成。从古到今，“宜均”的制作工艺及器皿都具有浓郁的地方特征，胎釉原料大多就地取材。胎质有紫胎和白胎二种，紫胎系用当地甲泥制成，白胎则用白泥制作。釉水的风格和特点与以往传统釉陶有了根本的变化和提高，均釉色彩丰富、绚丽而不失温润与厚重。另外在传统陶瓷贴塑装饰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拇指堆贴技艺更称一绝。“宜均”制品运用广泛，器皿极具实用性、观赏性、地域性和民族性。

宜兴均陶历经几百年的传承和发展，以其“本土原料、传统工艺、民族特色”而在“陶都三宝”中占其二。今天，“宜均”作为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成为世界陶瓷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附录一：有关文献资料

[明]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明刻本：“均州窑，有朱砂红、葱翠青（俗谓莺

哥绿）、茄皮紫。红若胭脂，青若葱翠，紫若墨黑，三者色纯无少变露者为上品，底有一二数目字号为记。猪肝色，火里红，青绿错杂，若垂涎色，皆上三色之烧不足者，非别有此色样。俗即取作鼻涕涎、独肝等名，是可笑耳。此窑惟种菖蒲盆底佳甚。其它如坐墩、炉、方瓶、罐子，俱以黄砂泥为坯，故器质粗厚不佳，杂物人多不尚。近年新烧，皆以宜兴砂土为骨，釉水微似，制有佳者，但不耐用，俱无足取。”

[清]佚名《南窑笔记》：“均窑，北宋均州所造，多盆、奁、水底、花盆器皿。”

[清]朱琰《陶说》：“均州窑，今河南禹州。”

[清]陈浏《匋雅》上卷：“均窑独花盆为多，秘色葱茜。雍正仿之，且犹不能逼肖，况其后耶。”“均窑笔洗，紫茜弥望，中作曲蟾走泥纹，底有数目号码，糊以芝麻酱釉，其底上镌有横直字样者，皆非人世间物也。”“均窑压手大杯，细腰丰趺，亭亭玉立，并有蚯蚓走泥印，内青而外紫，鲜艳罕匹，真宋物也。”“有一种均窑笔洗，长方六角……底有阴文数目为号码，糊以芝麻酱，真宋物也。”

[民国]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说窑》：“均窑，宋初禹州所造，禹州昔号钧台，钧讹作均，相沿已久。”

（作者周小东系宜兴陶瓷博物馆、中国紫砂博物馆馆长，瞿华娣系国家级工艺美术师）

（编辑：阎智海）

宜兴紫砂陶“泥片围筑法”浅识

吉维明 咸子情

国务院于2008年6月7日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传统手工技艺”类中共列有12项陶瓷制作技艺,“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位居第一。宜兴紫砂陶自宋肇始,制作历史近800年,与不少陶瓷品种千年以上的制作历史相比,要“年轻态”一些,后来居上“首批首位”的殊荣彰显了其“传统手工技艺”超乎寻常的魅力和重大价值。

陶瓷的手工成型方法很多,主要有徒手捏塑法、泥条盘筑法、内模围筑法(含外模挡坯法)、旋轮拉坯法等,这些方法或单独,或结合,在紫砂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使用过或还使用着。明代壶艺鼻祖供春“陶细土抻坯”、“斫木为模”、“胎必累按”等,体现了徒手捏塑和内模围筑的技法特征。时大彬发扬供春壶艺,“则又弃模”、“炼土克谐(即制成熟泥块),审其燥湿,展之,名曰土毡(即加工成薄毡型的泥片),割而登(即按需要裁割并立起),诸月有序,先腹两端相见(即将长条状泥片围筑两端相接成闭合的筒体),廉用煤土(即以少量脂泥粘合)……”这种技艺脱胎于古法,又是对古法的变革、升华,充分发掘了紫砂陶土优于其它陶土、瓷土的无可比拟的潜质,以及适应了制作以茗壶为主的体

量小而功能强的器皿要求,与其它品类陶瓷的手工艺拉开了距离,具有独特的、系统的、强烈的、成熟的个性化“语言”,使手工艺进入了可夺造化的又一重天地。经过历代紫砂艺人的锤炼,其制作工艺更是炉火纯青,已成为宜兴紫砂陶的手艺“专利”和价值标识,成为紫砂“传统”的基石、“传承”的血脉。

陶瓷分为陶器和瓷器两大类,宜兴紫砂陶属于陶器(有人认为是介于陶和瓷两者之间的“炆器”,即使如此,其身份也属陶)。国家级首批“非遗”名录的陶瓷类中,有黎族原始制陶、傣族慢轮制陶、维吾尔族模制法土陶烧制,三者都属原始制陶的范畴。其中“慢轮制陶”和“模制法”等概括提炼了其基本特征,稍具陶瓷常识之人睹名即知傣族、维吾尔族制陶的特异之处;而“原始制陶”概念泛泛,除业内人士和相关专家外,一般人很难在“原始制陶”的名称上识别黎族制陶的技艺特色,显而易见,前者名称优于后者。“名录”上的“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和“黎族原始制陶”的情况相类,名称上看不出有别于它者的“符号”、“印记”,太过泛泛,令人不爽和遗憾。

“宜兴紫砂陶手工技艺”的独特方法和实质内容,业界和学术界均有基本一致的

共识,不少人对此进行概括表述,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手工技艺”贴上定向、定质和定性的“标签”,具体表述上虽趋同,但仍有一些差别,并不完全一致。笔者揣测,正因其不统一,故“名录”只能笼统地以“手工技艺”命名,无法揭示其特征。检索一下,如吴山教授称为“拍打镶接法”(见吴山主编的《中国紫砂辞典》之《前言》及相关辞条,江苏美术出版社);徐秀棠大师称为“泥片镶接法”或“泥条镶接拍打法”(见徐秀棠著《中国紫砂》,上海古籍出版社);顾绍培大师称为“打片镶接和拍打成型法”(见顾绍培《一代壶圣时大彬》,载于《陶都》杂志);曹婉芬大师称为“片筑法”(见曹婉芬《关于紫砂语言的思考》,载于顾安芝《紫河砂韵》);作家、紫砂研究者山谷概括为“手工抽打身筒和泥片镶接成型”(见山谷《世间茶具称为首》,载于《宜兴紫砂》杂志);无锡博物院在紫砂基本陈列中称“紫砂陶的成型方法,基本上都是‘打身筒’‘镶身筒’两种”;也有人将“打身筒”称之为“拍身筒”……为避免所指相同而表述不一的被动和尴尬,笔者梳理综合各家之言,认为以“泥片围筑法”作为“宜兴紫砂陶手工技艺”的独家“印记”和标帜,作为统一的“标准词”,较为合理、合适。

紫砂陶手工成型的主要方法,是将习惯上称为“泥路丝”的、按所制器皿所需的一定大小的泥段(或称泥块),用木搭子在泥橇上锤击拍打成厚薄均匀的泥片(也称为泥条),然后切割成长宽比例较大的和或

方或圆的“泥片”,再用“泥片”围筑、搭接镶合成半封闭或全封闭的空心筒形体,用脂泥粘结接缝。其后,圆形器在经过拍打使身筒变形,再镶接“底片”和“口满”后进行精加工,方形器则不一定经拍打变形,直接镶底口后进行精加工。这种成型方法“与我国及世界各地陶瓷成型方法都不同,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陶瓷成型技法”,“这些独特的高难度成型技法,是其它陶瓷产品无法比拟的”(引自《中国馆紫砂辞典》)。

紫砂技艺中,“泥片”极其重要。紫砂泥片性能优异,能方便地围筑大小、方圆不一的器皿,这种独到之处不仅体现在加工性能上,也体现在审美和使用功能上。前面例举的“拍打镶接法”中,“镶接”是用“泥片”进行的,“拍打”是在泥片“镶接”后的身筒上进行的,所以“泥片”是其中主角,“泥片”不必隐身,“泥片镶接法”的提法比“拍打镶接法”显得更清晰明白。“泥条镶接拍打法”中的“泥条”,其实是指截面为片状的矩形长条“泥片”,而与一般陶瓷“泥条盘筑法”中使用的,截面各个向度比例差别不大的长绳条形“泥条”完全不同。宜兴自古至今制作缸瓮等大型、较大型陶器时,采用长条形“泥条”盘筑,紫砂陶制作中将“泥片”称作“泥条”应该是沿用了缸瓮制作中的习惯称谓。即便如此,“泥条”是揉搓成条的,“泥片”是捶打成片的,“泥片”比之“泥条”更符合紫砂制作的实际。何况“底片”、“口满”等“泥片”是不能称为“泥条”的,故“泥条”和“泥片”这二种称谓同时存在。如徐秀棠的

相关提法中,两个称谓并用、不加区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泥片”的使用频率更高,“泥条镶接拍打法”中的“泥条”宜顺应大势,统一称“泥片”为好。

紫砂技艺中,“围筑”关乎根本。紫砂圆形器是用长度约略超过身筒底径周长的条形泥片竖起围筑,搭接成身筒;方形器是用数块泥片竖立、围筑搭接成身筒。在一些表述中出现过的“镶接”,从字面上看,既可指立体,又可指平面的连接,不如“围筑”,只用在立体器体之上。在实际操作中,“镶接”也是“围筑”所决定和要求的一个基本手段,底部、口部和肩部等处镶接泥片也只是围筑过程中的重要工序,“围筑”中包含了“镶接”是毋庸置疑的。同样,“打身筒”(也称“拍身筒”)是“围筑”圆形器后进行后续加工的重要手工技艺法之一,“镶身筒”是“围筑”方形器的一种习惯称谓,分别偏“圆”偏“方”,不能替代包容“方圆”的“围筑”。

宜兴紫砂陶“泥片围筑法”的提出和确立,有一定的学术意义。“泥片围筑法”与“徒手捏塑法”、“泥条盘筑法”、“旋轮拉坯法”等都明显不同,与“内模围筑法”等有借鉴关系,但在“无模”和“用模”上发生技艺上的根本区别,因而在众多陶瓷技艺中独树一帜。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是配套成龙、丰富复杂的,练泥配泥、镶接拍打、明针修压、装饰烧成等等,都是传统精华所在,“泥片围筑法”不能也不会把这些“打包”,但它担当了“头牌”,是“台柱子”。“片筑法”或许

是“泥片围筑法”的简称,但简化了“泥”和“围”,缺质少形,也不很妥切。“泥片围筑法”从独特的技艺和鲜明的形象两个视角诠释了宜兴紫砂陶手工技艺的外在形式和内在实质,以此调整、统一“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学术内涵的表述,或许名实相符、切中肯綮,应为可用的选择。当然,这只是笔者管窥之见,仅供讨论。

“泥片围筑法”使宜兴紫砂陶以手工陶艺的集大成者和终极者的身份卓立于陶瓷之巅,风流数百年,不断撰写传承新篇章。首先,“泥片围筑法”充分释放和挖掘了手工的潜力,凭空成型、随心所欲,造型丰富,规格齐全,不仅“方非一式、圆不一相”,且延伸至筋囊花塑,多姿多彩、变化无穷,在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品类、特别是手工制品中,没有谁能与之相比肩的。其次,“泥片”是以炼熟并陈腐了一定时间的泥段经强力击拍打压而成,结构既致密坚韧又保留细密的、通气而不漏水的微孔,成型后泥片的表层又用“明针”等工具反复刮搓挤压,表面形成比基底更为致密、微孔更为细微的表层“肌肤”。烧结后,表面的肌理细腻温润有“水色”,黯然蕴光,比诸施釉的陶瓷别有一番“素面朝天”的风韵。使用把玩后更能养起“包浆”,如金如玉,更添审美情趣。其双层气孔结构用之于泡茶,生香留香,汤茗不易变色变味,是“茶文化”的不二之选;用之于养花,发棵护根,更是合适。因而“泥片”是实用与艺术结合的基础平台。再次,“围筑”调动了“镶接”、“拍打”等紫砂工艺

的配套和发展,特别是“围筑”成全封闭的空心器形后,毛坯在半湿时整体强度大大增强,便于反复加工、复杂加工和精细加工,使手艺登峰造极,推演至极致,形成了紫砂陶制品特别是茗壶结构严谨、口盖紧密、线条清晰、块面挺括等工艺特色,其精细、精密、精致的程度在陶瓷各品类中首屈一指。其四,“泥片围筑法”在技为艺添翼的同时,自身成为独具审美价值的艺术,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敞开了门户。如紫砂绞泥,虽有唐代低温绞泥陶的历史线索,但论

其手法之多样和表现力之强劲,两者已不可相提并论,这是制作泥片的紫砂优势。紫砂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不断推出业内认可、社会欢迎的精品力作,推动了“紫砂文化”的热潮,这与“围筑”有着巨大的艺术创作空间密不可分。

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以“泥片围筑法”为代表,这是宜兴紫砂艺人的天才的创造、智慧的结晶、经验的升华,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瑰宝。将之传承发扬,继续光大,正是我辈今日的责任和要务。

(作者吉维明系无锡市太湖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咸子情系国家级高级工艺美术师)

(编辑:阎智海、何桦)

宜兴市陶瓷博物馆获批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日前,江苏省宜兴市陶瓷博物馆经批准设立海峡两岸紫砂文化交流基地。这是江苏省继南京中山陵之后,按规范要求获准设立的又一个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基地的批准设立,为宜兴市深入推进对台文化交流及人员往来搭建了更高平台。

宜兴市台办将围绕基地发展建设,重点做好“一节、二展、三中心”工作。“一节”,举办中国·宜兴陶瓷文化艺术节。“二展”,每年在台湾举办2次宜兴紫砂艺术展。“三中心”,一是成立陶瓷展览中心。涵

盖宜兴陶瓷博物馆、陶都陶瓷城、古龙窑、大师工作室等。二是成立陶瓷工业产业中心。以陶瓷产业园为基础,建立宜台两地陶瓷产学研售中心。三是成立两岸陶瓷交流中心。开展宜兴丁蜀镇与台湾莺歌镇结对交流、两岸素食文化交流等活动,不断拓宽深化两地交流交往。

(江苏省、宜兴市台办供稿)

(消息来源: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官网)

《大参戎南塘戚公表功碑》的评释

陈学文

《大参戎南塘戚公表功碑》，是研究明代抗倭和戚继光生平事迹的重要碑刻资料。碑建于明嘉靖四十三年九月，初树碑于浙江临海谭公祠内，解放后迁于临海小浞洲。碑身高2.3米，宽0.9米，厚4厘米，16行×83字。由秦鸣雷撰文，王宗沐篆额，陈锡书丹。碑文如次：

赐进士及第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前两京国子祭酒翰林院侍读学士左春坊左谕德专管诰敕临海秦鸣雷撰文。

赐进士出身中奉大夫广西布政司左布政使前奉敕提督江广两省学政刑部侍郎临海王宗沐篆额。

赐进士出身承直郎礼部主客清吏司主事提督四夷会同馆临海陈锡书丹。

明兴，地大化，而吾台滨海，尤称清晏。顷缘圣天子以礼乐为治，一时有司百吏承奉德意，喷华播沫，藻绘声句，以饰太平。以故武库之甲，尘弥蠹蚀，固有多名列将帅，而终身未尝临阵者。治极蠹生，备疏患起。而海上日本诸夷，因缘窥伺，挟导吞餌。盖自壬子岁墩微失警，十余年间，□东南日染腥膻，而台之祸尤博矣。当宁以东南财赋恃为厨廩，岂得令偏视之徒，蟠结咀溺其间，梗塞大化，乃更官命将，分据要津，而当事不兢，势散谋败，数载靡成。时

南塘戚公方将北边，廷议咸推之，遂膺浙东参戎之命以行。公至，弭节吾郡，先按海上形势，多间谍，严号令，广询谋，与士卒草疏野处。每遇贼至，奋不顾身，必欲剪此后食。贼虽云集，屡相戒避其锋。盖自是人始知贼犹人，非真若虎豹，然不可响迹，浸有斗志，贼亦自是稍顾忌，逆气狂谋，渐以亏衲，可诱而图矣。姑叙其战功章章尤著者：乙卯岁，倭夷分徐海、陈东乍浦余党寇浙东路，所过望风奔溃，公初遇于高家楼，据石台射三首虏，寻相持缙云、桃渚、柵浦间，躬执弓矢，列鸳鸯阵椒江之北，群遂宵遁菖埠。时台守二华谭公守海门，贼俄潜袭城下，已有缘雉堞而登者，公以匹马援之，贼遂不敢逼，退走牛桥，半登新河。公知其道穷，遂以计擒巨酋，归所俘女子，其余党奔铁场山，乘胜直驱，所向无敌，众悉伏道受刃，太平南湾以宁。岁辛酉，贼以数千计，由宁海抵新河，直入花街。时久雨，台城多圯，花街去城不五里，众汹汹，公晨归，忍饥提兵，遣部下朱珏先斩其先锋七人，贼遂由间道夜趋仙居白水洋，公亟蹶其后，令人各持一木，贼疑以为林，不为备。既途，弃木疾战，群贼惊匿高居民之楼，公纵火焚之，且以兵歼其亡命，遂覆巢空穴，兽毙鸟亡，无一人得脱者，此其大凡

也。余尝谓自昔祸乱之兴,必有忠义英武韬略之臣,以指挥擘画,救宁戡定,盖天所以奠安,维极绥辑,神人非偶而已也。他如巨公伟士,丰功骏烈,勒钟彝辉简册者不论,即吾郡数百年来,乱凡几作战。尝按视往牒,若晋隆安间,孙恩入寇,辛景击破之,滕子勤为参军;时方腊势张甚,竟以孤城自全。彼二公者,其为吾郡再造之功,是诚旬泓显赫矣!然广陵、睦州之寇,特起乌合,二公有城守寄图存决胜揆势与谊所宜。然公虽提兵建节,然利害视城守稍别,而况海上诸夷,乘十年积胜之威,方其叫呼淞泖,转战苏吴间,督抚重臣,且仓皇愕眙,或斧缺弓弛,迄久而后成功矣。乃公屡遇大寇,设谋咨划,辄令彼纠缠,狼狈自剪而死,若刳羊豕,然由是较之,公之功孰相伯仲耶?行已献捷阙廷,告禧庙社,而郡之民德公成绩,去而愈思,乃受简命余为之记。夫锡圭封邑,国家之令典也;歌功颂德,邦人事也。余久宦游于朝,目击时变,每不忘桑梓之念,得公坐镇,为之长城,吾郡民始洗涤盘岳,犁田室室,安堵如故,而今迁矣,其能默然已哉!公名继光,字汝谦,别号南塘,山东登州卫人。其视师也,有忠信仁义之怀;其议喜怒也,有粟帛斧钺之施;其驾馭群材也,有死绥搴旗之效;心在国家,而身先士卒,勇不畏难,而谋善料敌,此所以成今日之功欤!余故并记之,俟后之有志武略者知所考法云。

潮州府知府何宠、惠州府同知林应麒、真定府同知吴翰、封刑部主事蒋璇、瑞

州府知府许仁卿、刑部尚书应大猷、刑部尚书蔡云程、赣州府知府孙锐、封刑部主事王训、工部员外郎陈光哲、山东副使邓栋、广州府知府包应麟、建宁府同知应鑣、黄州府知府应明德、福建提学副使金立敬、刑部主事张志淑、庆远府同知冯良亨、衡州府知府金立爱、广西提学副使何宽、当涂县知县侯思古、刑部主事项思教、后府经历蔡迎恩。

举人:张祉如、陈光周、戴汝愚、应存初、王穀、李箴、秦懋德、冯应麒。

监生:陈承武、侯巨都、陈鹤书、冯召南、秦鸣阳、秦鸣治、陈鹤龄、秦懋功、侯好古、陈用宾、余汝明、王科、余汝戎。

生员:王梅龄、张锦、方大化、王熙寿、陈鈇、王熙龄、陈基、汪浩然、王承忠、胡承志、曹浚、张大维。

嘉靖四十三年岁次 甲子 菊月吉日 立

(文按:上录碑铭非原始实物,间有难以辨识和误差之处,余稍加辨证。)

撰碑文人秦鸣雷(1518-1593),临海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第一,任礼部左侍郎,国子监祭酒、侍读学士;王宗沐,临海人,与秦同科进士,刑部侍郎,广西布政司左布政使;何宠,临海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刑部员外郎。

该碑文的意义是高度评价了戚继光在浙江东南台州御倭歼寇的丰功伟绩,九战九捷,取得了决定性的台州大捷,基本上平息了浙江的倭患。

戚继光(1528-1588),山东登州卫(今蓬莱)人,出生于抗倭武将世家。其父戚景通,曾任大宁都司都指挥使、京师神机营副将。戚继光承袭登州卫指挥僉事。嘉靖三十四年(1556)奉命南调浙江,任都司僉事,三十五年七月任宁温台参将。他目睹明官兵敝败,卫所不修,官兵望倭奔遁逃命,他认为要想抗倭制敌首先必须有一支能御敌的军队。十二月上《练兵议》,充满信心曰:“况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全浙岂无材勇?诚得浙士三千,亲行训练,比及三年,足堪御敌,可省客兵费数倍矣。”嘉靖三十八年(1559)任台金严参将,八月又上书要求召募义乌兵,九月得浙督胡宗宪支持,遂赴义乌招募兵员四千人,得到知县赵大河支持,里人陈大成率众响应,经严格挑选招得四千员。一般史籍均记为三千人,但据戚本人及儿子祚国《戚少保年谱耆编》记载皆为四千,当以此第一手史料为准。他还建议由义乌知县赵大河随军任监军,便于管理与教育。这支驍勇的由义乌兵所组成的戚家军,经戚亲自训练,很快就投入台州御倭的实战中,又经戚亲历实际所创造的鸳鸯阵实战,取得辉煌的战绩。南方多沼泽地,不宜直线作战,根据地形和倭寇活动的特点,因地制宜的鸳鸯阵以12人组成的战斗小分队,灵活变换队

列,很快就取得抗倭的胜利,解救了数千名被俘的台州男妇,缴获敌寇的许多武器。

碑文记录了花街、白水洋之役的经过,如戚家军的中坚份子多为义乌兵,朱珏一次就斩首七名,“戚南塘以为左右手,其南北奏捷,珏之功为多,升广西参将”^①。王如苏,“骁勇绝伦,国士无双”^②。花街之战发生于嘉靖四十年四月二十七日,当时戚继光正领兵在外,获悉倭欲犯台州府城,戚即率军忍饥挨饿疾奔70里赶赴花街,双方发生激战,斩敌308级,擒倭首2名,缴获兵器605件,解救被俘男妇5000余人。接着于五月三日在白水洋激战,戚军仅1500人,设伏于上峰岭,手持松枝装为树林,倭误入山谷,被歼344级,擒倭酋5名,缴获武器1490件,解救被俘男妇千余人。

台州是浙江倭祸重灾区,自“倭患以来,无次不犯台州地方”^③。碑记亦记:“东南日染腥膻,而台之祸尤博矣。”所以胡宗宪命令戚继光卫戍于台,戚一至台,“先按海上形势,多间谍,严号令,广询谋”(碑文),密切协同谭纶作战,重视监军唐尧臣、赵大河的作用,取得了决定性的台州大捷,从此基本上平息浙江倭患。戚继光在平倭主战场台州大捷后,遂奉命率军至

①崇祯《义乌县志》卷十,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刻本。

②《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十,中军书局2003年版,第324页。

③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九《大捷记》;《耆编》卷二,第53页。

闽去平倭了。

在台州九战九捷平倭大战中,戚继光身先士卒,多立战功,歼灭倭寇约1400人(溺亡4000余人不计在内),从此倭寇不敢轻易再犯台州。在战斗中连戚夫人也亲临前线,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廿四日在新河之战中,当时戚领兵在外,新河一片空虚,戚夫人镇定自若,率领妇女穿上戎装登上城墙,倭寇未辨男女,以为已有充分准备,遂仓惶撤退。

戚家军在台州大捷中首立战功,鸳鸯阵也在实战中得以展布功能。碑铭赞曰:“……与士卒草疏野处,每遇贼至,奋不顾身,必欲翦此后食。……其视师也,有忠信仁义之怀;其议喜怒也,有粟帛斧钺之施。……心在国家,而身先士卒,勇不畏难,而谋善料敌,此所以成今日之功欤!”在台州二年间也是戚继光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年华。在台撰著了《纪效新书》,它是以训练士卒为主的军事专著,使他晋身于历代军事家的行列,这时他仅33-34岁。所以胡宗宪在《题台功疏》赞誉:“身经百战,勇冠三军,持廉秉公而士心咸服,令行禁止而军

营整齐。……台民共倚长城,东浙实资其保障,功当首论,破格优录,以风诸将者也。”^①

由于戚继光在台州抗倭功勋卓著,台州一地尚有多方记功碑和多所祠庙以纪念戚将军的功劳。此碑文是较详较重要研究明代抗倭史和戚继光的史料,值得研究者重视。

附记:明代御倭战争和倭寇问题,是明史、中外关系史、军事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对此曾发表过:《明代倭寇事件性质的探讨》(刊《江海学刊》1958年7期);《明代的海禁与倭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1期);《论嘉靖时的倭寇问题》(《文史哲》1983年5期。上二文均收录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史》1983年3期、1984年2期);《戚继光与戚家军》(收入《戚继光研究论集》,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戚继光和义乌兵为主体的戚家军》(刊台北《浙江月刊》2009年5期)等10余篇论文。碑铭当是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尤为可贵。

(作者系浙江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编辑:阎智海、何桦)

^①《戚少保年谱耑编》卷二,第72页。

三公祠碑记考述

徐志钧

无锡荡口东南有波光粼粼的鹅湖，湖岸之北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三公祠。三公祠建于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距今已有450多年了。《泰伯梅里志》卷五记载：“三公祠在鹅湖新桥，祀明巡按御史孙慎，督粮苏松翁大立，知县王其勤。嘉靖三十六年，华学士察建。万历志云：有遗爱堂、致斋所、思泉亭、学海书院、望月楼、衍庆道院。国朝康熙五十一年（1712）、乾隆五十四年（1789）、道光十年（1830）相继修葺。”当时建祠时称为生祠，因为所祀三人当时还活着。华察亲自为三公祠撰写了《无锡县延祥乡首建三公生祠记》碑，纪念这三位忠勇正直的官员。清道光八年（1828）黄师谦路过三公祠，见华察碑文而抄录之，并刊入道光十九年（1839）刻印的《松滋祠庙事略》，在华察碑文后附记：“此文记均赋之迹甚详而邑志未载，因附刊于后。”清顾皋《重修三公祠记》碑文中说道：“除弊难，除积弊尤难。事之难者，非一人所能为也。必有主事者总其纲，任事者以专其责，亲事者以赴其功。本精心毅力，以立斯民之命。”这三位官员当时办了一件惠及万民的德政，这就是丈田清粮，这涉及到长

期以来的田税不均，有关国家税政安全的大事。而三公祠是至今存在的有关明代中后期丈田清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物。在明代，虚粮问题全国皆有；在无锡一地亦全县皆有，非惟延祥乡一处。而今天保存的反映明代有关丈量田亩、合理田税、整顿赋役、救民水火的古迹实物，全国仅此一处，其意义非凡。就荡口一地而言，也就更重要了。

三公祠碑文所反映的丈田清粮事实，与明代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关系密切。明代实行两税法，以民众所占有的土地财产为纳税服役的依据。富者多征，贫者少征。凡有土地者，必须缴纳田税，这就是碑文中所说的“粮”。把人员丁口与土地、房屋、牲畜合在一起，作为征发徭役的依据。这些都写在相当于户籍的黄册和相当于土地所有权证的鱼鳞图册上面。明代的土地制度还有从前代继承而来的官田、民田制度。这两种所有权不同的土地，征税的额度也大不一样，这也发展成为严重的社会矛盾。这些制度所形成的矛盾焦点，集中在土地上，丈田清粮之举，即由此而起。

官田与民田的由来。“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

宋元时入官田地。”^①明初承袭自宋元的官田有职田、没官田、学田、寺观田等。明代建立不久,又增加了不少新的官田,如皇庄,屯田,陵墓地,牲地,学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乞赐庄田等,还有新的没官田。除此之外,就是民田。官田中的没官田,即籍没之田。明代凡“民间有违法律复籍没其家者,田土令拘收入官。”明初这种没官田以江南最多,大都是没收的当地犯法土豪或张士诚集团成员的田地。没官有一没、再没、三四没之分,征税等级也随之增高。官田的设立,与田地是封建社会主要的生产资料有关,是封建国家直接掌握生产资料对农民剥削的一种方式。所以租种官田的农民直接向官府交租,官田之外的民田交税。这都是封建国家的收入来源。但由于田的所有权性质不同,租重税轻。

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②

至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税亦不过三升、五升,而其下有三合、五合者。于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独苏松二府之民则因赋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粮重去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请言其故,

国初籍没土豪田租,有因为张氏义兵而籍没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没者。有司不体圣心,将没入田地,一依租额起粮,每亩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生。^③

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自私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④

官田与民田税额的不同,成为贯穿整个有明一代的严重社会矛盾。从嘉靖中期开始,经过丈田清粮,直至万历张居正当政时才得到有效的整顿。张居正一死,许多整顿的成果丢失了。对于民田,按两税法,名为夏税秋粮。夏税无过八月,秋粮不超过来年的二月。收税的依据就是按户籍编制的黄册和按照土地编制的鱼鳞图册。

洪武十四年(1381)诏天下府州县编赋役黄册,以一百一十户为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十户,名全图。……乡都曰里,里各编一

①《明史·食货志》。

②丘浚《大学衍义补》。

③杜宗恒《上巡抚侍郎周忱书》。

④《明史稿·食货志》。

册，册首为总图。^①

黄册上记载有每户的人口，土地房屋牲畜等财产，每十年重新登记一次。一切户口内之新旧变迁，分居析爨情形，皆载于册。因为徭役牵涉到丁口的数量，人口的变动，黄册就是徭役升降的凭籍。黄册内记有土地的数量，这也是徭役的依据，因为田多就等于财产收入多。所以明代初年开始编制黄册时，为了逃避徭役，富户都“大率以田产寄他户，谓之铁脚诡寄”。“铁脚”又名“贴脚”。《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年二月戊子条载：“浙江布政使司，及直隶苏州等府县进鱼鳞图册。先是，上命户部核实天下土田，而两浙富民畏避徭役，往往以田诡托亲邻田仆，谓之铁脚诡寄。久之相沿成风，乡里欺州县，州县欺府，奸弊百出，谓之‘通天诡寄’。”文中提到的两浙，即浙东浙西，而无锡属于浙西范围之内。田地多的人把田亩寄在亲友等人名下，以减少册籍上的资产数，使徭役减少或直接免除，当时称为诡寄。诡寄是逃避徭役，无法逃避田税。明太祖对这种情形十分痛恨，他说：“民间洒派、包荒、诡寄、移丘、换段，这等俱是奸顽豪富之家，以自己科差，洒派细民；境内本无积年荒田，此等豪猾买嘱贪官污吏，及造册书算人等，当科粮

之际，作包荒名色，缴纳小户。书算手受财，收回洒派，移丘换段，作诡寄名色，以此靠损小民。”^②为了制止这种情况，朱元璋命人编制有关土地的书证，命“国子监生武淳等往，随税粮多寡分为五区，每区设粮长四人，使集里甲耆民，躬履田亩以度量之，图其方圆，次其字号，悉书主名及丈尺四至，编类为册，绘状如鱼鳞然，故云。至是，浙江布政司使及直隶苏州等府州县册成进呈。上喜，赐淳等钱钞有差。”^③鱼鳞图册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完成。鱼鳞图册以田地为主，地域为经，人为纬。区内田土形状、步亩、方位、主名、界邻都画在册上，它相当于土地权属证书，成为确定田税的依据，鱼鳞图册一时制止了诡寄洒派的弊端。有了黄册和鱼鳞图册，明代的赋税体系大致确立。税出于土田，役出于丁口。随着时间的流逝，土地所有权的变动，一些农民在失去土地之时，纳税的义务并未随着土地的易主而消失。

鱼鳞图册既成，每户照册上钱粮田段，各给号单一纸收执。开明坐落亩数，四至图形，后遇交易推收，即将号单黏入契内。如无号单，即有卖田一亩，而买主勒掯，止收九分五厘者，兼并之端一生，空包之弊斯积。^④

①傅维麟《明书》。

②《明太祖大诰续编》。

③黄佐《南雍志》卷一。

④王星华《含烟小纪》。

由于黄册与鱼鳞图册皆由官府收执,在土地权属不断变更的情况下,官府并无随时产权变更登记和注销的机制。黄册十年一造,是与人口有死亡和新生有关。这种制度上的缺陷,由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权属书证制度,农民虽已把自己名下的土地出卖,但在官府册上仍记着他应纳的原土地的田税的名字。这样使得“虚粮”之弊愈演愈烈。

富者置产,累在贫人。买者宁多其价,而少其粮。卖者甘图空户,而愿厚价。承平日久,田连阡陌者,赋止圭勺。地无立锥者,赋且钧石。催科者无可伊何,但令里老四六包赔而已。^①

嘉靖初唐龙任江西巡抚时上《请均田役疏》,对当时虚粮之弊有非常痛切的陈述:

国初计亩成赋,县有定额,岁有常征。近置买田产,遇造册时,贿里书飞洒之见在人户,名为活洒;有暗栽逃绝户内,名为死寄;有花分子户,不落户眼者;有留卖户不过割,及过割一二,名为包纳者;有过割不归本户,有推无收,有总无撒,名为悬挂挑回者;有暗袭官绅脚色捏作寄庄者。在册为纸上之桑,在户皆空中之影,以致派粮编差,无所归着,俱小民赔偿。小户逃绝,责之里长;里长逃绝,而粮长负累。由是户口日耗,盗贼日炽,告旰日滋。^②

就无锡一地而言,情况与其他地区一

样。《无锡县延祥乡首建三公生祠记》碑文指出:“锡之乡凡二十有二,其间中人以上之家,有田者多无粮;中人以下之家,有粮者反无田,立法之始岂固然哉。盖法久弊生,区总里书飞诡洒派,日剥月削,积而至于不可胜算;豪强兼并又从而虎噬蚕食,坐享无粮之利而推其害于人。有司催科,不求其原,唯事敲朴,流血刻骨,岁复一岁,闾阎之下,富者贫,居者窜,生者死。彼垄断之徒,方且瘠人以自肥,求逞其无厌之欲而不已。此数穷理极,人怨神怒,田之不可不丈,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碑文中所说“有粮”就是承担田税,“无粮”就是不承担田税。万历《无锡县志》卷七:“国家承平日久,土田多未核实,垦辟者不行开报;而鬻田者每存虚额。故或有田而无粮,则坐享其利以至于富;或有粮而无田,则日受其害,以至于逃,累及粮长里役,民间嚣然不宁。”除了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承担着“无田之粮”之外,无锡还有把官田写作民田,再把官田应纳之粮飞洒到民田农户头上的情况。巡抚周忱曾“视田则轻重为损益法,非不善也。但因田则太多,书算巧于飞诡,阴受富农之嘱,则以官作民,暗行掊克之术。则移轻作重,愚民无知,莫能究诘,虚挽日积,贻害浸深。至嘉靖十六年(1537),本府知府应贾议查原额田粮正米数少者,耗米递加;正米数多者,耗米递

①《汉南续郡志》卷二五孙澜《均粮碑记》。

②孙承泽《春明梦馀录》卷三十五。

减。哀多益寡,将合县田粮均为官民二则。官田每亩平米三斗三升二合;民田每亩平米一斗五升九合六撮九圭,仍逐年会计。……撮烦就简,较若画一,使百姓易晓而书算无所施其术,富民无所售其奸。申呈巡抚欧阳铎,详允遵行,于是民困少甦矣。”^①尽管如此,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承担的原有税额并未得到解脱。而这种情况由来已久,是全国性的问题。

嘉靖十八年(1539),顾鼎臣为大学士,复言: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供输甲天下,而里胥豪右,蠹弊特甚,宜将欺隐及坍荒田土一一检核改正。于是应天巡抚欧阳铎检核荒田二千余顷,计租十一万石有奇,以所欺隐田粮六万余石补之,余请豁免。户部终持不下。时嘉兴知府赵瀛建议: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一切以三斗起征。铎乃与苏州知府王仪画供官民田裒益之,履亩清丈,定为等则。……时豪右多梗其议,鼎臣独以为善,曰:是法行,吾家益千石输,然贫民减千石矣。不可移也。顾其时,上不能损赋额,长民者仅以己意变通而已。^②

官田、民田征税不均的问题,占有大量土地而不交税的问题,失地农民不堪税负的重压而逃亡,下层官员无法完成征税的任务。这些问题都直接威胁到明王朝的统治

基础。有远见的大臣已多次提出重新丈量土地,废除官田、民田的纳税差别;确定有田者必须纳税,无田者不必纳税的社会公平机制,把多年来的欺隐作弊来一个彻底的大检查,以此保证国家的纳税安全和社会稳定。然而朝廷官员对下层疾苦并无切肤之痛,他们思想保守,害怕因丈量土地而使原有税额发生变动。这时社会矛盾的激化已引起朝廷正直大臣的忧虑,不少高层官员提出丈田清粮的提议。当时已任都御史的欧阳铎再次提出“计亩均输”。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无锡延祥乡的农民,在华察支持下,派人直接向皇帝请愿,争取在本县实现丈田清粮。

嘉靖三十二年(1553),邑人侍读学士华察倡议捐赈,俾耆老诸人赴京,引例陈请,世宗皇帝准令户部议处,覆行抚按,转行督粮参政翁大立,专委本县知县王其勤丈量,严立隐匿之禁,痛惩稽缓之徒,三阅月而毕。^③

常州府的土地丈量终于在嘉靖三十二年(1554)从无锡开始了。华察撰写的碑文追忆了请愿成功的经过。“延祥之民合众倡议,裹粮走京师,伏阙下,仰天号呼,极言其状,天子怜之。乃以其事下御史。御史曰:民病一至此哉。吾知有法耳。乃檄参政使亟行。参政曰:吾职也,田之不清,粮安

①万历《无锡县志》卷七。

②《续文献通考》。

③万历《无锡县志》。

从出?乃断然力主其议,而使县官亲其劳。县官曰:是诚在我,民病之不去,吾何以父母为哉?乃早夜以思,访求故事,白于二公。”当时无锡知县为王其勤,所谓“访求故事”,是调查研究田税的原始状态。“白于二公”,是向苏松巡抚孙慎、督粮翁大立二位省级主管官员汇报。由于得到休官在家的原翰林院侍读大学士华察的有力支持,无锡县知县王其勤亲临田亩清丈现场,厘正赋税。“精核版籍,因区定亩,因亩准税。区为纲,亩为目,纲以丽目,则无漏亩;亩为母,税为子,母以权子,则无逋税。”^①这是同一时间无锡人安如山任裕州知州时丈量田地使用的办法。王其勤也是用这个办法。无锡全县十三区,414图(里),每图设正弓手、算手各一人,专门负责实地丈量和计算。当时制定了丈量的标准工具——步弓。步弓形似规矩固定的圆规。三公祠中存有步弓石刻,它是按照实物原样刻在石碑上的。步弓两足间距为1.71米,按明制五尺为一步。今存明嘉靖工部营造实物长度,一尺为0.317米,照此计算实为5.39尺。据顾炎武《日知录》卷十所载,当时其他地区丈量情况,步弓长度各地并未统一,政府也未公布标准器,也完全不同于现代的精确计量。为了保持田亩总数不致增加太多,步弓长度起到调节作用。因为田亩总数关系到一地区的纳税总数。亩数一多,势必增加税额。三公祠步弓

长度也应是这种情况。当时丈量土地的主要目的是“见数”,即明确实际的土地数量和真正的田主,使田税实至名归。亩的计算仍照240步为一亩,这对田多的人是有利的。所以这个步弓纪念意义大于计量意义。步弓阳刻在三块相叠的长条形花岗岩上,三块长条形石自上而下依次递增,最下一块石条正中刻楷书“步弓”二字。步弓石刻今置放于三公祠院内墙上。除了弓手、算手外,每区设区稽民四人,负责督率图正(里正)等人统一检查区内丈量工作的进度和质量。全县另设总稽民十人,专门负责登记、核查。在此之外,知县也常常进行不定期的抽查、复核,以杜绝作弊。在丈量工作开始的同时,即向公众及时公布丈量所得的鱼鳞图册,使丈量工作一开始即有严格的规范,有相当的透明度,又获得了较为广泛的社会监督。随着丈量工作的推进,那些占有大量土地而不纳税的富户,重新被纳入征税的范围内。其中不少是有身份地位的高门大族,豪强恶霸。丈量损害了他们的重大经济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他们使尽各种手段,公开的,秘密的,合法的,非法的,无所不用其极。而孙慎、翁大立、王其勤三位官员同心协力,坚持原则,作好了政治上、思想上、操作上的准备,更重要的是得到广大无地、少地农民的拥护。在激烈较量中,无锡地方土豪劣绅“彼有力者阳攻阴伐,倏

^①孙承泽《春明梦馀录》卷三十五。

忽万状,而三公者不为之动,挠之愈甚,持之愈坚。文移使者相望于道,有力者知不可夺,乃谋夺其权。”土豪劣绅利用一切社会关系,勾结朝廷邪恶势力,迫使孙慎、翁大立、王其勤先后丢官罢职,其中王其勤遭到陷害,差一点命也丢掉。由于三位官员早有远见,工作做得扎实,“鱼鳞有图,丘段有册,耳目昭昭,井然不可乱矣”,这使反对者想要进行倒算也做不到。更重要的是这件事得到华察的全力支持。华氏为无锡大族,华察为朝廷重臣,极有影响。正因华察的政治地位较高,反对者最终归于失败。仅花了三个月,清丈土地的事终于圆满完成。经过丈量,无锡县共有官民之田14912顷87亩余,应纳税折合平米245386石余。平米,原数上加了耗羨数的米。另有徐达田庄之田92顷36亩余,应纳税正米499石余,正麦198石余。此次清丈田亩,共核出隐瞒逃税的田地共16万亩,划去无田的税米8000余石^①,其中荡口所在的延祥乡占了两千余石,真是大甦民困。在完成清丈土地工作的同时,还对所量之田,以田地本身情况定为上中下三等,以后不再区分官田、民田,收税标准也予以统一。一律按等级高下交税,实际上

是官田的税额均分到民田上。上等田每亩纳税近2斗,中等的1.6斗多一点,下等的1.4斗不到一点。经过丈量核实的调整,全县应纳的总税额也下调了。整个江浙地区,官田、民田统一税额,无锡是做得比较早的^②。到明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倡议丈量全国土地时,无锡又复量了一遍,基本上维持了王其勤丈量的成果。万历时全国丈量三年完成。无锡市博物馆所藏《夫字鱼鳞图册》为万历十年的图册,正是这次复量的成果。

丈田四年后,在华察倡导下,于鹅湖之滨,新桥之旁,建造了三公生祠。华察在碑文中写道,这三位主持正义的官员,“王公中奇祸几不免,翁公假他事革去,孙公寻亦代还。……顷因王公之去,延祥之民重有感焉。乃即鹅湖之濱建生祠,列三公像,作遗爱堂,岁时瞻拜,作致斋所。孙公名慎,号联泉,作思泉亭。翁公名大立,号见海,作学海书院。王公名其勤,号少月,作望月楼。庙貌孔严,垂休百世,主以羽流,崇拜香火,作衍庆道院。”^③三公祠成为一组纪念性祠宇建筑群,面对鹅湖,成为著名的名胜。历史上三公祠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乾隆五十 (下转第56页)

①碑文为7000余石,万历《无锡县志》卷七记为8000余石,王世贞《无锡南延区华氏役田记》为8000石,此处从王世贞碑。

②《锡金识小录》卷一:“常郡之官民均摊则由吾邑始。”

③《泰伯梅里志》卷八:“衍庆道院在鹅湖新桥,明学士华察建,佾事王问题额,后有文星阁。国朝康熙五十年,华谦益,集里之能文者,一月辄两会译于此。”

倪瓒年谱 (二十)

谈福兴

元顺帝元统三年 顺帝至元元年
乙亥 公元1335年 三十岁

○ 吴镇(仲圭) 五十六岁 十月,为德翁作《山水图》,署款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元统三年冬十月,为德翁作。梅花道人。”

按:郁逢庆《书画题跋记》卷九载云:此图作“在宋楮上,长五尺许,墨气淡荡,石面嶙峋,酷似子久得意笔。”

十一月,游云洞,因见老松奇曲,遂作《曲松图》,署款云:“元统三年冬十一月,因游云洞见老松屈曲,遂写图此以纪吾所见也。梅花道人戏墨。”

按:吴镇《曲松图轴》,绢本,水墨,纵166、横82.3厘米。此图正中墨笔绘一株奇曲老松,主干粗壮挺拔,顶端分杈两枝,分左右向下弯曲,右侧下弯后又毅然向上翻翘,树杈似蟹爪,尖峭矫健。松姿腾挪凌云,如龙腾虎踞,气势磅礴。下端为土坡拳石,以枯淡的墨色、斜卧的笔锋,皴擦出坡石的坚实之质和灵巧之态。元顺帝元统三年为公元1335年,是年吴镇五十六岁。看是图画法已呈较多的自身特色,松树勾线粗简率性,注意以水墨连皴带染,滋润轻淡而富层次,显示出了画家对“墨分五彩”的追求。坡石的用笔更显其粗劲率意,或

侧锋勾研,或卧笔皴染,墨色浓淡跌宕,富有韵律。此图现藏美国大都会美术馆。

○ 张雨(伯雨) 五十三岁 元日试笔,并作五言律诗云:“四日得春。自古三朝节,于今一笑看。问年书亥字,献岁出辛盘。黔突多蒸术,红冰剩浴丹。行行追胜事,步步埽春寒。”二月,还钱塘,作《书怀寄刘师鲁》云:“乙亥二月还钱塘,书怀寄刘师鲁。黑头时与王孙别,春草又青天一涯。贫甚冯欢犹有铗,归来丁令已无家。葑田湖窄残舟(一作游船)少,墓道山荒剩(一作故)屋斜。还忆菌巢书数卷,雪麋应护手栽花。(雪麋,玄洲白犬名也)”冬十一月六日,作《两鸟吟》。

○ 朱德润(泽民) 四十二岁 清明前一日,为莆田林子发作《郑浹际诗传序》。

○ 顾安(定之) 四十七岁 此顷,以写竹得名,时与朱德润相从于翰墨之间。

按:顾安(1289-1365),字定之,号迂讷居士,平江(今江苏苏州)人,家昆山(今属江苏),祖籍淮东。父松江府判官,顾安以荫授兰溪(今属浙江)、龙岩(今属福建)等地巡检,后任泉州同安县尉,官泉州路行枢密院判官。顾安擅画墨竹,师法文同,

具有个人风格。画竹多作风竹和新篁,运笔遒劲挺秀。用墨润泽灿烂,得其偃仰扶疏,挺健嫩秀之韵致,在李衍、柯九思外,自有一股萧疏清逸之气。画风篁新竹,或丛生群聚,或一枝独秀,竹叶多取仰势,行笔遒劲,雄健挺秀,吸取李衍、赵孟頫诸人技法,融入书法意趣,萧疏清逸,自成一格,为明代王绂等人所师法。亦工书法,长于行书、楷书,师承赵孟頫,笔致遒劲,颇具功力。元代郑韶赞其画竹诗云:“吴下几人能画竹,风流只数顾参军。都将数尺云烟思,写作当年篆籀文。”顾安为倪瓒好友,至正二十二年即公元1362年,倪瓒曾有《赠顾定之》诗云:“轻薄纷纷新少年,论诗作赋如涌泉。为云为雨手翻覆,背面倾挤当面怜。阿翁七十仍踰四,与我同心生并世。高卧白云餐绛霞,草堂门对灵岩寺。”并时为顾安的作品作题,如其《题顾定之竹》云:“顾画王诗两奇绝,风霜凛凛香清节。狮子林中古佛心,允矣无生亦无灭。”又为好友周南老所藏顾安的《风竹图》作题:“萧萧瑟瑟一林风,写与城东拙逸翁。石室先生仙去远,虎头孙子独称雄。霜毫淡墨阴晴外,曙月寒窗梦寐中。对月怀人一悲慨,雪泥踪迹似飞鸿。”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倪瓒和顾安、张绅合作的《古木竹石图》轴,此轴为素笺本,先有顾安以墨笔为通元画竹,并钐“顾定之印”和“迂讷老人”二印。后有张绅补古木并在左上方题识云:“通元以此纸求定之翁墨君,余以木丈为友诗曰:白沙翠竹天新雨,古

屋疏林道少人。季主不来徐庶(缺),与谁同卜岁寒邻。云门山樵绅。”后为杨维桢所见并欣然题云:“迂讷老渔久不见,醉中画竹如写神。金刀剪得苍龙尾,寄与成都卖卜人。铁戏笔。”癸丑(1373)正月,雪斋携此图请倪瓒补苔石并作题,倪瓒遂在右上方题云:“云门古木龙蛇走,迂讷琅玕(缺)风吼。铁厓健笔老纵横,万卷(缺)胸随所取。张公僵卧玉山岑,杨顾骑箕上南斗。我来东园梅未花,冻木戟立森槎枒。半醒半醉住一月,柳眼渐碧草欲芽。云门屡约来看竹,未闻拄杖拖冰玉。开门一笑如梦中,便应幙被从兹宿。癸丑初月廿一日,雪斋示此幅并为添作一石,又赋此诗以赠通元隐士,倪迂。”此幅上分别钐有:“鹿车”、“棠村审定”、“蕉林”、“元龙”、“江一夔印”、“墨农所藏”、“又新心赏”诸印,“轴高二尺九寸二分,广二尺八寸八分。”

○ 黄潛(晋卿) 五十九岁 是岁,作《青绿山水》。

○ 泰不华(兼善) 三十二岁 清明前一日,为韩诚之题《宋韩琦尺牍卷》。

按:韩琦(1008-1075),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北宋政治家、名将。韩琦曾与范仲淹共同防御西夏,名重一时,时称“韩范”。生前曾“相三朝,立二帝”,当政十年,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熙宁八年(1075)六月,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八岁。神宗御撰墓碑:

“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谥忠献,赠尚书令。著有《安阳集》五十卷。《全宋词》录其词四首。《宋史》有传。此卷凡二幅,前幅素笺本,后幅粉笺本,俱以颜真卿楷书法书之。原有四十三字,至元至顺、元统间(1330-1335年),“可见者已十之三。”前幅后有识云:“琦再拜启”,后幅未署名。拖尾有蔡景行、泰不华、杨敬德、祝蕃、班惟志、李齐、张圣卿、李懋、陈梁、王鸿绪、高士奇诸题跋,其中泰不华在元统三年(1335)清明前一日题云:“诚之广文出先世魏公所书二帖见示,端谨遒劲,得颜鲁公法为多,垂绅正笏,端居廊庙之气蔼然见于纸墨间。噫!鲁公为唐之忠(臣),魏公为宋之贤相,故其书法之妙亦相彷彿若是也。前辈谓魏公每登朝堂,视进止如有尺寸,载观斯帖于是乎取证矣。元统三年(1335)清明前一日,泰不华题。”

泰不华(1304-1352),字兼善,伯牙吾台氏,原名达普化,元文宗赐名泰不华。先世居白墅山,随父定居台州(今浙江临海)。家贫,好读书,能记问。集贤待制周仁荣养而教之。十七岁,江浙乡试第一名。至治元年(1321),对策大廷,赐进士及第,授集贤修撰,转秘书监著作郎,参修宋、辽、金史,书成,升礼部尚书兼会同馆事。至正四年(1344)出守绍兴,十一年(1351),泰不华任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十二年(1352),迁台州路达鲁花赤,与方国珍战,阵亡。封魏国公,谥忠介。泰不华能作诗,与萨都刺齐名,著有《顾北集》,收诗二十

四首。又重编《复古编》,考订讹字。善篆隶,学徐铉,又稍变其法,自成一家。据元末陶宗仪《书史会要》记载,泰不华“篆书师徐铉、张有,稍变其法,自成一家。行笔圆熟,特乏风采。常以汉刻题额字法题今代碑额,极高古可尚,非他人能及。正书宗欧阳率更,亦有体格。”元人吴克恭在《奉同杨廉夫赋简杜原夫达兼善》一诗中也对其书法创作倍加激赏:“相逢之处歌九曲,小篆以来书八分。勒取山经载名刻,清时白首重高文。”清康熙时,此卷为高士奇所藏,特请王鸿绪作跋,王氏作了详尽的考证,并对诸先贤作了记述,后由高士奇将此卷捐入宫。元至正四年(1344),泰不华在出守绍兴路时,曾应无锡洞虚宫住持华益谦之邀,为杜本所书的《无锡州洞虚宫重修三元祠山殿记》碑篆额,署款为“亚中夫绍兴路总管兼管内勤农事知渠堰事,白墅泰不花篆”此碑现藏无锡碑刻陈列馆,为一级文物。

○ 柯九思(敬仲) 四十六岁 十月,在锡训堂以行楷书《次谦父诗帖》云:“谦父监漕有山林小像文器,漕使为唱以咏之,谨次其韵,柯九思顿首。青松白石岂易致,绿鬓朱颜似谪仙。鹄鹄承恩陪往日,麒麟图像看他年。身居钟鼎多清事,志在山林入短篇。倡和纷纷缀珠玉,因知大府盛才贤。元统乙亥十月,锡训堂书。”十二月,值江浙行省参政富珠哩翀(子翬)征拜翰林侍讲学士,郡守济南张渊仲拜吏部尚书,应范仲淹八世孙新除教授绍兴路儒学

范文英(静)之邀,偕时任奎章阁学士院参书文林郎柯九思游苏州天平山,同游者有平江路总管府判官杨时举思明,推官王大有廷秀,经历王谏仲正,知事巴图彦实,儒学教授蒋伯升进之、玄明通道虚一先生赵嗣祺,住持白云寺沙门净标。诸人在天平山“谒魏公之像,临白云之泉”,并应范氏之请为范仲淹祠作七言诗留念,并由柯九思作《游天平山记》以记其事。倪瓒亦有《游天平山》七言诗记云:“天平烂漫游三日,林下狂吟石上眠。浩荡春风芳草绿,梅花雪满白云泉。”

○王逢(原吉) 十七岁 此年,靳利安赴常州任同知,王逢随船相送至无锡洛社和常州横林一带时,作《送靳利安之常州同知经横林洛社舟中作二首》云:“金汤迟建节,斑白半为鱼。烟冷渔商市,霜晴鸟雀墟。丹心忧国遍,画舫上官初。素着循良迹,绥民早驾车。”“败冰流满川,茅舍啄乌鸢。垂丧期颐老,犹伤乙亥年。乱离今日继,风俗几时迁。洛下衣冠族,宜先解倒悬。”

按:王逢(1319-1388),字原吉,号最闲园丁、最贤园丁,又称梧溪子、席帽山人,江阴(今江苏江阴)人。“逢少学诗于陈汉卿,得虞集之传,才气宏敞,而不失谨严。”有才名,作《河清颂》,为世传诵。有大官举荐出仕,以病坚辞不就。原籍江苏江阴,后避兵祸于无锡梁鸿山。游松江,筑梧溪精舍于青龙江畔青龙镇(今属青浦县)。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三月,移居乌泥泾

宾贤里。栖隐之所,为宋张氏故居,名园为最闲园。居室为闲闲草堂,并自题园中“藻德池”等八景诗,记得园经过。明洪武年间,以文学征召,谢辞。戊辰(1388)元日,王逢自撰《圻铭》,并命“门生周畿刻骊驹山(园北小山),仪鸾水(所居张泾)首西正丘”。同年卒,享年七十。所著《梧溪集》七卷,记载宋、元之际人才、国事,多史家所未备。诗三卷,其诗得虞集之传,才力富健,尤工古歌行,抑扬顿挫,迈爽绝尘。清赵翼《檐曝杂记》称其“古体诗音节高古,时有汉唐遗韵;近体诗亦老成朴实,不落纤佻,因不屑与鬻悦家争工斗胜也。”其中《黄道婆祠》一诗,是今存最早歌咏黄道婆业绩的诗作。另著有《杜诗本义》、《诗经讲说》二十卷。亦擅长作行草,初非经意,大率具书家风范。王逢和倪瓒之妻蒋寂照同为江阴人,与倪瓒友善,在王逢的心目中,倪瓒是个“善诗画,乱前弃田业,纵游山水间。隐迹怀东老,诗狂慕浪仙。百壶千日酝,双桨五湖船。书画通芸阁,征输歇葑田。乡评有月旦,未觉虎头贤”之人。他时常与倪瓒有酬唱往来,如其有《寄倪元镇》:“笠泽雨晴烟雾除,放船适逢倪隐居。黄河泰华意气若,金薤琳琅书画如。露浮箬叶熟春酒,水落桃花炊鳊鱼。莫嫌忘形礼法外,难得合并忧患余。”又《岁旦未起宋安道税使袖至倪元镇书因述怀答倪》云:“不食妾妇鱼,宁饮廉让水。善学柳下惠,鲁有一男子。兹辰属新正,高枕辞贺礼。忽得隐沦书,矍然揽衣起。隐沦尽散

金,贱迹痛扫轨。薪吹竹根叶,盘具园中荠。贫病无一钱,老幼逾百指。寒云下微雨,聊阅晋唐史。闵(一作陶)颜何如人,所嫌饥乞米。寄言物外交,仙山叽琼蕊。”明赵琦美《赵氏铁网珊瑚》卷十四记云,无锡的王容溪曾作有《如梦令》词,辛亥(1371)春,倪瓒特以此词意作《仿高克恭云山图》赠友人王仲冕,其题云:“无锡王容溪先生尝赋如梦令云:林上一溪春水,林下数峰岚翠。中有隐居人,茅屋数间而已。无事,无事,石上坐看云起。高房山尝绘之为图。贞居诗曰:歌此芙蓉窈窕章,山阴茅宇日凄凉。不是笔端天与巧,谁割云山与侍郎。今已亡矣,予戏用其意为图赠仲冕。辛亥春。倪瓒。”十二年后,即公元1383年,王逢在王仲冕家遇见亡友倪瓒所作此图和张雨、王容溪的诗词,不由感慨万分,遂应王仲冕之请作题云:“余谢病将还小陇,谒梁侍郎、顾先生祠,就宿宝云禅舍。是夕,王仲冕相与论心,久之而去。明日过冕,见先友倪幼霞所画,且获观王容溪、张贞居二公诗词。还,冕征赋菰村,亦为长短句一阕,衰惫之余,一时清兴殊洒然也。檐耸数株松子,村绕一湾菰米。鸥外迴闻鸡,望望云山烟水。多此,多此,酒进玉盘双鲤。梧溪老人王逢,时年六十有五。”

○ 徐贲(幼文)生。

按:徐贲(1335-1393),字幼文,祖籍巴蜀(今四川),徙居毗陵(今江苏常州),后迁平江(今江苏苏州)城北,号北郭生。张士诚开阹,辟为属官,后与张羽避居湖

州之蜀山(今浙江吴兴)。洪武七年(1374),被荐入朝,洪武九年(1376)春,奉使晋、冀,授给事中。历任御史、刑部主事、广西参议,官至河南左布政使。洪武十一年(1378)大军征洮、岷,以军队过境、犒劳失时,下狱。洪武十三年(1380),以“犒师不周”处死。徐贲善画,亦工于书,明人李日华称其“楷笔秀整端慎,不为沓拖自恣”。詹景凤称其“小楷法钟(繇)兼虞(世南),然皆拘拘法内”。其天性端谨,不踰规矩,故其诗才气不及高(启)、杨(基)、张(羽),而法律谨严,字句熨贴,长篇短什并首尾温丽于三家,别为一格,著有《北郭集》六卷。徐贲与倪瓒友善,时来无锡,有《无锡道中》诗云:“深林晴叶下风迟,山色迎人似有期。十四年前曾住此,湛公宅里钓泉时。”徐贲十分看重倪瓒的绘画作品,曾多次为倪瓒作品作题,如其题《云林画》云:“久约樵翁共结邻,青山如待早归人。屋西有个茅亭子,饱听松风起涧滨。”《为开元道士题倪云林画》云:“闻说仙人去采真,山中草木几回春。开元堂上重来客,犹是当年问道人。”尤其是他的《题倪云林竹六首》中的“忆君我有泪淋漓,正似湘江雨后枝。记得秋声夜同听,消闲馆里对床时”;“江乡处处忆陪游,见写湘云数叶秋。今日仙魂乘鹤去,犹存遗墨动人愁”;“不见高人倪幼霞,流传遗墨尚清华。凤毛零落湘江水,春雨新稍整复斜”;更是记述了他和倪瓒“对床听雨”、“处处陪游”的友情和“犹存遗墨动人愁”的思念之情。

○ 姚广孝(斯道)生。

按:姚广孝(1335-1418),俗姓姚,初名天禧。祖籍福州长乐,后徙长洲(今江苏吴县)。十四岁时,度发为僧,改名道衍,字斯道,号独庵,亦自号逃虚子。三十岁时,姚广孝前往径山随师习禅。其间,他游历四方,与当时许多吴中文人往来频繁,交游酬唱,评书品画,为“北郭十友”之一。及至四十八岁,姚广孝经人举荐,入燕府辅佐燕王朱棣,并密劝燕王举兵,策动“靖难之役”。朱棣即位后便拜姚广孝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并复其俗姓,赐名广孝。八十四岁,病逝于久居之庆寿寺,受追封为荣国公,谥号恭靖。姚广孝通儒、道、佛诸家之学,善诗文,精通阴阳术数,交际广泛,与高启、张适、倪瓒等常有同游、酬唱之乐。时张适辞官退隐山林,倪瓒、高启、姚广孝等同往乐圃相访,众人饮酒、吟诵,颇得逍遥情致。如倪瓒有《和甘白先生乐圃林居二首》云:“甲寅(1374)六月五日。关关幽鸟绿阴浓,林坞陂池曲曲通。荷雨逗凉侵北牖,汀云度水迅南风。清琴咏雅宁谐俗,浊酒攻愁似有功。闻道秋来偏起蚤,一帘晨露引高桐。竹里斋厨柳下渠,幽林风景自应殊。家无甌石惟忧道,邻断炊烟急索租。山水巍荡聊足乐,雨云翻覆岂吾徒。蓬蓬栩栩天涯梦,楚水湘云叫鹧鸪。”并作《乐圃林居图》,其题云:“暮投斋馆静,城郭似幽林。落月半床影,凉风孤鹤音。汀云萦远梦,桐露湿青琴。喧卑净尘虑,萧爽集冲襟。余来城郭而暑气炽甚,偶

憩甘白先生乐圃林居,不觉数日,相与荫茂树、临清池,诵羲文之象爻,弹有虞之南风,遂以永日。成此一诗并写小图,呈甘白以寓笑乐耳。甲寅(1374)六月十五日。倪瓒。”而姚广孝的“巷僻无车马,闲扉掩薜萝。笼驯传信鹤,池蓄换书鹅”,则尽写乐圃林馆的幽静、空寂之韵味和诸人远遁山林,避俗世之情趣。在交友酬唱中,姚广孝和倪瓒都有共同的挚友和交流方式,如他们的好友张雨曾自书诗册,后赠袁华,不久,袁华又将《张雨书诗册》转赠好友陈彦廉,一时诸好友先后为其题咏。壬子(1372)初月八日,倪瓒到陈彦廉的春草轩做客,特为其所藏的《张雨书诗册》作题云:“贞居真人诗文字画,皆为本朝道品第一,虽获片楮只字,犹为世人宝藏,况兼所得若是之富且妙耶。舒展累日,欣慨交心。噫!师友沦没,古道寂寥,今之才士方高自标致,予方忧古之君子陆沉耳。吾知前人好修,不以为贤于流俗而遂已,不患人之不知栗里翁志不得遂,饮酒赋诗,但自陶写而已,岂求传哉。倪瓒题。壬子初月八日。”十四年后,即明洪武十九年(1386),姚广孝在陈彦廉的春草轩见到倪瓒等作题的《张雨书诗册》,欣然题云:“张贞居词翰俱清逸,飘飘然如骖白鸾,游霞乡,自非有仙风道骨者不能到,唐之羽流中,杜光庭辈讵足专美于前矣。彦廉宜宝之。洪武十九年仓龙丙寅,吴僧道衍观于春草堂。”姚广孝也时常为友人题倪瓒的作品,并常有睹物思人之意,如其《题倪云林墨竹》诗

云：“开元寺里长同宿，笠泽湖边每共过”，即言姚广孝与倪瓒往昔交往之情谊，淡泊而真挚。

是岁正月，命廉访司察郡县劝农官勤惰，达大司农司以凭黜陟。二月，革冗官。

三月，从御史台臣言，丞相已领军国重事，省、院、台官，俱不得兼领各卫。河州路大雪十日，深八尺，牲畜冻死十之九，民大饥。

四月，命翰林国史院纂修累朝实录及后妃、功臣列传。

罢功德、典瑞、营缮、集庆、翊正、群玉、缮工、金玉珠翠诸提举司。

七月，左丞相唐其势及其弟塔刺海谋

逆，被诛。

九月，御史台臣言：“国朝初用宦官，不过数人，今内府执事不下千余。乞依旧制，裁减冗滥，广仁爱之心，省糜费之患。”从之。

十月，诏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船户与民一体充役。

选省、院、台、宗正府通练刑狱之官，分行各道，与廉访司审决天下囚。

十一月，罢科举。下诏改元统三年为至元元年，是为后至元。

十二月，安庆、蕲、黄地震。

是岁，赐减天下田租之半。

(编辑：阎智海)

(上接第49页) 四年(1789)、道光十年(1830)加以修葺。道光十年的修葺，当时金匱知县江之纪和邑人顾皋都写了《重修三公祠记》。两人的文字刻在同一块碑的两面，今天它与华察写的碑一起保存在三公祠碑廊里。顾皋，无锡张泾桥人，嘉庆状元。他的碑文由孙尔准书写。孙尔准是城中小河上少宰第状元后人，书法家，官至闽浙总督，多次巡阅台海边疆，剿灭匪乱。

今天保存在三公祠的碑刻有十余块。除上面提到的外，其中还有著名的延祥乡

役田碑、华察祠堂碑、步弓石。有关三公祠的书条石，还有数块公帖之碑。这些都是关于荡口地方历史、经济文化的宝贵资料。特别是这里保存的几块明碑，都是历经焚劫，保存完好，有着400年以上的珍贵文物。它们不但是荡口的珍贵文物，更是无锡的珍贵文物。今天的三公祠，碑刻之外还保存有遗爱堂，今天已恢复陈列；思泉亭，亭泉皆保存完好。在恢复荡口古镇的建设中，三公祠的历史原貌将会得到全面恢复。

(编辑：阎智海、何桦)

迎接新春天的“第一燕”

——无锡地区早年进步刊物《协进》月刊综述

谈 菁

无锡位于太湖之滨,钟灵毓秀,人文荟萃,是吴文化的发源地。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播,洋务运动的影响,无锡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之一。一批社会贤达、有识之士纷纷依托大上海的情势,宣传实业救国的思想,以图富民强国。“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无锡思想界异常活跃,掀起一股爱国宣传、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的高潮。1920年4月17日,《锡报》以《工人阶级应有的觉悟》为题,摘载了陈独秀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会的演说;1920年5月11日至20日,《锡报》连载李大钊《五一运动史》一文。他们的文章代表新文化运动的正确方向,在无锡的革命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中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无锡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及知识分子的觉醒,为马克思主义在无锡的传播创造了土壤。1921年5月,北塘米行职员陈枕白和苏州进步青年朱锡昌创办了《双周评论》,传播“以改造社会为目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各尽其能,各取所需”、“妇女解放”、“阶级斗争是免不了的”等马克思主义观点。梅园徐巷青年徐梦影以“启发人民觉悟”为目的,于1922年创办启民社,吸收农民子弟入学,学习新文化和新思想。当时无锡还有万安协进社、青

年自治会、西漳青年益心社、天上市自治协进会、厚桥青年协进会等进步团体,集中宣传“改革社会的腐朽思想”、“推动社会进步”等积极主张来传播新思想、新文化。

在众多农民进步社团中,无锡万安协进社显得十分突出,它曾出版自己的刊物《协进》月刊,由冯耕庸担任主编。冯耕庸是中共党员,早年与秦邦宪一起在苏州胜利第二工业学校预科学习,一起开展学生运动,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秦邦宪先后介绍冯耕庸加入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以及进步社团“锡社”。后来冯耕庸与秦邦宪一起报考了上海大学,因冯耕庸家境贫困,无力继续求学,只得回到家乡无锡洛社当了一名小学教员。冯耕庸利用自己“锡社”骨干的身份和他在社会上的良好关系,积极开展活动。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于1926年初在万安市(今无锡洛社所辖地区)筹备成立了进步青年团体——万安协进社,召集了一大批万安市的知识青年,编辑出版《协进》月刊,冯耕庸任编辑主任。正如《协进》月刊发刊词所言:“为平民说句公道话”,简短明净,隽永有味。月刊所刊载的《国民应有的觉悟》、《工业与地方》、《我所希望于市农会者》、

《小学教师加薪运动的我感》、《匡村昨日今日和明日》、《锡社潮》、《锡社劫》等都是重量级的文字,针砭时弊,这对于一个地方的改造、农村的整饬、国家和民族的解放,都是启迪,都是力量。

我院所藏《协进》月刊第三、四期合订本,系无锡万安协进社1926年5月15日出版,纸质,32开本,品相基本完好。从这本刊物封页内的《编者话》分析出几点重要内容:一.月刊稿件较多,因此增加了页数,并将三、四刊合并了。月刊封面下标“第三四刊”就是这个意思。刊物得到了当地进步青年的欢迎和支持,陆续有几位热心的同乡和撰稿人开始为月刊撰稿写文。可见当地群众对刊物的喜爱程度。二.由于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和本地的“绅阀”等反动势力开始对“锡社”步步紧逼,冯耕庸等一批骨干成员遭到迫害,所以冯耕庸在编者话中表明,原来所要刊登的关于万安市的调查文字由于没有收到完整稿件而不刊登了。在日益严峻的时局下,再刊登农民实地调查的文字恐怕对刊物不利,也会使撰写人员有危险。三.1925年底,“锡社”被江苏省军阀政府查封,部分骨干成员遭拘捕。1926年6月,社会上又风传无锡有些土豪劣绅向时任苏浙皖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大军阀孙传芳告密,指称包括王启周、安剑平、秦邦宪、冯耕庸在内的六名“锡社”骨干成员为“赤党”,即将通缉拘捕。冯耕庸随之连夜逃往上海,投奔当时在上海的秦邦宪、安剑平。因此,冯耕庸在

编者按中说到他是主编黄飞先生的代庖人,之后将会由黄先生主编《协进》,其实当时冯耕庸已经感到危机,将黄先生作为挡箭牌,为今后保存实力,继续编辑刊物做准备。这也是对刊物做了最坏的打算。

综上所述,我院收藏的这本《协进》月刊很可能是目前存世的最后一刊,之后未见有更新的版本,估计在冯耕庸逃亡上海后,《协进》月刊就随之停刊。

在风平浪静之后,冯耕庸毅然回到了家乡无锡。1926年,中共无锡独支决定,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组织“无锡青年社”,以便吸收青年学生,更广泛地发动青年参加国民革命。同年8月23日,无锡青年社在县教育会正式成立,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外围组织。在成立大会上,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候补执行委员张曙时参加成立大会,并在会上作了《青年与政治》的报告,冯耕庸等9人被推为青年社执行委员。众多团体组织负责人和学校代表参加了青年社的成立大会,如中国孤星社安剑平、天上市拒赌会商大成、实业中学俞百揆、万安协进社冯耕庸、艺芳小学陈明崙、工商中学顾凤城等。该社成立后不久,即由共青团无锡特别支部接管领导,在城区创办平民夜校,宣传革命思想。冯耕庸继续战斗在革命的第一线,再之后,冯耕庸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协进》月刊的刊名“协进”二字是由当时国民党官僚、著名南社诗人叶楚伦题词,值得一提。叶楚伦祖籍周庄,早年参加

同盟会。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先后在上海创办《太平洋报》、《生活日报》,并一度入《民立报》操笔政。1916年,与邵力子合办《民国日报》,任总编辑,抨击袁世凯称帝。1924年1月,被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兼青年妇女部长。北伐战争开始后,任职于蒋介石总司令部。1927年曾参加清共的“四一二”事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二届中央特别委员会候补委员。1929年后,曾被选为国民党第三、四、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会委员,并先后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秘书长、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1935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公余兼职文教,创办大型《文艺月刊》,编印《文艺丛书》、《读书杂志》等。抗战胜利后,奉派为江苏宣抚使。叶楚傖著有《世徽堂诗稿》、《楚傖文存》以及小说《古戍寒笳记》、《金闾之三月记》等作品。1946年叶楚傖在上海病逝,终年60岁,公葬于苏州木渎灵岩山。1926年初,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叶楚傖作为国民党元老之一以及《民国日报》的总编,能为当时无锡地方进步刊物《协进》月刊题写刊名,足见其对这本刊物的认可,也显示出这本刊物的档次和级别。

在万安协进社之后,青城导社、锡社继续出版进步刊物《青城》、《无锡评论》等,并以演出现代文明戏等形式启发群众的觉悟。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活动家恽代

英也在无锡两次演讲,使得许多青年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在无锡建立组织奠定了基础。1925年1月,中共无锡支部成立,后改为独立支部(简称独支)。

在无锡独支的领导和影响下,无锡工人阶级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日趋激烈,出现了工人运动的高潮。从五卅运动结束到1927年初,无锡各业有影响的罢工斗争达38次。之后,无锡党组织逐渐向农村发展,从开源乡农民协会的斗争开始,农民运动也在无锡乡间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工农运动的高涨,促使无锡的大革命运动迅猛发展,也扩大了党的各级组织。1927年1月底,无锡已有党员147人,基层党支部14个,工人支部9个,农民支部2个,小教支部3个。党组织在无锡及周围地区已有相当影响。1927年2月16日,无锡、江阴、常州、苏州等地的党组织合成的无锡地委成立,地委机关设在无锡沈果巷17号。这标志着无锡的大革命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协进》月刊一经出版,秦邦宪就专门写了一篇题为《评万安市〈协进月刊〉创刊号》的文章,对其创刊号的内容作了逐篇点评,称赞这本刊物“不失为水平线以上的一本刊物”,赞之为打破当时无锡沉闷空气,迎接新的春天的“第一燕”。可以说,月刊与当时秦邦宪所主编的“锡社”刊物《无锡评论》互为呼应。月刊中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所写的文章, (下转第15页)



无锡庆丰早期的地位和运行特征

——兼析无锡丽新的“殊途同归”（上篇）

顾纪瑞 顾 征

我们曾以无锡庆丰纺织公司1922—1936年账略为依据,撰文《无锡庆丰早期运行模式研究》^①,论述其早期运行模式的六大优势和三个待解之谜。本文以全国纺织行业为背景,进一步分析庆丰纺织公司抗战前在全国的地位及其运行特征,并与唐保谦的同祖父堂兄弟唐襄廷(和程敬堂)同期创办的无锡丽新纺织公司进行比较研究,探索两家公司“殊途同归”现象和各自的长短之处,以吸取历史经验为当前服务。

一. 上世纪30年代华商纺织业全面萧条

受一次大战的影响,中国开始于1914年的实业投资热潮,是中国第二次工业化浪潮,直到1924年出现经济大萧条才停滞。纺织行业则因“花贵纱贱”和银根奇紧,到1934年又陷入全行业大萧条。

(一)30年代华商纺织业全面萧条的表现

1. 纺锭增幅呈下降趋势,织布有利可图,增幅快于纺纱。华商纱厂联合会年会报告书(1936年4月)公布了一批数据,1931年共有纱锭238.05万枚,到1935年底

达到282.43万枚,计算结果:4年间增长18.64%,环比为5.96%、4.77%、2.90%、3.86%,呈下降趋势。在纺纱经营不振之际,织布尚有利可图,一时纺纱厂增设织布机成自救之法,同期布机由1.59万台增至2.26万台,增长42.14%。

2. 新纱厂开工者少,老纱厂关、清、卖、租者多。报告书认为,一方面纱锭数、工厂数岁岁有增加,另一方面纱厂又年年处于艰苦之境,这种矛盾现象,以1935年“为近年最劣之年”。这一年新厂开工者有江苏嘉定之嘉丰、陕西之大兴第二、广州之广东3家;在建造中的有西安之裕泰、云南之云南2家。同期正式宣告结束者有武进福大、南通久安、武昌民生兴记3家;清算者有天津裕元、上海民生、南通大生二厂3家;召卖者有芜湖裕中、九江久兴、河南成兴3家;召租者有常熟裕泰1家,共计10家。

3. 长期停工者和短期减工者众多。在华商纱厂联合会调查的92家工厂中,完全停工者14家,减工者24家。减工时间上半年平均增至4.80周,下半年更骤增至7.51周。过去减工的目的“在欲避产品之过剩,

^①刊于《无锡文博》2013年第4期、2014年第1期。

今则因经济紧缩与花贵纱贱之影响”。

进一步分析花贵纱贱的原因,在国内市场受当年棉花歉收的影响很大,在国际市场受美棉价格涨落的影响很显著。再加之使用进口棉花每担需先交14-15银元进口税,而销售棉纱时所交统一税华商又较日商为重,更加重了成本。

(二) 三大著名纺织集团先后陷入困境和危机

华商纺织行业的萧条,不仅迫使一些中小型纱厂关、卖、清、租,停工、减工,连张謇、穆藕初、荣氏兄弟三个著名集团,也在萧条中先后陷入困境和危机。

1. 南通大生集团被上海银团接管。张謇创办的南通大生一、二两厂,1914-1921年8年间总利润超过1000万两,拥有纱锭10.44万枚,大生三厂也在1921年投产。正当张謇的事业达到顶峰之时,面临全行业萧条,因历年盈利被分完,多元经营造成资金链断裂,再无资产可抵押,三家公司一起陷入借贷无门的严重困境,被上海银团接管。大生一厂由上海银团派留美纺织专家李升伯任经理,进行整顿,清理债权,改造设备,先后注入资金800万元,公司得以维持和发展;大生二厂最终被贷款银行清算拍卖;大生三厂曾由上海放贷钱庄派出经理接管,积久与职工产生尖锐矛盾,后由董事会委派纺织专家沈燕谋任经理,调整债权,改造设备,改变产品结构,方维

持生产,转亏为盈。

2. 穆氏三家纱厂陷入困境。被称为“棉花天王”的穆藕初,1876年生于上海浦东的棉商家庭,19岁在棉花行当学徒,后进南洋公学读书,33岁时深感中国棉纺业的落后,赴美留学,从种棉、纺纱、织布到企业管理,系统学习了8年。归国后即与兄长筹集20万两白银于1916年创办了上海德大纱厂,一年后德大生产的棉纱在北京质量比赛中获第一名,一夜成名。很快集资120万两建成厚生纱厂,1920年又集资200万两成立郑州豫丰纱厂,拥有职工4000多人,是中原地区最大的现代企业。穆藕初回国5年参与创办三家纺织厂,还发表许多植棉、纱厂组织法等文章,印成小册子免费赠送,穆氏三家工厂成为当时国内技术设备最领先、管理最先进的企业。但是,在1924年棉价暴涨而诱发的产业危机中,他创办的三家工厂相继陷入困境,德大于1925年被荣宗敬收购,改为申新五厂;厚生1931年因发生股东争吵而清盘,售与申新公司改为申新六厂;郑州豫丰地处军阀混战主战场而被波及,1934年被迫抵押给美商慎昌洋行租办。穆氏从此离开纺织行业而被人遗忘,他在国民政府工商部门、农业部门供职,1943年病逝。^①

3. 荣氏集团一度陷入空前危机。荣氏兄弟拥有的棉纺织和面粉事业,1932年还处于顶峰。申新总公司约占全国华商纱锭

^①吴晓波:《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 1870-1977》,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145页。

的20%,布机的28%,茂新和福新面粉业旗下企业21家,生产规模约占全国1/3左右,是国内最大的民营实业集团。之所以能迅猛发展,是由于采取了不断举债扩展战略。申新资产共值6898万银元,而负债达6375万银元,总公司每年的统税和利息支出就在1000万元以上,资金链处于十分紧绷的状态之中。1934年初市场突变,荣氏面粉厂全部停产,申新各厂也风雨飘摇。到3月,上海所有银行、钱庄(包括荣氏参股的16家)已无一家肯对荣氏企业再放款。7月4日,上海申新总公司公开登报宣告“搁浅”,陷入危机。

据上引吴著的记述^①,从1934年7月起至1936年10月二年间,荣氏集团经历了三场凶险。7月,荣德生赴南京向政府求援,要求准予申新发行500万元公司特别债券,由政府保息。实业部调查后拿出的方案是,成立临时管理委员会,由政府供给300万元为运营资本,6个月后再处理。部长陈公博的公开表态是“收归国有”。在全国棉纺织业纷纷通电反对的强大舆论压力下,陈公博才将“由实业部整理”改为“由荣氏大加整理”,债券之事则免谈。

申新七厂因向汇丰银行抵押贷款200万元,于1934年12月到期无力偿还,1935年3月被汇丰银行公开拍卖,被日本丰田纱厂以225万元一举竞走。消息见报,掀起轩然大波,全国实业界、商会、工会纷纷抗

议,各大媒体连日发社论一致反对。最后英国驻沪领事馆出面协调,汇丰被迫同意解除拍卖,荣氏所欠贷款可延期到1940年底全部还清。

1935年4月,宋子文出山执掌国营化后的中国银行。荣宗敬多次登门求援,半年后宋拿出十分苛刻的方案:中国银行将申新所有九家纱厂全部收下,然后发行企业债券,以新券还旧债(分五类依次偿还),并内定中国银行总稽核霍树宝为申新总经理。唯一诱惑条件是申新所欠贷款利息由1分减为5厘。此案等于把荣家一脚踢出申新。1936年2月12日,宋子文召集申新的三大债权单位浙江兴业银行、上海银行、中国银行的负责人开会,关键时刻上海银行陈光甫称病未到会,派出的代表以减息一半的亏损承担不起为由,提出将借款转给中国银行,会议不欢而散,荣氏逃过一劫。其后申新各厂时开时停。1936年10月1日,荣氏与中国、上海两行订立《委托经营签约书》,总算保住了申新的所有权。到秋天棉花丰收,市场转暖,申新各厂先后开工,到年底公司居然扭亏为盈。

我们引述大量数据和三个显赫一时的纺织集团所遭到的危运,重翻南京政府面对濒临危境的民族工业不施援救,反而乘人之危欲施计掠取的这段历史,是要从广度和深度上说明当年华商纺织业处于萧条的大背景。

^①吴晓波:《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 1870-1977》,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237-238页、243-246页。

二、“北四行”调查让无锡庆丰和丽新两厂脱颖而出

(一)“北四行”调查的由来、范围和要求

“北四行”调查部(由全国性商业银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中南银行组成的四行联营事务所设立)认为:“纺织事业为国内最大之工业,其盛衰、兴替,关系社会经济、金融业务、工人生计者至巨。”“最近数年,经营事业者,亏蚀多而获利少,此中症结,急待研求。”他们派出专员,1935年年初前后开始,历时4个多月,先后前往沪苏两地40家纺织厂实地调查(实际收录36份调查表,厂名见注^①),其中上海24家(内英商怡和3家)、无锡7家、常州3家、苏州和太仓各1家。由调查人用毛笔填写的表格共2页,有32个栏目。这批《调查纺织厂统计表》完整地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②,其内容过去没有公布过,为今天了解当年上海和江苏纺织企业的实况提供了可靠的原始珍贵史料。学者杨天亮先生撰写的《视角与评估》(上海档案信息网,2012-12-07),对这批调查表进行了解

每 萬 錠 約 佔 人 數	工 人 數	每 日 生 產 數	布 機 數	紗 錠 數	公 積 金	資 本	組 織	改 組 年 月	開 辦 年 月	事 務 所	廠 址	廠 名
上 海 人	第 一 工 場 二 千 一 百 五 十 人 第 二 工 場 一 千 二 百 九 十 人		以 下 支 洋 每 錠 日 產 出 紗 一 〇 八 磅	上 海 二 千 一 百 五 十 枚 一 千 二 百 九 十 枚	上 海 二 千 一 百 五 十 元 一 千 二 百 九 十 元	上 海 二 千 一 百 五 十 元 一 千 二 百 九 十 元	上 海 二 千 一 百 五 十 元 一 千 二 百 九 十 元	上 海 二 千 一 百 五 十 元 一 千 二 百 九 十 元	上 海 二 千 一 百 五 十 元 一 千 二 百 九 十 元	上 海 二 千 一 百 五 十 元 一 千 二 百 九 十 元	上 海 二 千 一 百 五 十 元 一 千 二 百 九 十 元	上 海 二 千 一 百 五 十 元 一 千 二 百 九 十 元

图一 庆丰厂调查表

读,给人以启发。
(二)从32项栏目中,选出最重要的8个指标进行单项比较
这批调查表,全面展示了36家纺织厂的状况。我们从32个栏目中,选出最重要的8个指标的数据或评语,进行横向比较。清晰地看到:无锡庆丰纺织漂染整理公司(以下简称庆丰)(图一)和无锡丽新纺织

①注:36家纺织厂名单[简称]上海:1、申新一厂、八厂,2、申新二厂,3、申新五厂,另有申四在武汉,4、申新六厂,5、申新七厂,6、申新九厂,7、永安一厂,8、永安二厂,9、永安三厂,10、溥益一厂,11、溥益二厂,12、振泰厂,13、鸿章厂,14、统益厂,15、纬通合记,16、恒丰新局,17、宝兴厂,18、恒大新记,19、振华利记,20、民生厂,21、协丰厂,22、怡和公益厂(英),23、怡和厂(英),24、怡和杨树浦厂(英)。苏州:25、苏纶厂。无锡:26、申新三厂,27、庆丰厂,28、丽新厂,29、振新厂,30、豫康厂,31、业勤厂,32、广勤厂。常州:33、大成厂,34、民丰厂,35、通成久记。太仓:36、利泰厂。

②《四行调查部调查报告汇订》,Q266-1-749。

漂染整理公司(以下简称丽新)(图二)两家企业脱颖而出,分别在多个方面位居前列。

1. 资本额:在36家企业中,资本额在100万元以上的28家,占厂家数的77.78%,100万元以下的8家。庆丰被登记为180万元并不准确,现在查到的账略记载,自1933-1936年实收资本为250万元,丽新为100万元,都属大型企业。

2. 纱锭和布机数:总计拥有纱锭146.06万枚,其中5万锭以上14家,占38.89%,其余22家为5万锭以下,占61.11%。最大的申新一厂、八厂合计12万锭,永安二厂10万锭,庆丰6.4万锭,丽新1.64万锭。在36家工厂中,同时拥有布机的21家,占58.33%,有布机14454台,平均每家688台,庆丰有721台,丽新985台,都超出平均数。另15家为单一纱厂,没有布机。

3. 机械状况:调查从机械的新旧程度和保全好差两方面进行评估,如对申新九厂、永安一厂等给予“佳”的评语,对丽新和大成的评语为“甚佳”,对庆丰的评语为“机械状况良好,保全得法”。对申新一厂、申新六厂、溥益一厂的评语依次为“尚佳”、“平常”、“欠佳”,对无锡业勤的评语为“机械陈旧,保全不讲究”。

4. 产品质量:所用评语有“优等”、“中上等”、“中等”、“中下等”、“下等”五种。其中评为“优等”的共15家,占41.67%,如申新五厂、永安一厂、二厂、三厂、恒丰、宝兴、庆丰、丽新、大成、通成久记等,有的并

酌加短评,如永安二厂的评语为“优等,以金城商标为最”;对庆丰的评语为“优等,绒布为国内名品”;对丽新的评语为“优等,条干极为均匀”。被评为中上等和中等的共13家,占36.11%,从略。评为中下等的7家,占19.44%,其中既有豫康这样条件较差的厂,也有申新一厂、八厂和七厂这样实力雄厚的大厂(当时评语是不公开的)。评为下等的1家,占2.78%,即前一项机械状况欠佳的溥益一厂。

5. 商标:商标应该体现产品质量,优质产品所用商标必然受用户的欢迎。此次调查表的登记和分析却偏重于商标的数量,肯定了申新九厂有8个棉纱商标和8个棉布商标,申新六厂以拥有12个棉布商标而居首位。而对在当地棉纱市场上已成为标准纱的上海申新的人钟牌、无锡庆丰的

每 工 人 日 生 產 數	每 日 生 產 數	布 機 數	紗 錠 數	公 積 金	資 本	組 織	開 辦 年 月	事 務 所	廠 址	廠 名
三 日 人	各 色 花 布 洋 布 海 關 稅 單 等	以 下 及 計 每 日 出 紗 二 八 磅	八 百 八 十 五 座	一 萬 八 千 四 百 枚	事 務 長 部 以 後 注 理 唐 謙 建 協 理 程 敬 唐 廠 長 唐 君 達	十 三 萬 九 千 一 百 萬 元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民 國 九 年 光 緒 新 廠	無 錫 惠 南 橋 慶 新 治	麗 新 新 廠 漂 染 整 理 廠

图二 丽新厂调查表

双鱼吉庆牌甚至没有提及,是这次调查中明显不足之处。

6. 历年盈余:有15家的调查表此栏目为空缺。当时由“北四行”进行的这次调查,并非政府规定必须填报的统计表,系由调查者询问和观察后填写,有关数字是否汇报、以及报多少均由厂方自愿决定。不愿报告历年盈余额的,可能亏损较多,也可能有盈余而不愿报告数字。

其余21家中历年(仅指1930-1933四年)都亏损的4家,历年都盈余的也是4家,它们分别是上海申新一厂、无锡庆丰和丽新、常州大成。其中大成比较均衡,“1931年盈余45万元,1932年盈余35万元,1933年盈余25万元”。丽新只记录了“1932年盈余30万元,1933年盈余12万元。”庆丰只记录了“历年均有盈余”,并无数据(本文后边作补充介绍)。其他13家,多数厂仅记调查之前的1933年“持平”或“略亏”。总的是“亏多盈少,日呈艰窘消沉之象。”

7. 人事管理:对一些厂的评语较笼统,如“颇能注意”,“亦见周到”;或较一般,如“尚见注意”,“秩序尚可”。有的评价颇高,如认为申新二厂“周详、密致、颇有条理”;丽新“极为周密、又颇得法。”对庆丰赞赏有加:“有人事课专司其事(注:36家仅此一家),各种工人均有统计及考察表格,极有条理。工人工作精神,职员服务之努力,为华商纱厂中巨擘。”批评英商怡和纺织公司公益厂和杨树浦厂,仍采用落后的包工制。

8. 工人生活:在硬件建设方面,庆丰“工人宿舍、浴室、俱乐部均备,又有教育运动、娱乐、卫生、医疗室、合作社等。”丽新有“饭堂、夜校、工人宿舍、托儿所等,颇觉完善。”这些设施,1930年代华商大型纱厂都已拥有,属中上水平。显然不如申新九厂在1934年迁移沪西后各种生活设备那样“尤为完备。”

(三)将8项指标的数据和评语在36家纱厂之间进行综合比较

可以清楚地看到,无锡庆丰和丽新两家纱厂的资本额、纱锭和布机数2项都已达到大型企业规模;机械状况、产品质量、历年盈余和人事管理4项均获得好评;工人生活设施达到中上水平;商标的市场作用未作调查,无法横向比较。这两家企业在全国纺织行业面临萧条、多数企业勉强维持、有的甚至陷入困境、危机之际,仍能稳步发展,扩大规模,提供优质产品,年年盈余,从而在被调查的36家企业中脱颖而出,这是无锡纺织业的骄傲,无锡企业家的骄傲。

这里有必要指出,当年全国127家纺织厂中,80家在长江角洲。“北四行”从中选出40家(实际有记录表格的36家,申新一厂和八厂合为一表记录),这些大多数是实力雄厚的企业,苏北和浙江的纱厂被除外,还有一批大厂和小厂未入选,因此可以说36家工厂是很有代表性的。既然庆丰和丽新在36家纺织厂中脱颖而出,人们自然要问,这两家纺织厂在全国的地位如

何? 如果加上天津、青岛、广州、郑州、西安的纺织厂,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庆丰和丽新的总体规模、设备状况、管理水平、产品质量、盈利状况、工人生活,在1934年时全国华商纱厂中,已位居前列,但还不属于最优秀,大体上在第4位至第6位之间。

三. 无锡庆丰和丽新走了不同创业路子的比较

无锡庆丰纺织公司由唐保谦(和蔡絨三)创办,丽新纺织厂由唐骧廷(和程敬堂)创办,两家企业分别走了“前列组合”和“后列组合”两条不同的创业路子。从1922年到1936年经过15年努力,都在一家企业内形成了完整的棉花纺纱、织布、印染产业链。它们能够“殊途同归”,值得探究。

庆丰1920年筹建,1922年投产时拥有纱锭1.48万枚,布机250台;1927年刮绒机投产;1934年1月“北四行”调查时拥有纱锭6.22万枚,线锭1504枚(1935年春华商纱厂联合会报告有线锭4120枚)、布机720台(1944年1月评估资产时有布机801台);1935年建成漂染车间,生产能力每日漂染布3000匹,主产品为棉纱、绒布、染色布,其产品链是从上游走向下游。丽新于1920年先开办丽新布厂,1931添建纱厂,1934年2月“北四行”调查时拥有纱锭1.64万枚,线锭6400枚,布机985台,产品有各色花布、洋布、府绸、绉、绒布等。1947年6月3日厂方自填“生产事业调查简表”记载,拥有纱锭4.018万枚,线锭1.28万枚,布机1200台,印花机2套,染色整理机器全套,其产

品链是从下游走向上游。两家企业“殊途同归”,都取得了成功。

庆丰的创办人是唐保谦(和蔡絨三),保谦先生的父亲是唐洪培;丽新的创办人是唐骧廷(和程敬堂),骧廷先生的父亲是唐福培,“两唐”的共同祖父是北乡严家桥唐懋勋(1800-1873),号景溪,被后辈尊称为景溪公。“两唐”是同祖父堂兄弟,唐保谦(1866-1936)年长,唐骧廷(1879-1960)年轻13岁,由于他们早期的经历不同,对棉纱和棉布市场熟悉的领域及程度不同,才走了不同的创业路子。

(一)“两唐”都是从商业资本转向产业资本,但早期从商的经历不同

“两唐”的祖父唐景溪从武进迁到无锡,在北门塘上开设恒升布店。1860年太平军占领无锡,唐景溪举家迁往东北乡羊尖镇严家桥村避战乱,在当地开设春源布庄,1866年将家业交给第二代“培”字辈有经商才能的唐洪培和唐福培两个儿子经营。唐保谦之父唐洪培经营以棉花换纱换布生意,获得厚利,战乱时人口减少,田价大跌,置田六千余亩,又开设同兴木行、同济典当、德兴茧行等,造仓厅,设义庄,成为当地一大财主。唐家兄弟六人,保谦先生为老二,其兄和大弟都中举入仕,保谦自幼不喜读书,有志于商,先在典当习业,后代父经营春源布庄。严家桥当地不产棉花,北边江阴和往东常熟都是产棉大区,保谦跟办花人员去棉花产地收花和换纱,贩回后以花、纱向当地百姓交换织好的土

布,在经营中积累了鉴别棉花,经营棉、纱、布的经验,还在常阴沙结识了无锡人顾叶舟^①,成为日后重要的合作伙伴。同治年间土布庄从严家桥迁回北塘,改名唐时常布庄。

唐骧廷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继承其父唐福培的产业,经营土布庄和夏布皮货行,后又在无锡北大街开设九余绸布庄。他处事严谨,管理细密,几年后九余获利甚多。又入股世泰盛绸布呢绒号,是该号清末钱、唐、张、冯四姓股东之一。骧廷先生的经营伙伴程敬堂(1885-1951),常熟人,随父至锡,1900年起进绸布店做学徒、职员,并就读于商余补习学校。1907年到九余绸布庄当跑街,后为该店股东和实际经营者,是公关高手,成为唐骧廷的经营合作伙伴。

唐保谦和唐骧廷最早都是经营土布出身,随着舶来品机制纱织品涌进市场,遂改变经营方向,转向绸布业投资。唐保谦眼光远,从布向前看,注意棉纱和棉花,最后和棉花行家顾叶舟合作。唐骧廷眼光较实际,看重布业零售商,对织布和印染感兴趣,最后和九余的程敬堂及时和、世泰盛的钱仲坪合作。

(二)“两唐”积累商业资本的行业和进入的制造行业不同

唐保谦注重以农产品为出发点创业,先经营土布,1905年和蔡缄三在北塘小三里桥合办永源生米行,以专为绍兴酒坊采办糯米出名,每年冬季达10万石之巨。1910年又和蔡缄三等集资10万两开设九丰面粉厂,这是从商业转向新式产业的转折点。同年在九丰厂邻近购进恒裕堆栈并扩建成益源堆栈,收储九丰的原麦,并附设碾米厂代客加工。九丰面粉厂因欧战市场面粉畅销而获利极厚,1920年将办面粉厂积累的40万元投资创办庆丰纺织厂。在此之前,他和人合开润丰油厂(1915年),并在周三浜独资10万两创办了锦丰丝厂(1919年)。这些工厂均以原麦、棉花、大豆、稻谷、蚕茧等农副产品为原料。

唐骧廷注重以“布市”为出发点创业,早期在“时和”与“世泰盛”与钱仲坪紧密合作,互相参股,积累了资本。之后从经营绸布生意转向生产棉布,于1916年和程敬堂一起集资接盘冠华手工织布厂,扩建为丽华机器织布厂,利用经营绸布庄的经验,生产适销布匹和色织花布,这是从商业转向新式产业。1920年唐骧廷、程敬堂、钱保华(钱仲坪之子)等集资创办丽新布厂。1928年兼营漂染整理。1931年购上海筹建而未投产之济生纱厂的纱锭,扩充纺纱,建成丽新纺织漂染整理公司。^②

①本刊今年第1期46页左栏第1、2行,原文为:“由与唐保谦素有交谊的常阴沙人顾叶舟负责”,所引黄厚基文章的原文是“常阴沙人顾叶秋”,现经核实,应统一更正为“无锡人顾叶舟”。

②据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附录一中国纱厂沿革表,第365页。

(三)“两唐”积累产业资本和形成纺、织、染产品链,都经过两代人努力

庆丰纺织厂1920年创办时实收资本82.89万元,之后稳步增加;1925年99.35万元、1930年143.25万元,1933-1936年250万元。1936年拥有固定资产531万元,流动资金516万元,资产总额1047万元。唐保谦主持的董事会坚持每年的利润“少分多留”用于扩大再生产,还不断吸收新的大股东。同时又依靠九丰面粉厂不断借给巨额流动资金,前后经历15年之久才积累下雄厚资本。第二代唐星海1923年留学美国回国后,不久担任庆丰纺织厂副厂长,唐纪云辞去厂长后接任厂长,保谦先生1936年去世又继任总经理,两代人共同作出了努力。

丽新纺织厂1920年创办时集资50万元,1928年增加漂染,1931年扩大纺纱,到1934年“北四行”调查时资本额100万元。1936年的资本额、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数据暂缺。

世泰盛绸布呢绒号创设于1896年,由钱氏出资3000银元,后加入唐、张、冯、陆、强五姓。钱仲坪有股份,唐骧廷持有继承股份。至1949年12月股东们共拥有资本额人民币1亿5840万元(据上海档案馆存“苏南区无锡市商业登记表”),其股权比例基本上反映了1934年前后的结构。1949年时钱氏有4份(其中钱保华、钱保和共2份,他们是钱仲坪后裔),合占股权32.827%;唐氏有3份(其中唐骧廷1份,唐照千和唐激

千各半份,他们二人是唐氏后裔),合占股权21.819%;张氏有4份,合占10.91%,这三姓共计65.457%。“时和”及九余绸布庄(合伙人程敬堂)也有相似情况。这些姓氏的代表性人物当年都投资于丽新纺织漂染整理公司,唐骧廷、程敬堂任正副经理,唐君远(唐骧廷之子)、张佩苍任正副厂长,钱保华任重要监事等,第二代后裔已进入公司级领导层。商业资本的融入和人事布局,都十分有利于丽新的进一步融资和棉布、花布的销售。

庆丰和丽新形成纺纱、织布、印染完整的产品链,有利于降低物耗、资本和劳动工时,无论是“前列组合”或“后列组合”,收到异曲同工之效。庆丰从投资纺纱、织布起步,染布整理由第二代唐星海完成。丽新从织布、印花布起步,再添建新纱厂,到抗战胜利后由第二代唐君远将纱锭和线锭扩充到5万多枚,也形成了完整的产品链。“两唐”的主要异姓合作伙伴,从实际作用看,庆丰实谓“唐-蔡-顾”组合,丽新实谓“唐-程-钱”组合。

(四)“两唐”不同创业路子的成效比较

“两唐”共同追求的目标是建成拥有纺纱、织布、印染产品链的全能棉纺织厂,其经济上的内在动力是能够降低成本,确保货源和产品质量,增加利润。同时,“两唐”都是唐景溪的孙辈,又同在无锡办纺织厂,还有相互攀比的竞争意识在推动。

庆丰和丽新两家工厂经过15年努力

发展,从经济规模、产品质量、历年盈余三方面作比较,若以抗战前的1936年为界:经济规模方面,资本额、厂基和建筑面积、机械设备估值,庆丰都大于丽新。产品质量方面,庆丰的双鱼吉庆牌20支棉纱为无锡市场的标准纱,丽新的各色花布广受欢迎,可说各有所长。历年盈余方面,庆丰1930年31.94万元、1931年61.06万、1932年46.89万、1933年0.16万、1934年8.23万、1935年11.99万、1936年110.09万(其中1931、32年据“庆丰厂史”打印稿,其余5年据“账略”);丽新1932年30万元、1933年12万元(据“北四行”调查),虽然资料不齐全,看来庆丰要多于丽新。从总体上看庆丰强于丽新。直到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在无锡排比纺织厂的整体实力,还是申新三厂(国棉一厂)第一、庆丰(国棉二厂)第二、丽新(国棉三厂)第三。

从另一种视角作比较,丽新纺织印染整理公司和协新毛纺织公司都是唐骧廷、唐君远父子在当家,加上1930年丽华第三布厂建成后连同丽华一厂、二厂改制为由程敬堂任经理的丽华股份公司,再加上抗战时期在上海租界迁建的企业,作为一个资本集团其总体实力相当可观。但是,唐保谦、蔡缄三赖以起家的九丰面粉厂、两

家堆栈,后来还办了榨油厂、缫丝厂,都在正常运营,并不断在资金、人才上对庆丰作支持,抗战时期迁出设备到上海租界和常熟、太仓另办纺织厂,若再加上蔡氏自有的企业和投资其他企业的股份,实力也很可观。因此,早先无锡有学者估计,在无锡六大资本集团中,唐蔡集团占20%,位居第二,是有原因的。

从上游产品入手和下游产品入手,谁更优?我们认为不应比谁更优,从实践结果看,先从上游产品入手技术要求高、投资多、获利慢,但当建成后再向下游产品发展比较容易,新产品附加值高,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先从下游产品入手,技术要求低、投资少、获利快,然而再向上游产品发展时,因用地多、设备贵、投资多、技术要求高,比较难。

庆丰和丽新发展成功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一家企业内部形成产品链,有利于节省资金、降低物耗、少用工时,从而增加利润。但是,办企业又不能盲目追求大而全或小而全,一切要从可能条件和最终结果是否有利出发。当前有一些成功的民营企业,不顾条件片面追求大而全,想自成一家不求人,这种目标并不值得追求。

(作者顾纪瑞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顾征系化学、化纤高级工程师)

(编辑:阎智海)

深化“红色文化”品牌教育活动的思考

——浅议无锡市革命烈士陵园“红色记忆之旅”品牌

焦懿芳

“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长河中积淀而成的独特文化形式,是否极泰来的中华民族,给予当代中国人民最伟大的精神财富,是先进文化引导下,历史创造出的又一精神导向。历史的恩泽,使处于长江三角洲的商贾重地无锡,在红色文化的涵养与积淀上,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与成果。作为江苏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无锡市革命烈士陵园,正是在这样得天独厚的环境下,抢抓红色文化优势,推出了“红色记忆之旅”教育活动品牌,由此传播“红色文化”,弘扬“红色精神”,不断加强全市市民,尤其是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建设,促使爱国主义教育事业不断深化,共同铸就新时期的“中国梦”。

一. 开展“红色记忆之旅”活动情况

2008年,无锡市革命烈士陵园首次推出“红色记忆之旅”教育活动品牌:“红色事迹”、“红色共建”、“红色志愿者”、“红色互动”、“红色送温暖”五元融合,强力提升品牌内涵,积极打造品牌形象。

多年来,无锡市革命烈士陵园与江南大学、侨谊实验中学、山明中学等10家单位签订了共建协议,拓展服务层面,把以点触面的教育方式,转化为点对点的深入教育,扩大精专宣传,做到以史育人、以文

感人、以教化人。

在实际工作中,陵园不断创新“红色记忆之旅”教育活动品牌活动模式,把红色教育品牌活动与宣传部活动项目、文明办目标管理项目、“行知大学堂”活动项目大胆结合,有效借助多种载体,将五个“红色系列活动”赋予新的时代特色,创新开展红色巡回宣讲、红色旅游、红色征文、红色捐赠、文艺汇演、专题座谈、走进烈士家中送温暖等一系列活动模式。

二. “红色事迹”工作成效与问题

(一)“红色事迹”工作成效

1. 夯实红色文化阵地,小舞台展现大梦想

无锡市革命烈士陵园陈列馆,布展面积为1280平方米,馆内按照烈士牺牲的时间为顺序,陈列展出了82位烈士的英勇事迹,内容涵盖革命志士的战斗事迹、遗物、图像资料等,“红色宣讲”正是依托现有的馆内硬件条件和烈士事迹资源,向公众传播红色精神。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公众对红色文化的诉求在了解方式上有了更多的变化,无锡市革命烈士陵园审时度势,在坚守红色阵地的同时,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报纸、广播等多种媒体渠道,广泛宣传,让公众走进陵园,让社会各界回

顾共产党人历史实现的“中国梦”,以史为师,奋勇向前。作为公益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年来,陵园每年接待瞻仰单位超过156家,服务群众约3万人,陈列馆讲解达到3万人次。

2. 牢筑红色文化根基,“走出去”开辟新天地

无锡市革命烈士陵园在立足原有硬件设施宣传红色文化的同时,突破陈展限制,带着“红风”进学校、进社区、进机关企事业单位,走进特殊群体。2010年结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日,开展“赞美幸福家园 弘扬红色精神”——“红色记忆之旅”走进社区系列活动;2011年开展“历史的回忆幸福的无锡”纪念建党90周年走进学校活动,先后走进16家单位和2个烈属家庭开展红色宣讲和展板展出等主题教育活动,宣传对象覆盖了全市多所大、中院校、小学和部分社区的居民、学生以及机关单位的干部职工等;2012年同时推进“光荣建设者 魅力无锡城”——烈士陵园走进军营活动、行“红色记忆之旅”育“阳光美德少年”活动,带领青少年追寻红色文化之旅,走进嘉兴南湖,感悟革命圣地的红色文化;2013年“红色记忆之旅 站在历史肩上的无锡梦”——无锡市革命烈士陵园“‘中国梦’无锡篇章”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月活动,带领青少年走进无锡市规划馆,邀请无锡市史志办党史处讲师,走进江南大学校园。陵园宣教走进无锡市第一看守所,把红色文化

的精神与动力带给社会特殊群体——未成年在押人员,让红色文化走出陵园,走向社会的各个层面和群体,使社会各界成为红色文化的参与者、渗透者、接受者。

3. 发挥红色文化效能,灵活“借枝献艺”展风采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积淀起来的一种特殊文化类型,蕴涵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陵园朴实无华的舞台,坚持不懈地为红色事迹的宣讲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在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民政局等部门的关心与支持下,陵园不断创新,把红色教育品牌活动与宣传部活动项目、文明办目标管理项目、“行知大学堂”活动项目大胆结合,在主旋律基调的指引下,大刀阔斧,淋漓尽致地宣传红色文化。2010年结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日,开展“赞美幸福家园 弘扬红色精神”——“红色记忆之旅”走进社区系列活动,陵园宣讲员带着红色文化,化身社区工作者,在社区的舞台上点亮红色文化的星星之火;2011年开展“历史的回忆幸福的无锡”纪念建党90周年走进学校活动,陵园宣讲员带着红色故事走进校园,化身辛勤的教育园丁,让祖国的希望在萌芽中滋养在红色文化沃土中;2012年行“红色记忆之旅”育“阳光美德少年”项目,陵园宣讲员化身红色文化的向导,在革命圣地为青少年点起一盏红色文

化的明灯;2013年“红色记忆之旅 站在历史肩上的无锡梦”——无锡市革命烈士陵园“‘中国梦’无锡篇章”爱国主义教育月活动月,陵园宣讲员化身未成年在押人员的教导员,在失足青少年花季的年龄,重又为他们树立梦想、扬帆起航。正是借助着无锡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民政局等部门的广阔平台,无锡市革命烈士陵园走出了门可罗雀的“山北”,为更广阔舞台的社会群体,展示着无锡特殊的城市名片——红色文化。

(二)面临的困境与问题

1. 硬件资源陈旧,老舞台难引新目光

无锡市革命烈士陵园自1953年成立以来,经过迁移重建、修缮、改建、扩建,目前占地面积6.96万平方米,作为陵园最主要的宣教场所陈列馆,馆内的陈设还延续着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布展特色。对于当今这个信息日新月异的时代,烈士陵园怎样再造当年年人均流量达10多万人的辉煌,值得思考。

2. 软件资源贫乏,大平台难做好文章

长久以来,“红色记忆之旅”活动的开展,依托于锡城革命志士和当代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由于历史进程及时代发展等原因,革命先烈详细资料的消逝,制约着“红色文化记忆之旅”的发展,红色文化内容的缺失,加上陵园现有资料存放环境的限制,使很多现有历史资料正处于缓慢老化消亡的阶段。“红色记忆之旅”品牌活动的可持续发展,不能仅仅依靠现有红色资

源的反复利用,要不断发掘不断重组,在还原历史的同时,扎实打好保护红色文化这场硬仗,使红色文化在陵园这个宣传的舞台不断延续。

3. 舆论引导“偏科”,懈怠基层主观能动性

在片面社会舆论的影响下,人们把烈士陵园的工作描绘为“一年就为那一月,一个月就为那一天(清明节)”,社会人群把陵园的教育工作,简单理解为服务社会“扫墓”。舆论的引导,影响着陵园品牌活动维护者的工作积极性,“偏科”的舆论环境和领导机制,使品牌活动存在着政治化、口号化、表面化等倾向,简单的概括就是“说的比做的多,写的比做的好”,把红色品牌活动等同于政治教育或口号标语,“嘴上喊喊、墙上贴贴,台账补补”,这些活动行为的进行,在长远看来是影响“红色记忆之旅”茁壮发展的绊脚石。

三. 今后的工作思路

(一)“内以修身”——改造陵园设施,合理利用软硬件资源树立品牌形象

1. 优化硬件实力,营造品牌发展平台

无锡市革命烈士陵园在市委市政府及市民政局的关心和指导下,将实施三期工程改造计划(现已进入规划公示阶段),改造后,红色文化教育基地资料零散、陈展破旧的现状,将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先进的科技展示手段,合理的历史陈展布局,完整的红色人物生平、战斗事迹,将通过全新的表现形式,呈现在广大社会

公众面前。无锡市革命烈士陵园将以焕然一新面貌,接受新的机遇和挑战。

2. 丰富软件资源,提升品牌创新内涵

“红色记忆之旅”品牌教育活动,以从无锡走向全国的革命志士和奋斗在无锡热土上的先进人物为基本宣传内容,为人熟知的红色人物仅为秦邦宪、秦起、严朴等数人。新中国成立已经65周年,在漫长的岁月中,宣讲人物的重复单一也影响着受众再次接受教育的积极性。无锡当地共有级别不同,管辖不同的烈士陵园27家,分散的红色文化教育场所,也存在着红色文化资源重复浪费的局面,集中整理、统一协调、挖掘人物、完整展示……这将是无锡市革命烈士陵园下一步将努力的方向。“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做好基础的文化内容整理编写,提升品牌宣讲的内容层面,再加以锡城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红色人物,将不断深化、创新“红色记忆之旅”品牌文化内涵。

3. 扩充专业人才,推动品牌持续建设

品牌活动的创建、持续、深化关键在人,专业人才是“红色记忆之旅”品牌教育活动成败的关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米”无“巧妇”也是红色品牌活动的局限,红色文化需要有专业的编纂人才,要有专业的表现人才,要成立专门科室,把红色文化的搜集整理保护划归常态工作。把口耳相传、做表面红色宣传的“匠人”角色,转变为挖掘红色文化内涵、出新红色宣传的专业人才。术业有专攻,知人善任才能

出新、出专、出精,“一把抓”、“什么都会什么都不拿手”,这种时代背景下造就的“全能”人才,并不符合当代红色文化品牌的长远发展。扩充品牌教育活动运营人员、细分品牌教育活动基础环节、配备高层专业人才、精细文化储备、尖端表现手段,复合联动助推“红色记忆之旅”品牌持续建设。

(二)“内外联动”——借鉴社会模式,充分利用文化资源协作深化品牌形象

1. 联动教育平台,延伸品牌教育层面

多年来,无锡市革命烈士陵园在“红色记忆之旅”品牌教育活动的运营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普通教育平台合作——走进江南大学、五河新村小学、侨谊实验中学等大中院校、中小学;与企事业单位联动——走进惠畅里社区、市民政局、威孚公司等。在现有积累的合作平台上,陵园品牌教育活动唯有突破限制,开辟新的教育平台,开创互助教育,才能在延伸品牌教育层面上有所突破。走近社会弱势群体——残疾人,走近社会特殊群体——劳教人员,更多地走近远离公众视线的社会群体。红色教育不是和谐社会的锦上添花,而是“褒扬先烈,教育后人”,无锡市革命烈士陵园将以史为鉴,教育关爱社会各个群体,为无锡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书写新的篇章。

2. 融合艺术形式,丰富品牌表现能力

科技布展体现“红色记忆之旅”品牌文化活动,仅仅是一种静态的被动式传

播,作为品牌活动的策划单位,陵园需要筑巢引凤,吸引众多的受众走进烈士陵园,展现红色文化。快节奏的时代发展中,让忙碌的人群慢下脚步走进陵园,需要陵园在品牌教育活动的创新上下足功夫。首先利用互联网优势,大力发展网络教育活动,共享合作教育平台,开发“远程课堂”,做到小布局大影响小改革大作为,真正做到经济上的小投入,红色精神宣扬延续上的大成果。其次,用多样化的艺术表现形式,使无锡革命历史人物形象更丰满。通过无锡市文广新局、无锡市锡剧院、文化活动中心等专业艺术团体机构的指导,无锡市革命烈士陵园联合共建单位红色志愿者,每年创新一种红色文化表现形式,每年落实一项红色文化发展项目,通过红色戏剧、曲艺、舞台剧、小品、相声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式,邀请共建单位红色志愿者,每月固定日期表演,并结合重大节庆日,宣扬红色革命精神,吸引更多瞻仰红色文化的客流。时间车轮的推进,使艰苦奋斗的历史传统,淹没在了改革开放飞速发展的繁荣之下,使惨烈的战后遗迹,掩盖在了水泥森林的高楼大厦之下,品牌教育活动要以史育人,枯燥的文字描述已经难以让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受众感同身受,只有还原历史生活场景、模拟战争场面,让受众在真实的场景中切身体会革命者坚贞不屈的革命信念,舍生忘死的革命气概,才能真正达到教育活动的目的,由此红色旅游的积极的意义才能体

现。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能够在实践中使“红色记忆之旅”品牌教育活动去粗存精,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扬帆远航。

3. 紧贴时代特色,创新品牌传播渠道

“酒香就怕巷子深”!活动的传播不能依靠“闻香而来”,“红色记忆之旅”品牌教育活动,要合理利用宣传平台,打造品牌形象,扩大宣传范围,为红色文化的教育推广添砖加瓦。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站已经成为了传统的宣传媒体,地方门户网站推荐品牌教育活动,陵园网站跟踪品牌活动进程,开设品牌教育活动专栏,专人管理专人维护,才能让受众简单浏览网页就能快捷了解内容,从而加深品牌印象,促使陵园更好地维护“红色记忆之旅”品牌。陵园属于公共的教育服务平台,新兴媒体的迅速崛起,可使品牌教育活动增加新的媒介,一是微博,教育要扩大的是第一受众面。商业的硬性传播以广告的模式,它通过强制的感官刺激来达到对广告品牌的认知,作为公益性的“红色记忆之旅”品牌教育活动,应该借鉴多方面的运作模式,以文化“硬广”的方式,增加品牌的宣传面和受众范围。二是微信,微信公众平台是近期又一迅速蹿红的媒体平台,它通过圈子文化凝聚受众,能够加入到“红色记忆之旅”微信圈中的受众是相对“忠实”的接受对象,这一群体是品牌教育活动深化的基础,在社会广大受众中,做到以点带面,达到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

“红色记忆之旅”品牌教育活动的持续发展依靠思想观念的革新，宣传红色文化要体现红色文化的传承，要在高度、宽度、广度的领域里实现红色文化的宣传张力，要透露出新时代的精神气象，一种新兴的时代气息。无锡市革命烈士陵园继承红色文化光荣传统，树立“红色记忆之旅”教育活动品牌，锐意创新

红色文化表现形式，拓展扩大红色文化影响层面，在运作模式上谋新，在宣传方式上求变，以创新者的姿态解读红色文化、展示红色文化，让红色文化的影响从历史延伸到实际生活，使时代精神与红色精神高度和谐统一，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不断深化无锡的爱国主义教育。

(作者单位：无锡市革命烈士陵园)

(编辑：何桦)

无锡博物院举办《钟鸣鼎食——周代王公贵族的礼乐生活》、《云水襟怀——陆俨少作品回顾展》

2014年8月20日，由无锡博物院和随州博物馆联合主办的《钟鸣鼎食——周代王公贵族的礼乐生活》在无锡博物院西区二层文物精品厅展出，为期两个月。

本展览精选以西周时期为代表的60余件王侯生活用品，以飨观众。8月20日至26日，每天上午10点、下午3点还有曾国编钟乐队的精彩演出，观众在欣赏精美文物的同时，更有机会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集歌、舞、乐于一体的皇室音乐盛况，领略古代宫廷音乐的风采。

2014年9月18日，《云水襟怀——陆俨少作品回顾展》在无锡博物院开幕。开幕式上，无锡市领导与陆俨少亲属代表陆亨分别致辞，陆亨受聘为无锡博物院特约研究员。

陆俨少(1909-1993)是海内外深具影响的山水画大师，至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山水画界已有“北李(可染)南陆(俨少)”之说。本次展览精选了陆俨少书画经典之作近50件，全面地展示了其创作历程和艺术风貌。本次画展展期至10月12日。

停云馆帖考 (十五)

周道振

宋名人书卷第七(寸大古隶)

宋米敷文书(古隶)

友仁顿首蒙勤勤之「喻深悉谦与之隆然」友仁今投闲杜门未尝辄「敢以书干诸中外在位」纵干之岂有肯响应「之理盖世法中物态」从古如此惟万万「深亮兼当路皆不是交旧」尤更不可悚息悚息「友仁顿首」(草书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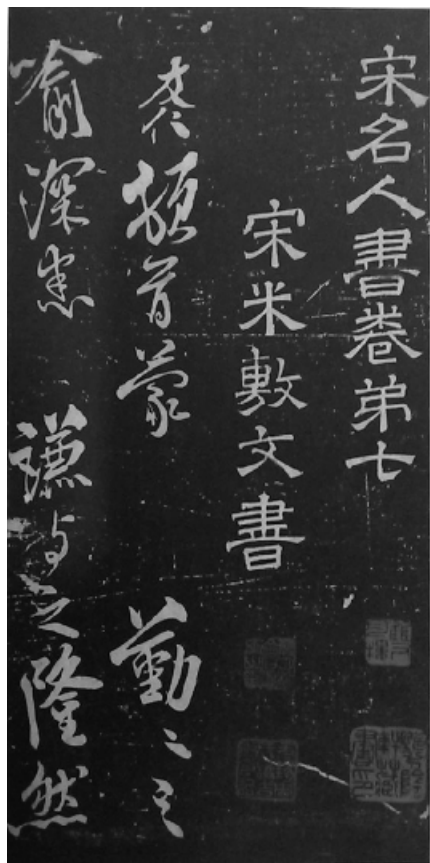
虎儿尺牋真迹藏余家。此刻太欹侧。
《诒晋斋集·停云馆帖跋》

按：米敷文书与陆放翁书合刻一石。石完整。后归冯氏。最后归孙氏。今散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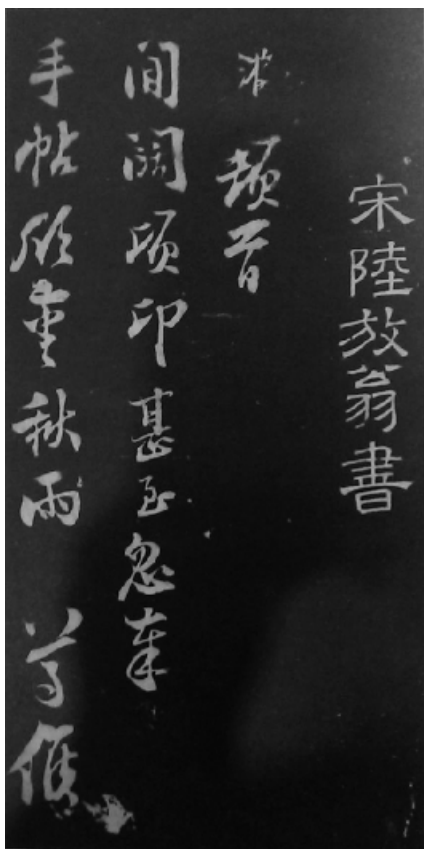
宋陆放翁书(古隶)

游顿首「闲阔顷印甚至忽奉」手帖欣重秋雨尊候「轻安卿禅师遗墨」甚妙恨见之晚辄「题数行不足称」发颺之意皇恐得暇「见过不宣游奉简」明远老友「文字共四轴又五册纳去五」派图四轴数日前已就「付来人去矣游」(行书十二行)

放翁以诗名重天下,受知周益公。范文穆为中兴大家。尝读其《剑南集》,爱不忍去手,思见其人而不可得。今得睹此二



帖,恍然如侍左右,何其幸哉。然放翁在当时不以书名,而遭丽若此。真所谓人品既高,下笔自然不同者也。二帖:一与仲信议婚,一为明远题卿禅师遗墨。放翁到此不为久远,而此三人者皆不可知。昔蔡明远,鄱阳一卒耳,以鲁公之书而传。仲信既与翁结婚,而禅师遗墨有见晚之恨。则二公要皆非寻常流辈人矣。而余皆不知之,鄙浅可笑。此卷既归墨林,墨林博雅好古,而蓄书极富,必能考以补余之不迨也。嘉靖



戊午仲冬二十日,后学文彭谨题。《珊瑚网书录》卷七《放翁手简二通真迹》

项氏藏陆放翁与仲仁、明远二柬,后束刻《停云馆帖》内,末有文寿承题跋,亦一名迹。《真迹目录》一卷

《停云馆》陆放翁书,有别致。《承晋斋积闻录·名人书法论》

按:陆放翁书前为米敷文书。《明拓本》第七、八两行间已有横泐痕。石后由冯氏归孙氏。石上下两端已损坏,但未及字。今散失。

宋叶少蕴书(古隶)

梦得启晚刻」动止安佳颜鲁公行状

送」去烦用前本与详校过」记得中间有阙文也唐」实录七册同纳还勿遽」草草梦得叩头」季高贤亲(草书七行)

按:叶少蕴书与王定国书合刻一石。石完整。《冯本》自二至五行间有泐痕,但字清楚。后归孙氏。

宋王定国书(古隶)

鞏老病僻处人事简略」比辱惠书岂胜感慰」动止信后如何自膺多」祉去秋不义生事非昨盖田」家惨舒全在丰凶耳」北游之期渺然相见之日」未卜万万保爱慰此驰」怀七月丙辰鞏再拜」安国执事」(行书九行)

鞏启蒙」教副以海错佳果岂胜感铭」区区晤言迺究玃再拜」运使吏部公閣下」(行书四行)

《停云馆》王定国书,腴厚可爱。盖伏膺苏文忠公者。刻手亦精致。《承晋斋积闻录·名人书法论》

按:王定国两书,与叶少蕴书合石。石完整。《冯本》于第二帖第二行“铭”字已泐。后归孙氏。今散失。

宋范文穆公书(古隶)

成大答荷记念外姑生朝远遣」讯且寄惠寿綵炷香□烛」糟狸等一一皆领但相去如许」似不必讲况私居遣人亦不易□」以

慚感耳成大又启」北果胡桃沙鱼酥花醢
(“醢”字原左中微泐)「酢等谩寄来人云自
要」负荷亲事买物不可它搭」辄遣一介同
去亦要知讯后」近问与数字便令回也」(草
书十行)(按:以上有二字不识)

《停云馆》范文穆书有古意。《承晋斋
积闻录·名人书法论》

按:范文穆书与姜白石书合刻一石。
范书《明拓本》已多斑驳。石后归冯氏,前
二行上端石残破。《孙本》此石已缺。

宋姜白石书(古隶)

兰亭真迹隐临本行于世临本少石本
行」于世石本杂定武本行于世何延之记云
右军」书此时乃有神助及醒后它日更书数
十百」本终无拔楔所书右军亦自珍爱此书
付子」孙传掌至七代孙智永禅师永付弟子
辩」方太宗求之不得乃遣监察御史萧翼
以」计取之太宗歿殉葬昭陵及唐末温韬盗
发」昭陵其所藏书皆剔取装轴金玉而弃之
于是」魏晋以来诸贤墨迹遂复流落人间然
独」兰亭亡矣(以上小楷作十行。继后细楷
双行写)张芸叟云靖康中有得兰亭真迹者
诣阙献之」半途而京城破后不知所在或谓
尝入梁陈御府上有徐僧」权押缝今行问僧
字是也如此则不得为子孙传掌矣按梁武
收右军帖至」二百七十余轴当时惟言黄庭
乐毅告誓不说兰亭则后人指僧」字为僧權
似未足深据(以上细楷)张芸叟云靖康中

有得兰亭」真迹者将献之朝至中途而京城
破后不知所终」(以上小行草。皆双行。)此
真迹之本末也」(此句小楷)(共十三行)

按:姜白石书与范文穆书合刻一石,
故仍真七卷中。《明拓本》于第八行起,各
行末石残,每行缺一二字。至《冯本》则第
八行竖裂为二石,字全残。余各行末已缺
二三字。《孙本》石已缺。

宋朱文公书(古隶)

熹僭易拜问」德门庆聚恭惟均介多
祉」诸郎学士侍学有休儿辈谨附」起居之
问无以伴书差两盞附浼小」盞颇佳大者乃
食茶耳閤中」有委幸不外熹再拜上问」(草
书六行)

按:朱文公书与张南轩虞雍公两书合
刻一石。《明拓本》石完整。《冯本》上下石
边已残,自第二行下向左有泐痕。《孙本》
石缺。

宋张南轩书(古隶)

栻虽未获詹见而」先正大人材之盛
盖亦从朋游讲之熟矣自承」分符齐安相望
匪远时闻起居与夫」为政之方而尤深愿识
之念岂谓谦光遽枉」诲墨所以慰藉相与甚
诚厚不胜感服栻晚」陋虽知有学跂慕古哲
庶几勉焉而未之有」得也读来示更重悚
戢」右谨具」呈持褫服张栻劄子」(小楷九
行)

按：张南轩书前为朱文公书，后为虞雍公书。《明拓本》第四行末“枉”字已半泐。《冯本》亦原刻。《孙本》石缺。

宋虞雍公书(古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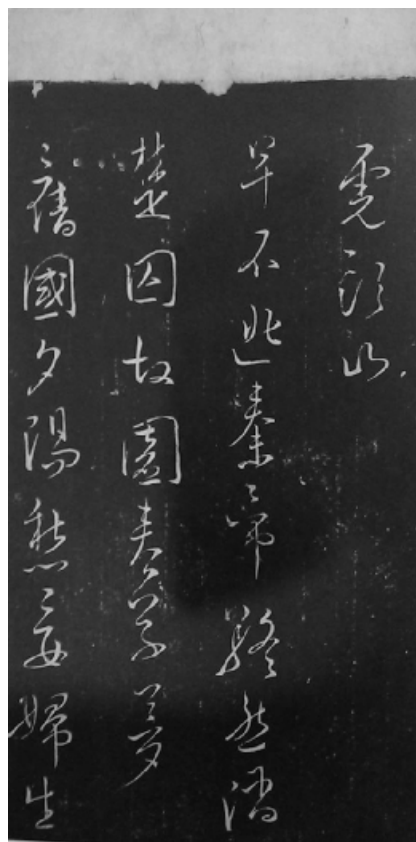
允文病久气羸多卧少行立」执笔作此书不成字简礼文甚」矣(原右下微泐。原泐二字)赐书只乞」草(原左上微泐)圣一帖既以」示相亲又将为子孙百世之藏也」不胜恳恳允文皇恐上禀」河朔鹅梨五十枚南诏余」甘子一桶纳上方」尊俎报答眷光之胜亦或」一助允文又禀」(行书十行)

按：虞雍公书于《明拓本》字均完好。第一行前下旁有泐痕。《冯本》第一行“立”字存上半，第二行“甚”字右下微泐。《孙本》石缺。

又按：《大观录》卷七《虞忠肃适造帖》云：“书学钟成侯，虽未精诣，自合古法。此札《停云》刻石。”吴氏误记。

宋韩子苍书(古隶)

驹启前日不及奉书谓已获罪乃」辱示问感愧不可言也比日」家居体身轻安驹浮江二千里眼」厌旌旗不料到此复见扰扰也」然驹间关自贼中来最能言其情状」若无内应决不能入故须静以俟之」扰则民怨惊则民骇二者足以召」变而奸人乐祸者所在皆有此不」可不知也今吾闲暇一如平时使民心按」堵矣阴勒将士以为之备明探报」严赏罚使事至而先知况大江为之阻



不」足过虑也且贼在数百里而闻吾民惊骇」则必有见轻闻吾治具若将讨焉则必」见仇前时贼在黄州仆以此意说与兴」国江州太守已而贼果从他道去窃」闻诸公时时会议辄布愚见惟」审择焉十一日驹顿首」叔兴礼部贤友」(行草书十八行)

按：韩子苍书与张于湖书合刻一石。石完整。后归冯氏，又后归孙氏。

宋张于湖书(古隶)

孝祥顿首再拜」左右以何时来泾川」官居诸况佳否学富」识明进益不已州县渠」能淹久耶」台阁须方会有」荐者孝祥顿首再拜」(行书七行)

按：张于湖书前为韩子睿书，帖石完整。《冯本》、《孙本》于末行“荐”字上“卅”头已泐。石今散失。

宋张樗寮书(古隶)

即之皇恐(原缺六字)祚(原右上泐)薄兄「弟行中仅有两人在州县间桃」源令亦之其一也亦之早孤失学「又短于才无所见闻不识事体」冒昧远宦初不审知其邑之难「易到官未久便见踈脱」尊契家丈以其故家遗族「不待即之辈有所控请慨然携」拯免貽吏议恩施深厚岂特亦「之怀感无穷抑我祖有知不忘」报也惟是来日尚长救过不给「费全护之力良未艾也伏望」曲轸念虑思有以区处之如有名「无实寄治之邑使之两易以苟且」考任是亦非常之大造也此弟「未易告语併望勿露此意慈溪」王昇其兄弟出入家间数十年向「尝稟恳永公老先生贻书」制垣既保全之又剡辟之已闻摄「邑归峡亦出覆存之赐二人者」即之皆曾僭拜制垣稟剑过閤「从容及之幸甚即之拜覆」(行楷廿二行)

《停云馆》张樗寮书峭劲。《承晋斋积闻录·名人书法论》

张即之，号樗寮。书法欧阳率更，加之险峭，遂自成家。今《停云馆》收刻只数行。余家有所写《楞严经》全本，遭乱播迁，仅存此廿二页。《停云》所刻有云：慈溪有王昇者，出入吾家二十余年。吾邑多张书，其皆王君所得乎？世传其为水精，能禳火，

故藏书家多宝之。《湛园题跋·跋张即之书楞严经》

按：张樗寮书与文信国书合刻一石。《明拓本》石完整，第十行“免”字上半泐。此石经钱氏补刻张樗寮末二行及文信图书，故与无锡窰、赵氏本及《冯本》不同。《冯本》张书前廿行一石是原刻，首行有曲泐痕，第十三至十五行间有斜裂痕，末二行与文信国书均重摹。《孙本》仅自张书末二行起。

宋文信国书(古隶)

乍见鹜胡妇相怜「遇楚兵北来鸿雁」密南去骆驼轻蔓「草中原路斜阳故」国情明朝五十里「错做武陵行」己卯八月三日宿小青「口五十里至桃源县」文山「(行草书九行)」

宋以祥兴元年八月加文天祥少保，封信国公。闰十一月公屯潮阳，与邹汾、刘子浚合兵讨贼，不克，被报于张弘范。盖明年二月宋亡，弘范卒不能屈公，乃送至燕京，此其在道中所作诗也。夫古人死国，多出于一时之慷慨。公何独迤邐于途，宿留于馆，日犹赋诗，不即就死，岂尚有他覬耶？盖不知公之死已久，仰药而死不死，绝粒而死不死。死而不死，忠义之气郁塞于胸中，聊假之诗以洩之。故使公即死，无此诗矣。诗之有无，固不足为公之轻重。然玩其言，想

其人，亦足以示于世，此天所以缓公之死也欤？公所著有《指南》等集。宽尝读而悲之。今兵部员外郎李君应祜出示此纸，手迹宛然如新。盖自己卯至今戊戌，二百十年矣。《匏翁家藏集》卷五十《跋文信公过小青口诗遗墨》

右宋文丞相信国公诗墨迹一首，其诗今见《指南录》中。（中略）此盖公被执北去，将至桃源五十里而作。文君徵明出以示余。余谓公之精忠大节，焯焯天地间。独念公时在縲紲，动止当不自由。其感慨不平之气，发之诗可也；而字画精妙，虽纸墨之微，亦皆不苟，何从容如是？岂公之贤，能够使蒙古待之以礼邪？无亦公之所养有定力，故临难如平时，不稍动于中邪？然则公之大节，不待柴市而后知也。观于此诗，亦可以知之矣。今去公且三百年，片纸遗墨，人传宝之，又况其后之人乎？又况徵明之贤，不啻其世者乎？虽然，忠义所在，自当有神物护持之。《王文恪公集》卷三十五《跋文丞相过小青口诗》

文信国手书过小青口诗一卷，后有原博、济之二跋，乃徵仲故物也。今摹刻《停云馆帖》中。《清河书画舫》

虎头山」

早不逃秦帝终然陷」楚囚故园春草梦」旧国夕阳愁妾妇生」何益男儿死未休虎」头山下路挥涕忆虔」州天祥泣血」（行书，旁有“停云生”、“衡山”二印）

按：文信国诗二首及前张樗寮书末一行合一石，或即钱氏重刻。故石归无锡赵氏后，所见《沈本》中此帖与《明拓本》泐处不同。冯氏重摹，其张书亦补末二行。石后归孙氏。《孙本》张书二行未磨去。今散失。

嘉靖三十年冬十月」长洲文氏停云馆摹」勒上石」（古隶三行）

第六卷：为南宋名人书。如王定国、钱穆父、贺方回、陈简斋，皆元祐、政和间人，文氏误耳。米敷文、陆秘监之奇逸，张于湖之调畅，韩子苍、定国、方回之老健，虞雍公之严雅，皆有可采。张即之大擅临池，恶札之驩垂，此行押差未败耳。朱紫阳、张敬夫、文信国，儒林国硕，千秋尚新，岂在书乎。叶少蕴笔不佳，尝仕显矣。好构撰，其人才亦下中。《弇州山人四部稿·文氏停云馆帖十跋》

第六卷：跋谓范文穆南宋人，误置前卷。王定国、钱穆父、贺方回、陈简斋，元祐、政和间人，误置此卷。今已经改正。惟定国尚在此卷，岂与少蕴同一石，不可拆耶？米敷文虽乏扛鼎力，自是书家。定国、务观、少蕴、致能、子苍俱有笔意，其书亦俱有来历。少蕴颇豪踪，其草偃势略似《绝交书》。乃司寇公独以不佳之评之，恐未输服。定国近苏，致能近米。子苍有《座位帖》遗意。二张俱负书名，于湖稍古雅，樗寮果是恶札派，然亦有骨力。晦翁素留意书学，此帖亦淳古，微有《坐位帖》法，但形不似

耳。姜白石《书谱》，持论甚高。此书乃书生面目，不称所论。《书画跋跋·文氏停云馆帖十卷》

第七卷：米敷文书，型范不宗其父，

然不如其父之有奇气也。（中略）文信公书颇干枯不腴。第此公以忠节炳炳宇宙间，不必论及八法。噫！世之临池者，人以字重乎？《岱宗小稿》卷五《停云馆帖跋》

（编辑：盛诗澜、徐驰）

乐趣——宜兴举办“中秋赏月猜谜游园晚会”

在中秋节来临之际，为了弘扬传统文化，让百姓度过欢乐喜庆的中秋节，2014年9月8日，由宜兴市文广新局主办，市文管办、市博物馆、宜城街道和平社区承办的“中秋赏月猜谜游园晚会”在宜兴小城的瀛园内如期举行。中秋节，又称团圆节，始于唐朝，盛行于宋，历来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传统佳节。今年的中秋之夜，瀛园内更是妙趣横生，其乐融融，百姓欢聚一堂，共同迎接中秋佳节。

赏月，猜谜，是中秋节的风俗习惯。灯谜历史悠久，来源春秋战国时期，小小的灯谜，蕴含汉字音形义的转换，是一代代中国古人智慧的结晶。游园晚会中的猜谜活动形式新颖，内容丰富，活动现场人声鼎沸，主办方将精心挑选的一百六十条由宜兴的历史知识、文物知识组成的灯谜，化作成一百六十个小红灯笼散挂于瀛园的屋宇庭院中，灯谜的答案藏于集中悬挂

在竹荫轩内的一百六十只彩色千纸鹤内。大家都不甘示弱，有的捏住纸条思考，有的拿着纸笔写写画画，有的互相讨论询问，现场气氛活跃。通过猜灯谜的形式，我们将知识推广和传统节日文化相结合，寓教于乐，着力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与此同时，在瀛园的锡韵堂内，中秋戏曲晚会亦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乐队成员，吹拉弹唱，无不认真，中秋之夜的锡韵堂，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此次晚会的举办，增添了中秋佳节欢聚团圆、愉快祥和的节日氛围，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史知识送到每一位老百姓的心中，营造了浓厚的“同创和谐，与民同乐”的欢乐氛围。猜谜妙趣横生，听戏其乐融融，今年的瀛园，在团圆的中秋佳节，为百姓写出了两个大字——乐趣！

（万晓锋）

东林精神与无锡近现代名人

徐 榴

无锡历史千年悠长,素以山水秀美、人文景观众多而著称,有着“太湖明珠”的美誉。这个人杰地灵的历史文化名城,在其千年的漫漫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众多的名人,为这座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和厚重的文化积淀。特别是近现代以来,涌现出了一大批爱国志士,他们始终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大抱负,或投身革命,与黑暗反动势力作斗争;或出国留学,学成归来报效祖国;或办学兴教,为社会培养精英人才;或博弈商海,为民族实业发展添砖加瓦,他们在无锡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社会等各个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无锡这座城市的历史增添了厚重感,为无锡的繁荣融入了使命感,更为无锡人民树立了鲜明的榜样。

东林书院自北宋创立以来一直承担着教书育人的职责,“风闻百世”、“高山仰止”的东林气节流传至今,始终为人们所敬仰。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东林书院更名为“东林高等小学堂”,此后整整一百年的时间,东林小学在此生根发芽,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东林学子,东林精神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他们。被誉为中国当代经济学之父的陈翰笙,幼年就读于东林小学,从小受到母亲和学校良好的传统道德教

育,赴美留学期间又受到西方优秀人文精神的熏陶,后来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研究中国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以第一手的农村调查材料论证中国农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指明中国农业发展的道路。他的一生一直为共产主义事业忠心耿耿,在社科领域殚精竭虑、不断开拓,正直善良、宽厚仁心,以自己杰出的研究实践和优良的治学精神,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的社会科学工作者。

在这些社会科学工作者中,包括曾在东林小学读过书的薛暮桥。薛暮桥的一生,经历过牢狱之苦、戎马生涯、牛棚撰书、学术“论战”,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新中国建立、还是改革开放之后,薛暮桥都紧跟中国经济前进的步伐,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薛暮桥一生追求真理,崇尚实事求是,敢于自我否定,他重视实践的从政风范,仰视科学的治学追求,淡泊名利的人格魅力,最终成就了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代宗师的地位。

东林精神的强大力量感召,让无锡近现代名人在他们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面对国弊民穷的社会和动荡不安的时局,始

终满怀信心,坚信大国不会沉沦,民族定能复兴,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了明智的抉择,把自己置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百废待兴的国家建设,栉风沐雨、砥砺前行。我想东林的这幅名联正道出了他们的心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们各自的人生道路虽然不同,但却有着同一个坚定的理想,那就是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奋斗终身。

今天的我们,不只要了解不同领域的无锡近现代名人的生平事迹和其所具备的广泛影响力和典型代表性,更要学习他们身上所具备的卓越人格和杰出品质,从

而感悟其中蕴含的无锡文化的内涵精髓。让我们在敬仰、学习这些德劭功高的名人志士时,能够在内心产生一种自我激励与鞭策,思考现在的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怎么做。

当前的无锡正处于打造“魅力无锡、创新无锡、创业无锡、幸福无锡”的关键时期,学习无锡名人的光辉事迹,弘扬他们的精神和品质,可以为我们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我们要继承前辈的未竟事业,弘扬先贤的崇高精神,凝心聚力,开拓进取,奋发有为,为谱写“中国梦”无锡篇章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单位:无锡市东林书院管理中心)

(编辑:何桦)

无锡博物院理事会顺利换届

2014年9月19日上午,无锡博物院理事会召开换届会议。会议听取了《无锡博物院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无锡博物院理事会章程(修改草案)》以及第二届理事会成员名单。

会议肯定了第一届理事会在博物院事业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明确本届理

事会将继续发挥好议事、监督、协调职能,积极履职谏言,并有效调动各自社会资源,携手助力博物院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提升。理事会还听取了博物院本年度工作情况通报,与会理事从不同角度对博物院的长远发展提出了诸多良策。